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四分册

(美) 包华德 主编

沈自敏 译

林东民 校



中华书局

WV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四分册

(美) 包华德 主编

沈自敏 译

林东民 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四分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

1983年12月印刷 定价 0.83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工作参考。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目 录

江亢虎	(1)
蒋光鼐	(7)
蒋梦麟	(10)
蒋鼎文	(15)
蒋廷黻	(19)
蒋作宾	(24)
蒋纬国	(30)
简照南	(31)
简又文	(33)
钱玄同	(35)
钱 穆	(36)
钱三强	(39)
钱大钧	(41)
钱端升	(45)
钱永铭	(49)
金树仁	(52)
靳云鹏	(53)
秦德纯	(55)
周长龄	(57)

周至柔	(59)
周佛海	(62)
周学熙	(67)
周诒春	(72)
周树人	(74)
周作人	(84)
周作民	(88)
周自齐	(90)
朱家骅	(92)
朱执信	(96)
朱经农	(100)
朱希祖	(104)
朱 湘	(105)
朱学范	(107)
竺可桢	(110)
朱培德	(112)
朱绍良	(117)
朱自清	(119)
褚民谊	(122)
居 正	(125)

江亢虎 原名：江绍铨

江亢虎（1883.7.18—），学者、教师，多种改革方案的鼓吹者。1912年，他创立了第一个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后来却变为一个保守分子。他因与复辟清朝的丑闻有牵连，断送了他那无所作为的政治生涯。后来，他投身于汪精卫的日伪政府。他在美国有点名气，主要是因为他给加利福尼亚大学捐赠了一批图书，又在1929年和宾纳合编了诗集《翡翠山》，署上了江亢虎的名字。

江亢虎出身于江西上饶的一个仕宦之家。祖父江树昀（字韵涛1830—1892）是1877年的进士，在北京供职十多年，在山东任上去世。父亲江德宣（字啸道，1854—1910年）是1886年的进士，在京师供职二十年，在江苏署理知府任上去世。江亢虎是他父亲继室许氏的独子。1887年，他全家迁居北京，1890年，他祖父任山东道台，江亢虎随之到了山东。1892年他祖父死后，回江西原籍，两年后又回到北京。

江亢虎青年早熟，十岁就能撰写古文，十五岁进同文书院习日语准备出国留学。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他去日本。1901年，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请他回国任北洋编译局总办，负责编写华北五省中小学教科书。江虽对北京官场的繁琐生活颇为厌倦，但又感恩于袁世凯对他的赏识，不久任刑部文案。1904年在国立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教日文。同时，他在北京又先后创办了四所培养师资的女子学堂。这些学校虽属私立，而实际上得到北洋大臣袁世凯、南洋大臣端方的资助。1909年，学部接办了这几所学校，其中有一所后来就成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1907年，江亢虎在日本学了英、法、德文，因此他能阅读外国书籍、了西方的社会思想。他自称是第一个接触亨利·乔治著作的中国人。乔治认为土地解增殖的私人占有是现代社会不平等的唯一根源。江亢虎1907年日本之行，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日本成立了日本社会党，不少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参加该党的集会。1909年，江亢虎去欧洲旅行，以一名非正式的中国代表出席了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大会。1910年前，江亢虎在日本和欧洲留学时，结识了

一批倾向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年轻的中国激进分子，如吴稚晖、张继、李石曾、褚民谊，以及日本的社会主义先驱，如幸德秋水、片山潜、堺立彦。他在欧洲，还会见了欧美的社会主义头面人物。在此期间，他写了两篇文章，主张废除家庭和反对自由企业，他用徐安诚的笔名，在巴黎出版的由吴稚晖主编的革命刊物《新世纪》1909年四、五月号上发表。

1910年12月5日，江亢虎因父亲去世从欧洲回国，在南京过着半闲居的生活，为他父亲居丧。他曾作过几次公开讲演，意外地使他誉满全国。他应邀去杭州讲演，于1911年6月1日作女子教育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的讲演。这或许是国内第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公开讲演。浙江巡抚增韫大为恼怒，立即上奏朝廷，奏称江亢虎发表异端邪说，要求予以严惩。幸经直隶总督的幕客谷钟秀通知，江亢虎事先得悉，逃到上海租界。江苏巡抚张曾敝系江家世交，又力为说项，江亢虎才免于获罪。

经1911年杭州这一段插曲后，江亢虎继续热心宣传社会主义。同年9月2日，他在惜阴公会（妇女进步团体）和《天铎报》的赞助下，在上海组织了一次公众集会，有四百人到会，其中约有五十人加入了社会主义研究会。1912年以研究会为基础创立了中国社会党，设总部于上海。江亢虎宣称这是中国第一个政党，标志自由结社在中国的开端。这个主要由他主持的政党，发表了八项政纲：赞助共和政府、取消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改善人权的法律保护、废除私有财产、普及教育、发展公共企业、改革税制、限制军备、提倡建设性的国际竞赛。当时的临时总统孙逸仙把一批欧美新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赠送给他，借以表示贺忱。中国社会党在全国约有二百五十个分会，但在谭延闿统治的湖南以及湖北受到严厉压制。

江亢虎声称，中国社会党初期的任务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并不从事具体活动。当时国内了解社会主义的人极少，他准备在长江口的崇明岛上试办社会主义，据说还得到当时的内阁总理唐绍仪的赞助并前去参观。但是这项计划失败了。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与日本同样性质的团体建立了联系。朝鲜和印度支那的一些民族复国主义者，访问了中国社会党的上海总部，他们希望中国社会党能支援和领导亚洲的弱小民族。

江亢虎的社会主义理论，在1912年时在国内并未被人了解，又受到一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政界人物的批判。该党最初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仅作为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联结一起的纯社会党，还是作为一个国内政党参加民国政府。江本人在1912年的意见是，该党应保持承担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义务的纯洁性。1912年6月，他到北京谒见袁世凯，陈述他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观点，以防政府的压制。他强调指出，该党唯以教育为目的，而非觊觎政治实权。他吁请袁世凯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江认为这是使政府强大和国家强盛的唯一途径，他并保证如袁世凯实行他的主张，将获得拥有两万名成员的社会党的支持。

由于上述行动，又加上对社会主义的正确定义的争论，在江亢虎的追随者中间，产生了很多不满。1912年10月，社会党内部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派，分裂出来，这一派很快就被袁世凯镇压。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因社会党的激进主张，于8月7日下令加以封禁。江亢虎意识到他与袁世凯的私人关系已不足依靠，逃到外国去了。虽然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刘师复对江亢虎混乱不堪的理论加以抨击，但江仍不失为社会党所公认的领袖。刘师复驳斥江亢虎认为马克思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的主张，宣称这个社会党领袖对社会主义只是一知半解，更不懂得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多样性。他又指责社会党的政治纲领，只是乞求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温和改良。总之，刘师复认为江亢虎和孙逸仙一样，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从1913到1920年，江亢虎侨居美国，在伯克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教中文。1916年，他捐献了他父亲收藏的一万三千卷图书，充实该校的图书馆。有好几个夏天，他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工作，整理中文书目筹建该图书馆中文藏书部。

1920年，江亢虎回国。1919年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这个课题，引起了中国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兴趣。他们并不都相信社会主义，但那些信从的人，却比那个松松散散的社会党早期成员，显得更为精神饱满。1920年秋天，早期的共产主义领袖张国焘在北京大学第一次与江亢虎交锋。江对劳工组织和全国社会主义者的统一行动，毫无兴趣，反而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要靠参加国会的活动。张国焘等人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这次论争打消了共产党和江

亢虎等人的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合作的可能性。

江亢虎回国后主要关心的是想去俄国考察那里的情况。但在1920年，要想在北京取得去俄国的合法护照是困难的。江求助于总统徐世昌，徐和江亢虎的父亲是同科进士，有同年之谊，终于为江获得去俄国和欧洲旅行的护照。他通过苏俄远东共和国驻北京代表优林的介绍，认识了沈崇勋，沈作为北京的代表即将出使远东共和国，为江在专车上保留一个座位。1921年8月，他们出发经哈尔滨去俄国。江亢虎在俄国与一些从前在美国时认识、而今成为远东共和国官员的俄国人再度相逢。

1921年6月22日到7月12日，江亢虎以中国社会党代表身份，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这次大会上，他接触到了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激烈政策。1922年1月，他又在莫斯科参加了远东革命政党大会。这次会议，通常称为东方劳动者第一次大会。该会原订于1921年11月在伊尔库斯克举行，以回击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列强。会议因俄国情况的变化一再延期，最后移到莫斯科开会。江亢虎在苏俄期间，与布尔塞维克领导人列宁、托洛斯基、布哈林、契切林、卢那察尔斯基，以及匈牙利领导人巴拉坤，有多次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见。江亢虎在游记中记述说，他认为越飞是第一流谈判能手和外交家，在担任苏联驻德代表时已显示其才能。当时，越飞已奉派到中国，开始和孙逸仙谈判。

江亢虎俄国之行最主要的目的，是想以外蒙为基点，进行社会主义试验。他对外蒙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13年1月，那时蒙古和沙俄密约，牺牲中国对外蒙的主权。这个条约在中国引起了公愤，江亢虎发表了《社会党的边疆政策》一文，首先指出，诸如新疆、西藏、蒙古等边疆地区系特殊的领土，间接隶属于中华民国，在内部事务上享有自治权，而各国承认为永久中立地区，社会主义者可允许在这些地区试行其纲领。江亢虎宣称他的主张得到安徽、浙江、新疆都督的支持。上海报纸谴责他利用国家危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八年之后，他在俄国再次主张外蒙古应作为社会主义的试验场所。1921年，有不少在俄国的中国工人，在布尔塞维克革命中受过军事训练。江亢虎想把这些中国工人用布尔塞维克武器装备组成中国支队派到外蒙，驱逐白俄占领军，然后由中国支队

创立外蒙中立区（允许布尔塞维克持有一些优惠）试验社会主义。江亢虎曾为此拜访列宁，据说还与俄国当局取得了一些协议。但是在中国支队组成之前，布尔塞维克已与张作霖达成谅解，进入外蒙驱逐了白俄军队。

江亢虎在俄国住了一年，1922年春去西欧。他没有回国盘缠，得到北京徐世昌大总统的资助旅费才能回国。江亢虎在俄国期间，目睹结束军事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政策的建设阶段。他在回到中国的时候，考虑到中国的情况和历史与俄国有所不同，需要探索自己发展的道路。他放弃了过去的观点，开始阐述他称之为适合中国的新民主和新社会主义的理论。

所谓新民主，后来江亢虎又称之为有限民主，包含三个基本原则：受过教育的公民经投票选出后参与政治；立法权驾于行政、司法权之上，以免处事延宕办事无能；通过商会及职业团体实行代议制政府，杜绝一个阶级的专政。江亢虎的新社会主义、后来又称为社会资本主义；主张财产公有；劳工补贴；社会福利。1923年，他担任了由技术专科学校扩充改组而成的上海南方大学校长，借以宣传他的新民主、新社会主义。这所新大学在北京设有分校，一度为中国的青年所向往。江亢虎曾去东南亚募集资金，受到不少华侨团体的热忱欢迎。但是他因曾去过俄国、又与外蒙事件有牵涉，所以荷兰殖民当局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严密监视。

江亢虎回国后因得到国内赞助人的支持而欢欣鼓舞。1924年6月15日，他宣布恢复中国社会党，1925年1月改组成新社会民主党，设总部于北京，上海及其他城市各有支部。1924年，他去湖南作演讲时，参加了省宪的修改讨论。后来他公布了他的省宪草案，并希望该草案在中国实现联邦制时作为省宪的范本。

段祺瑞成为执政在北京重新上台，江亢虎参加了1925年2月召开的善后会议。同年春，段祺瑞政府筹备召开新国会，江列名为新宪法起草委员。眼看他在华北政治上遇上好时运，却不料在1925年遭到意外的沉重打击。

早在1924年，江亢虎显然为了希望使溥仪信服社会主义，曾想和被废黜的溥仪晤谈。为此，他给京师大学堂的同事、溥仪的亲信满族人金梁写信，信中表示了他个人对清廷的祝愿。这封信在1925年《清室密谋复辟文件》一书中披

露。江亢虎的政治意图立即受到怀疑，纷纷斥他“披着新式的外衣而干着背叛中国青年的勾当”。南方大学学生大声疾呼，要求撤消他的校长职务。江竭力申辨说没有其他证据能证实他赞同清朝复辟的这一指责，但无人听信他的申辨。总之，他作为教育界的重要人物的地位动摇了，他的江西同乡会开除他的会籍。江在重重压力下，辞去南方大学校长之职，以后在北京居住了一些时候。

他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完结，乃去加拿大，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教中文及其他有关课程。虽然他继续对中国的时局发表议论，但逐渐趋向因循守旧，他认为中国的改造，祇有建立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1929年出版的《唐诗三百首》的英文译本《翡翠山》一书中反映出他的观点的改变，这本书是他与美国诗人宾纳合编的，该书附有江亢虎写的有关中国诗词的论文。

1934年江亢虎在上海发表一系列有关儒家哲学的演讲时，再次显出他渐趋因循守旧。他又率领一个文化代表团去美国展出中国艺术珍品，回远东途中，在夏威夷、日本发表演讲。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当时住在北京的江亢虎立刻去华西，到四川和新疆讲学。当时极大多数中国人都把抗日首先看作是一场保卫祖国反对民族敌人的爱国斗争，江亢虎却认为抗日斗争是有关世界和平保存远东文明的斗争。

江亢虎的上述高调，无助于他觅得一个职位。或许由于他是清廷支持者的坏名声使他无法觅得一个教席而使他的经济非常拮据，终于他去香港了。在那里，他提倡“养生十法”以及素食主义。在香港他弃绝近代的生活习惯，主张恢复儒家的师徒传授之道，穿着古旧的礼服，敬奉束脩。这种授学方式，已全无魅力，那些进取心很强的中学生，再也不愿回到这种儒家的传授方式，而选取近代的大学教育。

江亢虎由于上述的尝试失败，当准备与日本人妥协的和平运动的一些参与者请他回上海时，他即应邀前去。以后他投身于1940年3月建立的、以汪精卫为首的日伪政府，在南京当上了考试院副院长，主持文官考铨。他称之为“回向东方”的后期思想，只不过是转弯抹角地适应东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的

政治需要。1942年他重新发表了1934年时他在上海所作的有关孔子《论语》的讲演稿，他写道：“只要孔庙长存，大东亚文明的建立必将来临”。这表示他对中国旧传统是何等吹嘘，而离开他早期沉醉于社会主义的情景又何等遥远。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

自负、多变、浮夸的江亢虎在早年的经历中显得思想活跃和颇有勇气。清室覆灭前，他提倡诸如女子教育、中文拉丁化、社会主义等等异端主张。他个人的交往中，有如共和革命家宋教仁、早期共产党人彭湃、守旧的儒生叶德辉等。他最初论述社会主义的文集，有1913年出版的《洪水集》。书名显然是采用了1911年浙江巡抚的奏摺，要求严惩倡导洪水猛兽似的异端的江亢虎。他游历俄国和东南亚的游记集，分别题名为《新欧游记》和《南洋巡回记》出版。二十年代里还出版了他多种有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演讲集。

江亢虎于1898年与刘氏结婚，生有儿女七人，四人夭亡。1920年，他在美国娶继室陆淑英，她出生美国，从事幼师教育，1920年一同回国。1921—1922年一起去苏联、欧洲旅行。1927年，原配所生三个儿女仍在世，子二十五岁，长女在大学上学，次女在中学上学。他的继室所生儿女两人，当时均在北京，子名龙男1921年11月24日生于莫斯科，女名凤女。

蒋 光 鼐 字：憬 然

蒋光鼐（1887—）广东军官，1924年后多次战役中任司令官，特别出名的是率十九路军在1932年坚决抗击日军。1952年在北京政府中任职。

蒋光鼐出身广东东莞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幼年即受传统教育，但他决心入军界而进了军校。后来，他在保定军校求学，毕业时成绩优良。

他的军事生涯开始于1923年，在粤军一师四团当一名营长，团长是陈铭枢。1924年陈铭枢升任旅长，蒋光鼐升为团长，蔡廷锴在他手下当营长。这是这三位人物的初次结合，以后成为第十九路军的公认首领。李济琛那时是粤军第一师师长。

1925年，经多次改编，李济琛任第四军军长，陈铭枢升为第十师师长，蒋

光鼐为副师长。十师和张发奎的第十二师于1926年一起北伐，他们取得光辉胜利，为整个战役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十师、十二师分别扩建为军。陈铭枢任第十一军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

1926年底，武汉和南昌的国民党首领不和，武汉方面发动反蒋运动，陈铭枢认为他不便反对武汉方面，所以脱离第十一军，将它交给了蒋光鼐指挥。蒋光鼐也感觉到进退两难，和高级官员商量方针。当时有两种方案：或者与武汉首脑一起，那么军队可以保全；或者离武汉投奔当时在江西的蒋介石。大家认为第二种办法太冒险，因为那立刻会引起和张发奎互相残杀的战事。于是蒋光鼐未经宣布地离开部队，军队由张发奎接管，张发奎遂同时统率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张发奎任原二十四师副师长蔡廷锴为第十师师长。由于二十四师师长亦离去，共产党人叶挺被任为师长。

1927年年中时，蒋介石在南京立定脚跟后，武汉和南京之间关系恶化，双方都准备在战场上来解决分歧。武汉出师讨伐蒋介石，张发奎立即控制住了南昌。当时，情势骤变，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左翼决定清除共产党。8月1日，中国共产党由贺龙、叶挺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由于张发奎采取了紧急措施，三天之内，起义被镇压，叛军撤离南昌向南撤退，准备到广东去建立据点。

南昌起义时，第十一军（实际上只是蔡廷锴第十师，因为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原来就是起义的首创者）被迫参加叛军。被任为执行前卫任务而往南进军的蔡廷锴，取得胜利后把部队带到闽赣边境。这时蒋光鼐又回到部队，率部开进福建。1927年11月，陈铭枢回到了部队。蒋、陈、蔡三人将部队带回到李济琛控制的广东。1928年底，陈铭枢继李济琛任广东省主席，蒋光鼐统率第十一军。

1929年初，李济琛被蒋介石监禁在南京，陈济棠任粤军全军统帅，陈铭枢暂任省主席。粤军改编，蒋光鼐任第六十一师师长，蔡廷锴任第六十师师长。这两个师就是第十九路军的前身。他们率军打败了张发奎和李宗仁1930年底前对广东的进攻。1930年，这两个师北调，编成了第十九路军，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

1931年初，阎、冯联盟失败后，第十九路军参加了对正在江西扩大势力的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围剿。接着，胡汉民在南京被蒋介石监禁，陈济棠和当时控制了广西的李宗仁在广州发动了新的分裂活动。陈济棠调离广东省主席职务，派他到江西进行反共作战。这一措施，使他和原有的部队——即当时的第十九路军——会合在一起。

在这期间，蒋光鼐的部队常被调去进行不停的征伐，这很可能引起他的不满。盛传南京将利用第十九路军作为讨伐广东叛变者的先头部队，这意味着要叫他们去攻打原第四军的老伙伴。蒋光鼐当即称病，在上海住了几个月医院。在他离职期间，蔡廷锴指挥了第十九路军，因此，蔡廷锴在十九路军中，较蒋光鼐更为闻名。

南京广州的内战危机，因1931年9月日本入侵满洲事变而得以解除，敌对的国民党派系重新联合起来，广州分裂运动也消失。南京当局把第十九路军调到上海地区，陈铭枢任大上海卫戍司令，蒋光鼐为淞沪警备司令。南京的这一调动曾被认为是向广州首领们示意，十九路军虽未参予广州分裂运动，但它本身是广州的基本势力。

十九路军因1932年1月28日夜在上海坚决抗击日军，引起国际上的重视。蒋光鼐、蔡廷锴成了当时显赫的英雄人物。但是十九路军明显的爱国举动，却引起了南京的疑虑，因此又调它去江西与共产党作战。1932年底，又调到福建，蒋光鼐任福州绥靖主任，其地位与早期的督军相似。蔡廷锴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其他军官和编制基本不变。

蒋光鼐以迟迟不就职来表示他对南京政府的日益不满，他先到广东家乡逗留，一住就是好几个月。最后，蔡廷锴劝他回福建就任原职。1932年底，南京方面为了取得他的信任，任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蔡廷锴为绥靖主任兼十九路军总指挥。

当时，陈铭枢辞去了国民政府交通部长职务去欧洲旅行。1933年初回国接着就有福建变乱的谣传，从此即被认为陈铭枢是1933年底福建事变的主要煽动者，并且得到十九路军的支持。因为十九路军的首领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早在北伐时的第十师时已结成一起，他们毫不动摇地忠于陈铭枢。

从实际上来看，蒋光鼐似乎积极参与了陈铭枢发起的福建变乱，但细节不

详。蒋曾专程去广州，与广州首领商谈，组成反南京的新联盟。广东的掌权人陈济棠拒不合作，陈铭枢等人又重新开展新的活动。1933年11月30日，福建发动了反对南京的事变，在福州成立了人民政府，以李济琛为主席，蒋光鼐为十一人委员会的委员，负责财务委员会。福建方面公开谴责蒋介石，并制定了抵抗日本侵略和在中国成立民主政府的政纲。

福州的冒险行动仅有两个月就失败了，包括蒋光鼐在内的全部首脑人物，逃往香港。李济琛已在香港组织了一个叫做全国革命同盟的新政党，流产的事变参预者设法在香港保持组织上的联系，除了福建事变的参预者外，据说冯玉祥等反对蒋介石的人物也加入了这一新的组织。蒋光鼐除参加这个组织外，他在香港直到1937年并无其它活动。

中日战争爆发，使中国国内相互争吵的派别又联合起来。蒋光鼐当即回国参加抗战，但在战争年代，他并无实权，祇当一名副手，先后在张发奎、余汉谋手下的各战区任副职。日本投降，政治派别的活动又立即活跃起来，有一些是发生在国民党内部，起而反对蒋介石。1946年，蒋光鼐、蔡廷锴在广州成立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其成员大多是南方的军界首领。不久，蒋光鼐又离开大陆住在香港，他认为这样较为妥当。在过去，蒋光鼐的名次总是在蔡廷锴之前，而在这个新成立的组织中，却由蔡廷锴领先，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1949年秋，蒋光鼐和蔡廷锴代表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到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北京市政府委员。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其他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团体，后来与李济琛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并，蒋光鼐任该会中央委员。

1952年，蒋光鼐任纺织工业部长。1954年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代表，1959年又选为第二届人大代表。他又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委员。

蒋 梦 麟 字：兆 贤

蒋梦麟（1886—1964.6.18）教育家。1919年北京大学教务长，1923—

1927年北京大学代校长，1928—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31—1945年再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1964年在台湾任乡村建设联合委员会主席。

蒋梦麟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个仕宦之家，祖父在上海从事银行业稍有家财，他父亲购置田地并在上海一些地方银行中拥有股份。蒋梦麟生母出身于书香门第。在他幼年时生母去世，他父亲续弦再娶。他的继母虽能干贤惠，但蒋梦麟与继母的关系并不融洽。

蒋梦麟六岁时在本乡村塾读古书，他不喜欢这种强记硬背的旧教学方法，所以到邻县绍兴的一所新式学校，中西学堂学习，除学中文、经史典籍外，还有基本科学知识和英语、日语。蔡元培就是他的老师。1898年后，蒋梦麟先后进了上海的法国天主教会学校、余姚的地方学校和杭州的美国基督教会学校。在教会学校时，他参加了近代中国初期的学生运动。

蒋梦麟十六岁时离开教会学校，到杭州进了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它的前身是1897年创立的求是书院，教师中同情改良运动的颇不乏人。蒋梦麟读到了章炳麟、梁启超等人的反清文章。他十九岁时考中秀才后，仍在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学习。1904年，进上海南洋公学学习，准备去美国留学。当时，他认为要拯救中国免于被列强瓜分之祸的唯一办法是实行西化。南洋公学是1896年由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倡议成立的，预备班的课程相当于美国中学水平。蒋梦麟是南洋公学的高材生之一。

1907年夏，蒋梦麟和他的一个朋友到日本逗留，历时一月。他参观了展览会，对日本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程度印象极深。次年，他在杭州参加了浙江省留美官费考试，未录取。后由他父亲筹划了费用，他于1908年8月到美国去留学了。

他到旧金山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秋季学程早已开始，他利用1908年的最后几个月时间补习了英语。1909年，他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第一学期学的是农科，以后转学教育。1909年底，孙逸仙到旧金山募捐并筹设同盟会分会，当时在伯克利分校的蒋梦麟，为旧金山出版的一份支持孙逸仙的报纸《中国自由新闻》写了一篇社论。

1912年，蒋梦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又去纽约哥伦比亚

大学教育系当研究生，他由约翰·杜威指导而深受其影响。1917年写成论文，题为《中国教育原理研究》。在文中他论述了传统的中国教育的观点与近代西方的教育理论相似之处，他主张要保持中国文化的精华，同时把某些西方理想结合到中国生活中来。虽然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不受外国侵略，他坚持认为这样的政府必须保障个人权利。

留学九年后，蒋梦麟于1917年回国。他在浙江老家过了几个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约一年。1918年任《新教育》月报主编，这份月刊由北京大学和江苏教育会合办。蒋梦麟除主编这份月刊外，又为此写了很多文章，同时他又为《教育杂志》撰写有关教育的专题文章。1918年夏他去满洲、朝鲜，见到了日本扩张野心的明显事例。同年他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陈友仁共事，准备发表孙中山关于中国工业化的建国大纲。

这一期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正在探索新的道德价值和新的意识形态，用以取代中国的旧传统。北京大学是这一思想激流的主要中心，蔡元培当时是校长。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示威游行，反对那些在巴黎和会中处理山东问题上不利于中国负有责任的官员。接着全国各地也掀起了示威游行，提出同一的抗议。蔡元培虽然同情学生，但是此伏彼起的强烈行动使他感到震惊。他离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后经一再挽留，1919年7月蔡同意这样的安排，即当蔡不在时，由蒋梦麟主持校务。从此以后蒋梦麟和北京大学的关系统有多次中断，但一直维持到1945年。

1919年9月，蔡元培回校，北京大学改组由教职员主持校政，蒋梦麟为教务长，负责行政事务。学校的最高立法机构是学术会议，其成员由教授选举产生，各系主任为当然委员。此后，蔡元培不在北京时，蒋梦麟代理校长的职务。1921年，蒋梦麟由上海总商会、全国教育协会推荐，以非正式的观察员身份出席华盛顿会议。1922年华盛顿会议结束，蒋梦麟去欧洲游历。

1923—1927年蒋梦麟任国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这一段时期，对蒋梦麟来说，是十分紧张的时期。经济情况十分困难，学校的经费难以获得。经常拖欠一、两年，教授们只能领到薪水的一部分。蒋梦麟又要在学生和政府之间作调解，学生闹事日有增加，政府则力主武力压服。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

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段祺瑞政府处理大沽事件失当，守卫办公大楼的军警向徒手示威学生开枪，学生四十五人死亡，一百五十五人受伤。其中死者三人、伤者五人系北京大学学生。

张作霖到达北京，奉军又和蒋梦麟为难。孙宝琦通知蒋梦麟说，卫戍北京的山东军首领张宗昌，已把他列在黑名单中。蒋梦麟逃离北京大学到使馆区去躲避，一直到1926年夏他才逃到上海。从北京大学逃出来的一些知识界人士，如蒋梦麟、马叙伦等人，在上海一时没有进行活动。在1926年间他们回到老家浙江，劝浙江都督和正由南方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合作。劝说无效，北伐军继续进军，1927年2月，攻占杭州，很快控制了全省。蒋梦麟受任为临时浙江省政府成员、浙江省督学、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秘书长。

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创立了新的教育制度，这是1927年时有蔡元培参加的教育行政委员会根据江浙的经验拟订的。据此，全国分为几个大学区，每区中的国立大学校长负责该区一切教育事宜。蒋梦麟被任命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解除省督学职务，成为浙江省政府中的一名官员。1928年10月，蒋梦麟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29年他辞去浙江大学校长职务，集中精力于新的职务。大学学区制因受到专门教育家、特别是江苏的教育家的批评而取消。蒋梦麟因与南京其他官员在教育政策上的意见不一致，1930年12月，辞去教育部长职务。

蒋梦麟回北方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在1929年曾再度任命蔡元培担任，但他未就任，由陈大齐实际负责校务。1931年到1937年间，蒋梦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日本对华北的压力加强。像他这样一个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当然是日本活动的对象。1933年5月31日成立冀北日伪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后不久，蒋梦麟被北平使馆区的日本警备司令部请去关在一间房子里，一个日本校官当面斥责北京大学的反日活动，日本宪兵当晚，要押送蒋梦麟到大连，去见那里的日军当局，蒋梦麟拒不应从，后获释。此后，日本改变策略，极力争取北京大学的教师、行政人员中的头面人物。日本人背信弃义，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附近发生冲突而爆发了中日战争。

当时，蒋梦麟正在牯岭参加蒋介石召集文人学者商讨国事的会议。数日后，

他飞回南京想去北平，但未能成行。7月29日，北平沦陷，他由南京去杭州，得知上海发生战事。蒋梦麟深知这是一次长期的战争，他回到老家探望父亲，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蒋梦麟的父亲在1939年去世，年八十岁。

南京政府当局把北方的三所享有名望的大学：北平的北大和清华以及天津的南开迁往湖南长沙。蒋梦麟离开杭州去南京，然后去汉口、长沙。1937年11月1日，三所撤退的大学组成的联合大学在长沙开学，有教授二百人、学生一千人聚集在临时的校舍中。1938年2月底，日军进攻汉口，该校被迫迁往云南昆明，定名为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5月，在那里开始了第一个学期。这个学校由原先三校的三位负责人组成执行委员会管理：他们是北大的蒋梦麟、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蒋梦麟到美国各大学访问，希望增加中美之间交换教授和学生。1945年6月，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请蒋梦麟担任行政院秘书长，蒋辞去北大校长，由胡适继任。1945—1947年蒋梦麟当了两年行政院秘书长，之后，成为国民政府的参议。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发生了内战。1948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许多中国人和许多在美国的官员，都认为共产党之所以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的贫困。因此，1948年10月1日，成立了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这是中美两国政府的一个合作机构，由三名中国人、二名美国人组成。三名中国人是蒋梦麟、沈宗翰、晏阳初。二名美国人是梅厄和贝克，蒋梦麟为主席。他担任这个职务有十六年之久，一直到他去世。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经过技术援助和其他办法，增加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村生活水平。1949年委员会迁往台湾，继续推行农村复兴计划。在蒋梦麟领导下，该委员会在台湾的水利灌溉、水土保持、农村卫生、改良品种、繁殖牲畜、农业机械化等工作的成绩，获得国际公认。蒋梦麟在台湾推行节育的工作也颇知名，他很关心由于台湾人口继续不断迅速增加而引起的问题。

1958年，蒋梦麟任台湾石门开发委员会主任。他在世时，见到了经过八年、投资八千八百万美元建成的石门水库。1963年他获得了特级宝星大勋章，他在台湾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进行土地改革的成就也得到嘉奖。1963年3月任中华

教育文化改进基金会董事会董事长，他主持了在台湾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议。这一基金会是美国退回庚款于1924年设立的，共产党占领了中国大陆后，基金会总部于1950年迁到纽约。

1964年6月19日，蒋梦麟因肝癌死于台北，蒋介石、陈诚等政府高级官员参加了在6月23日举行的丧仪。他的遗体在阳明山公墓和1957年去世的妻子葬在一起。1960年蒋梦麟曾再娶，但于1964年离婚。蒋梦麟遗有女儿一人：女儿是吴文华夫人，她的儿子现在在中国大陆。

1947年耶鲁大学出版了他的《东土西潮》一书，他就自己一生的经历来追述近代中国的历史，他强调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但他竭力呼吁为了国家安全，必须迅速发展科学和培养民主精神。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原理研究》一书，于1924年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1918—1925年之间的讲演和文章，合订为《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一书，在1933年出版。《梦麟文丛》、《谈学问》两书，先后于1954年、1955年在台北出版。

蒋 鼎 文 字：铭 三

蒋鼎文（1895—），浙江军官。他在北伐战争和三十年代反共战争中为蒋介石效劳，是个得力的前线指挥官。中日战争期间，任西安行辕主任、陕西省主席、第一战区司令。1944年日军执行“一号”计划进攻中原。他在河南大败，以后就退休了。

他出身在浙江诸暨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时在本地私塾上学。1909年进县中，是一个反满活动的追随者。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蒋鼎文离校去杭州参加学生军。1912年，他进了绍兴大通军校，同乡徐锡麟早年曾在该校从事秘密的反满革命活动。一年后，他转到浙江讲武学堂，1914年毕业后，在浙江都督朱瑞都督府的警卫部队中任排长，他在浙江当下级军官一直到1916年4月，那时，反袁势力逼使朱瑞下台，宣布浙江脱离北京当局，蒋鼎文参加了这次由第一师师长童葆暄领导的活动。以后蒋鼎文去上海。

1918年5月，段祺瑞进一步征伐南方政府，派童葆暄率师进福建，支持福建省长李厚基反对广东。蒋鼎文去厦门主动帮助童，其目的在颠覆童军。11月浙军团长陈肇英倒戈投向广东，蒋鼎文不久也随之去广东。

蒋鼎文此后的经历不详。1923年在孙逸仙大本营当参谋，1924年派往黄埔军校以中尉衔任教官和学生队队长，10月升为上尉，任黄埔军校新成立的教导团第一营副营长。

蒋鼎文参加了征讨广州商团之役，1925年2月又参加了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战斗之初，第一营营长受伤，蒋鼎文代理营长之职。3月，在棉湖之役中他身受重伤，六个月后伤愈升为中校，任副团长，不久，任二师五团团长。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蒋鼎文担任守卫广州之职。1926年3月，蒋介石突然施行军法统治，反对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和俄国顾问，蒋鼎文率其部队参预这一行动，有人要求惩处蒋鼎文，但蒋介石支持他，并为之辩解，说他系奉命而行。

1926年7月，北伐开始时，蒋鼎文的五团留为后备。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后，鄂西敌方部队投诚，蒋鼎文任收编委员会委员，去沙市、宜昌履行职务。1927年1月，蒋升为少将，统率一个团直属国民党南昌行营。这支部队来自各方面，很难率领，但在蒋鼎文领导下1927年8月曾在南京龙潭苦战中打得很出色。8月中旬，蒋介石辞职离南京，由他的助手何应钦统率第一军，在苏南、浙东集中部队，以防范当时控制南京的桂系势力。蒋鼎文在沿海城市宁波任警备司令，9月22日，他从宁波护送蒋介石到上海。不久，他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职，驻守杭州。

1927年10月，李宗仁、程潜由南京西上攻击唐生智，何应钦令蒋鼎文率第一师开进南京负责警备任务。在冯玉祥的部队沿陇海铁路进攻后，北伐军又开始进军，11月初向山东进发，第一师奉命沿津浦铁路北上，12月，蒋鼎文参加了攻克蚌埠、徐州之役。

1928年1月，蒋介石再次上台，接着改编军队，蒋鼎文任第一军副军长，兼一师师长。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上，蒋鼎文在津浦铁路沿线作战。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在济南和日军发生冲突，蒋鼎文受命南撤至兖

州。8月，国民革命军机构改组，蒋鼎文任第九师师长。

1929年4月，蒋鼎文在武汉参加对桂系的战役，任第二军军长，兼第九师师长。冯玉祥在河南举兵反对国民政府，蒋鼎文率部进鄂北保卫武汉。冯玉祥部队在5月未能发动，10月，由宋哲元、石友三率部队在豫西大举进攻，在中原展开大战，11月，从侧翼压向鄂北，蒋鼎文的部队力加阻击。12月，石友三在郑州倒戈。战争在鄂豫边境进行，蒋鼎文及时扑灭了这次变乱。

1930年，国民政府面临冯、阎、李联军的严重挑战。战争在5月间开始，蒋鼎文率三师一团兵力，在陇海铁路阻击冯玉祥的部队，这条战线上的战斗很激烈，济南的失守以及曹县被石友三占领，对国民政府是很大威胁。蒋鼎文奉命开到曹县一带，在考城打败了石友三。

冯玉祥在兰封前线的力量还很强大，蒋介石另组进攻部队，由蒋鼎文统率。1930年9月12日战争开始，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蒋鼎文又奉命率领第九纵队沿平汉路前进，9月30日，切断冯军后路，冯军一部分投降，一部分缴械。10月初，内战结束，蒋鼎文去洛阳，任陇海路西段警备司令。

1931年6月，蒋鼎文率领剿匪军第四军团调到南昌参加对共产党的第三次征伐。他的第九师于8月初攻克了兴国。国民政府显然认为共产党的威胁已大为减轻，于是命令蒋鼎文去攻打集中在广州的国民党的反对派势力。但是共产党却在江西山区袭击国民党军队，蔡廷锴的援兵赶到，才得解危。1931年秋天，日军进犯满洲，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征讨暂时停顿下来，蒋鼎文奉命巩固国民党在赣东北的地位。

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蒋鼎文率两支部队从右翼支援沪杭前线的蔡廷锴十九路军。5月停战，蔡廷锴南调，蒋鼎文负责守卫上海，6月，调到蚌埠，任津浦路南段警备司令。他要求解除历时四年的九师师长的职务，留任二军军长。经他推荐，由李延年继任。同年冬，他和他的部队调往武汉，兼任长江七省水警司令。

1933年春，蒋鼎文任武汉整训处长。同年秋，对共产党的第五次征伐开始，9月，任北路剿匪军司令，到江西打共产党。在战争进行中，陈铭枢、蔡廷锴在11月举起义旗，在福建反对蒋介石，福州成立人民政府。蒋鼎文率领

九个师扑灭福建的叛乱，不到两个月，福州政权就失败了。蒋鼎文建议，把十九路军改编为第七路军，参加叛变的官兵受到惩处。

1934年2月，蒋鼎文亲临战地，在江西指挥反共战争。他任东路剿匪军司令，驻于龙岩，指挥十一个师又三个旅的兵力，采用对江西共产党严密包围的战略。10月，共产党部队处境困难，突围长征。1935年春，蒋鼎文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竭力使其治理的地区稳定，因为在那里共产党的地方游击队的势力还很活跃。

1936年12月4日，蒋鼎文的母亲七十寿辰，他请假祝寿。正在回家途中，他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叫他立刻去西安汇报。他急忙赶到家中为母亲祝寿后，于12月8日飞往西安。另一次新的对共产党的征伐即将开始，蒋鼎文被任命为剿匪军前线司令，前往甘肃平凉。据说，蒋鼎文和张学良有私交，置他们军事上的平行地位是很可取的。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拘禁了蒋介石及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释放蒋介石的复杂的政治谈判中，蒋鼎文充当了中间人，为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12月17日，他乘飞机离西安，18日到南京作了汇报。接着宋子文飞往西安，进行谈判，达成和平解决。1936年12月25日释放了蒋介石。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蒋鼎文任蒋介石驻西安行营主任，负责加强黄河流域地区的防卫任务，和共产党正面对峙。那时，共产党已在陕北建立了新根据地，1937年9月后又与国民党联合抗击共同敌人——日本。

1938年4月，在陕西祭祀皇帝陵墓，蒋鼎文代表国民政府，以主人身份接待共产党代表团。那时，高级共产党首领张国焘向蒋鼎文提出要求保护。蒋鼎文同意其请求，把他护送到西安。张国焘的背叛以及以后有关他的报导，增加了国共双方的猜疑，双方关系开始恶化。由此国民党加强他在西北的军事地位以遏制共产党。

1938年6月，蒋鼎文任陕西省主席、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1939年2月还担任包括陕西在内的第十战区司令。1941年5月，他被免去陕西省主席职务，任蒋介石的西安行营主任。当时黄河防线处于日军强大压力之下，1941年10月，日军渡河占领郑州，但不久被迫退出。12月，蒋鼎文任第一战区、冀察

战区（包括日军占领区在内）司令，司令部设在洛阳。他计划利用陕西东南的太行山加强黄河防线。庞炳勋在他手下任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1943年4月，庞被俘。国民党军队一直控制着这一地区，直到1943年9月撤到黄河南岸。

1944年4月，日军执行“一号”计划，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南渡黄河，进入河南，准备把中国切割为两部分，蒋鼎文和他的副手汤恩伯所率部队在河南平原大溃败，日军向南进军直抵广西。1944年7月，蒋鼎文辞去一切职务，退休住在重庆。战争结束后，迁居上海。

在1946年中开始的与共产党的内战中，蒋鼎文并不活跃，1947年1月，他去欧美游历，1948年2月回到上海。他参加了选举蒋介石为总统的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1949年3月，他离开大陆迁往台湾，他在那里并不活跃，当国民政府从大陆迁到台湾时，他被任命为蒋介石总统办公室国策顾问。

蒋 廷 黻

蒋廷黻（1895.12.7—1965.10.9），学者和外交家。1923—29年，1929—35年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外交史。1936年出任驻苏大使。1938年2月任行政院政务处长，1947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61年出任驻美大使。

蒋廷黻出生在湖南邵阳。他父亲蒋恕学（音）是一个自耕农，并开设一家杂货店，生活虽不富裕，但尚称安适。他的家庭如一般中国人一样重视子女教育，但远远说不上有追求学术上成就的要求。

蒋廷黻五岁时，为准备入学，和他的同胞弟兄以及堂兄弟从塾师读书。一年后，他进入邻近学校习读孔孟典籍及史书，如《资治通鉴》及王夫之的《读通鉴论》。

1905年，蒋廷黻离家去长沙进明德学校。该校系胡元倓创办，他是当时著名的湖南教育家。1906年，转入湘潭的一所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他从此有机会学习英语。1911年发生革命，该校停办，校长林格女士准备回美国，蒋廷黻决定随同前去。他们到上海时，听说湖南形势大为改观，学校可以重新开学。因之，林格女士回湖南，而蒋廷黻独自去美国。

他于1912年2月到达旧金山，经华人区一个牧师介绍与青年会干事相识，安排他到密苏里的派克维尔进了派克学院，这是一所半工半读学校。他在派克学院学习一年后，无力支付第二年的日常费用，因此写信给湖南当局申请奖学金，他的请求获准。1914年他在派克学院毕业。

1914年秋，蒋廷黻进了欧伯林学院，1918年毕业。然后他去法国，以青年会干事身份在法军中做华工工作。1919年回美国，进哥伦比亚大学当近代史研究生，他与在美国攻读历史高等学位的大多数的中国学生不一样，他的毕业论文并不以中国历史为题，而是研究英国的政治史，题为《工党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自1880年以来主要在议会中对英帝国主义的反动之考察》，1923年2月，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在纽约当研究生时，领导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生会，并主编英文期刊《中国学生月刊》，该刊流传全美。1921年时，他作为中国学生同盟的代表之一，去华盛顿观察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动向，以防止向日本屈服，而损害中国的重要权益。

1923年，他离国十余年后回国，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时，就很注意中国对外关系史。他在读中国外交史时，发觉都是一些洋人的活动，而中国方面的情况没有恰当表达。在二十年代时，由于首次能查阅清代档案文件，这一研究主题的重要性更显现出来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藏有清政府军机处和1861年设立的专司外事的总理衙门的档案，发表有关十九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文件。蒋廷黻在研究这些文件中，对清末中国外交关系的情况以及阻碍中国适应近代世界的原因，有了新的了解。

他在南开工作六年后，1929年因聘去北京清华大学当历史系主任，这对他的学术研究更为有利，故宫的档案近在身边，而且清华比南开经费充裕，可供收购私家收藏的书籍和历史文献以及名门收藏的资料。几年之中，他为清华筹设了一组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历史教席亦很完备，有著名学者如陈寅恪、雷海宗等人。他又减少教授讲课学时，以便有更多时间进行研究。由于他的推动，清华在中国是第一个实行教师休假制度。蒋廷黻是一位善于使学生了解他所研究的课题的重要性的教师。他还协助一些在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如费正清（以后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他于1932年到北平学中文，在蒋廷黻的

指导下研究中国文献。

1931年9月，日本侵占满洲后，蒋廷黻及胡适、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等人主办政治周刊《独立评论》。1932年5月22日创刊号出版，当即获得成功。很多大学生、爱国知识界和共产党人呼吁对日抗战，但蒋廷黻却很稳健冷静。他认为远东危机不过是正在酝酿中的全球危机的序幕；他认为中国在这个不利时机又无外援的情况下对日抗战是不明智的，他主张因循观望。1933年3月13日他写的社论中说：“中国从日本所受的耻辱不可能以零敲碎打的战斗就可以洗雪。在军事、经济、外交方面全无准备的情况下冒险出战，这不仅徒劳无益，而后果更坏，这只能促使敌人将我们蚕食殆尽。不要忘记，中日问题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世界问题。日本军阀肆意侵犯中国，不过是自掘坟墓而已”。

蒋廷黻的文章，引起很大注意。1934年夏，蒋介石通过银行家、政治家吴鼎昌，请蒋廷黻到牯岭咨询，他们的讨论涉及有关国家统一和日本侵略等问题，蒋廷黻强烈反对武力统一中国和全面抗击日本的主张。同一年晚些时候，他在南昌再次见到蒋介石。这一年是他的休假期，他准备去欧洲考察。蒋介石要他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先去苏联，试探苏联支持抗日的可能性，蒋廷黻同意前往。在莫斯科他会见了许多负责官员，阐明了中国国民政府希望苏联支持抗日的愿望，同时指出国民政府的外内政策，仍将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尼可夫向他保证说，反对共产主义并不妨碍友好关系，并举俄国和法国、土耳其的关系为例。斯还声称苏联迄今认为蒋介石是中国的唯一领袖。

蒋廷黻在苏联耽了三个月后，离莫斯科去西欧。他对所访问的国家的印象记，连续发表在《独立评论》上。1935年回国，他在9月30日的《国闻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总叙了他的观感，叙述了欧洲思想界的斗争，并认为一决雌雄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断言，西方的民主政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比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强大。

1935年12月，蒋廷黻回国不久，蒋介石在南京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邀请了《独立评论》的两名非国民党人员参加新政府，即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1935年12月，蒋廷黻离开清华大学到南京。

1936年10月，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以求改善中苏关系。国民政府希望一

且中国对日作战苏联能援助中国。然而，蒋廷黻很快就觉察到，虽然莫斯科冷静地注视着中国进入全面对日作战，但俄国共产党首领们无意于在那时直接卷入远东战场。

1936年12月，蒋介石被张学良拘禁在西安，在莫斯科，《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称誉蒋介石的领导，并认为只有他才有声誉和权威领导中国团结一致地抗日，并称西安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政客的阴谋。当时苏联驻华大使鲍哥莫洛夫正奉召回莫斯科咨询，他拜访了蒋廷黻，请蒋把《真理报》上的文章转发给中国国民政府。蒋照办，但删节了有关汪精卫的段落，因为汪精卫那时是国内的重要政治领导人之一。他深恐这篇文章中敏感而又没有根据的指责部分在国内发表，会引起对整篇文章的全盘否定，并在这严重危机时期造成国民政府的分裂。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在西安获释，对日作战势不可免。南京方面的有影响人士迫切希望苏联参战。蒋廷黻基于他对莫斯科情况的估计，竭力打消这种幻想，因此遭致国民政府某些官员的不满和反感。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9月，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达成共同合作的正式协议。蒋廷黻受命争取苏联的援助。不久，派杨杰由南京去莫斯科购买军火装备。杨杰报告苏联参战即将实现，南京不少有影响的官员深信不疑。身为驻苏首都的外交代表蒋廷黻被责为报导失实，1938年2月，蒋廷黻从莫斯科被召回国。

他回国时，看到中国与他两年前离国时大不相同，沿海城市沦入日本之手，国民政府撤到武汉。当时任行政院长，著名的财政家孔祥熙，催他复任以前担任过的行政院政务处长之职，他踌躇了一段时间后，仍决定专心从事著述。直到1938年国民政府从汉口迁到重庆后，蒋廷黻才在战时首都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职务。1940年初，为躲避日本人的轰炸，他负责将政府机关和医院迁到重庆郊区。同年，他受命编制国家预算。

从1942年底起，蒋廷黻着手战后救济工作，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1943年在大西洋城）、加拿大（1944年在蒙特利尔）和英国（1945年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会议。1945年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6年他因为与

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政策上发生分歧而辞职。蒋廷黻希望重新从事学术生涯，接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之请为客籍教授，许多中国友人劝他留在国内。那时蒋廷黻唯一希望的政府职位是当他的家乡湖南省主席，但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临时担任中国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1947年夏，他在纽约处理有关经济委员会的事务时，因常任代表郭泰祺不在，蒋奉命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9月，他是中国五代表之一，出席联合国大会。不久郭泰祺出任驻巴西大使，蒋廷黻被任命为中国联合国常驻代表。

中国在这个初成立的国际组织中影响很大，蒋廷黻想利用这个机会，逐步解决战后亚洲的众多问题。他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世界的基本力量。他认为西方殖民国家对附属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应该以明智远见的态度对待，不及时解决殖民地的问题，会使问题的解决更困难，代价更大，而更为不合情理。他还认为独立必须在前宗主国的合作下有序地进行才能获得。他是促使印度尼西亚独立的许多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和合作起草人。印度尼西亚于1949年12月独立后最早的行动之一是对中国的共产党新政权予以外交上的承认，他对这事感到很失望。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蒋廷黻在联合国的地位日趋困难了。1950年1月10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要求蒋廷黻立即撤走，他在这个国际组织中代表中国的权利受到挑战，蒋廷黻处之泰然，安理会否决了苏联的要求，马立克退出会场。此后七个月中，苏联抵制参加联合国机构。

于是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劝请苏联代表重回联合国，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席位，并在安理会成员中散发一件机密备忘录，从法律上讨论取消蒋廷黻的席位的问题。蒋对此加以反击，他对赖依的备忘录斥之为“坏法律、坏政治”。

从1950年起，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成为历次联合国大会的棘手问题，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引起激烈争论。蒋廷黻作为中国的常任代表在这场争论中为他的席位也是为他政府的席位力加辩说，他坚持不懈地说明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是中国人民选出的代表所制定和通过的宪法为基础的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蒋廷黻的发言，虽难以改变人们的观点，但他仍然赢得不

少人的尊重，其中也有他的反对者。

1961年11月，蒋廷黻出任中国驻美大使，1962年1月，在华盛顿递呈国书，同时又兼任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至1963年7月，以后由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刘锴继任这一职务。蒋廷黻在华盛顿任驻美大使，一直到1965年4月，后由驻西班牙大使周士楷继任。然后他迁往纽约，因病住院，1965年10月9日，因癌症死于纽约医院，时年六十九岁。

蒋廷黻的著作公开发行的有《清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该书原计划出版三卷，但只在1930年、1934年出版了两卷。他在1938年公余时间，写了一本《中国近代史大纲》，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中国在近代世界中的地位。他有关中国外交史的文章，有不少发表在《清华学报》上，他又是《中国政治社会学报》的编辑。

蒋廷黻和唐玉如结婚，后又离婚。1948年7月21日，与希尔达·沈结婚。蒋廷黻遗有继室和前妻的四个儿女。

蒋 作 宾 字：雨 岩

蒋作宾（1884—1942，12，24）湖北军人，北京政府官吏，1928年任中国驻德、奥公使。1931—1936年任中国驻日公使。

蒋作宾原籍湖北应城。幼时受传统教育，十五岁成秀才。长江中游地区的总督张之洞所施行的改革的一个部分，就是1902年在湖北设立新式学堂。他和宋教仁同时进入武昌的文普通中学堂，学校的课程中有军训课，蒋作宾今后决定从事军事生涯。

1905年春，他去日本，进东京成城学校。同盟会成立，他即参加，和孙逸仙等共和革命领袖结识，继续上学。1907年在士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1908年毕业后回国。

1908年10月他在北京应军事甄别考试，名列第二，授特科举人，在保定任军官速成学校教官。1909年调陆军部军衡司，他在那里从日文翻译了《步兵操典》。改编军队可以使中国强盛的主张在当时十分盛行，蒋作宾就是这种主

张的积极倡导者。他建议用五年时间逐步由国内外新式军校的毕业生代替所有的旧式军官。这种办法，在袁世凯的北洋军中也施行了。这个建议被采纳而付之实施。1911年，他任陆军部军衡司司长，那时，由新人替代旧军官的计划已部分实现。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为了自身的政治目的利用满洲人反对革新，蒋作宾在华北正从事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引起北京政府的怀疑，因此与一些同志去武汉，那时袁世凯的兵力正调往汉阳。

11月27日，汉阳为北京政府军占领，蒋作宾奔向九江，当时马毓宝在那里任督军，李烈钧为参谋长。当李烈钧奉命东去安徽处理那里的复杂局势，蒋作宾便在九江当了参谋长。

1911年12月，蒋作宾应黄兴等人之邀去上海商谈筹建政府以继承武昌军政府。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以孙逸仙为首的临时政府，1月4日，黄兴任陆军部总长，同日孙逸仙授蒋作宾少将衔任命他为陆军部次长。

蒋作宾向黄兴和孙逸仙提出革命军务必控制南京、武汉、北京这三点以巩固政权的计划，得到黄兴和孙逸仙的同意，蒋作宾先在南京、武汉加以实施。

1912年2月，清帝退位，经和孙逸仙达成协议，袁世凯在北京为临时大总统，孙逸仙等南京临时政府人员辞职，蒋作宾亦同时辞职。南北双方领导人间多次争执商谈后，4月，蒋作宾去北方在唐绍仪内阁任陆军部次长，但是陆军总长却是不同意“三点”计划的黄兴，而是北洋军人段祺瑞。

6月，唐绍仪辞职，其他同盟会员也都辞职，蒋作宾并未辞职。陆征祥继而组阁，蒋作宾出任工商总长，但为国会所反对，只能继续担任陆军次长。1912年8月，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蒋作宾尚未成为国民党员。

1915年夏，当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兴起，蒋作宾称病离职，被软禁在北京附近的西山。1916年春，由于全国反对，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袁邀蒋作宾到北京作为调停人争取得到黎元洪的帮助，蒋受命，但无成果。4月，段祺瑞任总理，陆军次长由徐世昌接任，蒋仅选入元帅府，这只是一个空衔。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这对蒋作宾的政治生涯有

利。他以黎的官方代表身份去河南彰德奠祭袁世凯。7月，黎元洪任命蒋作宾为副总参谋长。他利用持有小小权力的地位反对段祺瑞，以增强黎元洪的势力，段祺瑞称他为“总统府的四个恶棍”之一。

1917年7月，张勋图谋复辟，蒋作宾协助黎元洪避入北京使馆区，张勋软禁蒋作宾。复辟失败，蒋获释。7月，离北京到上海。

1917年9月，蒋作宾离上海去美国，他在那里逗留到1918年11月之后，又去法国凭吊战场，并在游历了巴尔干和土耳其后，于1919年2月回国。

1921年，蒋作宾参预驱逐自1913年以来就霸占湖北的北洋军阀王占元。蒋作宾、何成濬、萧同瀛、孔庚以及其他一些湖北人获得湖南首领赵恒惕、鲁涤平的支持，并经武昌警备军的资助，逐走了王占元。蒋作宾早就被提名为湖北省行政长官，但在8月间，吴佩孚抵制湖南和湖北派的企图，并任命他自己的部下以控制湖北和长江中游。湖北派的势力烟消云散，蒋作宾去广州充当孙逸仙大本营的幕僚长。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蒋作宾幸免被俘，他受孙逸仙之命去上海疏通浙江省长卢永祥等人，回击陈炯明的支持者直系军阀。6月11日，黎元洪在北京复任总统之职，蒋作宾与他的老上司恢复联系。

1922年8月，孙逸仙到上海，蒋作宾和其他一些南方集团的人到沈阳争取张作霖的合作。接着，陈炯明从广州被驱走，孙逸仙于1923年2月返回广东，蒋作宾也回到广州。蒋受孙之命，继续和卢永祥保持联系。

卢永祥虽然在当年秋季的战争中从政治舞台上摔了下来，然而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在华北推翻了直系军阀，张、段、冯三个胜利者邀请孙逸仙商谈国事，11月，孙经日本北上，蒋作宾先于孙北上，在天津迎候，并在与段祺瑞的谈判中任孙的顾问。

孙逸仙的使命失败了，失败的真相因孙逸仙于1925年3月癌病在北京逝世而未能详知。蒋作宾未回广州，留北京长达六个月，以观动静。1925年冬，蒋去河南和省长岳维峻接触，岳系冯玉祥的国民军司令官，当时冯玉祥正在反对段祺瑞。

1925年11月，冯玉祥和郭松龄合作反对张作霖。国民军从直隶被赶到内蒙

后，蒋作宾在南昌拜访江西省长方本仁之后回到广州，那时国民革命军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准备等待已久的北伐。

1926年7月，蒋作宾被任命为湖北宣抚使，因为他是湖北人，这对北伐进军有利。8月11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蒋作宾被派往沈阳，劝张作霖对吴佩孚采取行动。

吴佩孚和奉系未能合作阻击国民革命军的进展，1926年10月10日，武昌落入南军之手。其中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蒋作宾的活动是原因之一。从此结束了吴佩孚在湖北的控制权。蒋作宾经由朝鲜、日本后到达汉口，返回国民革命阵营。

蒋作宾出席了12月到1月间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会议，1927年1月，他去南昌见蒋介石，受命去劝说他的老朋友、当时的安徽省长陈调元，他的使命成功，陈调元于3月初支持国民革命，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三十七军军长，蒋作宾任安徽政务委员会主任，筹组新的省政府。

蒋作宾去南京任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1927年8月，蒋介石引退后的谈判期间，蒋作宾留在南京。当国民党内桂系军人和保守的西山会议派与武汉的国民党集团重又联合，蒋介石又于1928年1月上台。根据蒋作宾的经历和他与北方人士的关系，任命他为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仿照南京国民政府的新机构，为了在北伐第二阶段时能协调行政计划工作。他又是山东政务委员会主席，因此他也卷入了1928年5月在济南国民革命军和日军的冲突。

1928年6月初，国民革命军进占北京，蒋作宾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掌管北京市政。6月末，该委员会取消，各项有关工作由南京国民政府相应的部门接管。蒋作宾为政治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他的权力，在冯玉祥、白崇禧、阎锡山之下。8月，蒋作宾回南京，向蒋介石、谭延闿表示愿意出使国外。1928年10月10日，蒋介石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两天后，任命蒋作宾为中国驻德公使。

同年秋，他离中国去柏林就任新职，11月，兼任驻奥公使。据说，蒋作宾力求结成德、苏、中三国同盟以抗击预期即将到来的日本对中国的进犯。他曾与苏联驻德大使非正式讨论过中苏关系，1929年3月，他在日内瓦参加国联裁

军预备会议时，又与苏联外交委员李维诺夫交换过意见，接着他向南京政府报告李维诺夫关于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南京方面指令他暂时搁置此项谈判。其原因在后来显示出来了，因为国民政府在1929年7月想夺取中东铁路。蒋作宾在柏林任上提出采取克制态度的忠告。11月间苏联采取军事行动，这一事件很快结束，1929年12月22日签订的伯力议定书确定恢复满洲原状。

蒋作宾作为代表出席1930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联盟第十一届会议。1931年春，在他出使德国两年后，要求请假回国，还要求准许他途经苏联并在那里游览，他的要求获准。4月，他应李维诺夫之邀请去莫斯科，他在苏联首都进行了正式访问，然后去乌克兰、高加索、苏联中亚地区游览，经西伯利亚铁路回国。

7月，蒋作宾回到南京。鉴于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他敦促南京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以解决重大问题。1931年8月，他被任命为驻日大使。9月初，他到北平和张学良讨论满洲防守方案，9月15日，他在到达沈阳后，会见了日本官员，同时辽宁省主席向他报告了日本的敌对行动愈来愈厉害的情况。蒋作宾乘火车继续登程去日本，9月19日晨当他车经朝鲜平壤时，得知日军已袭击了沈阳。

蒋作宾去日本的使命是防止事态的发展。他赶到东京，和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在他公开声称的“协和外交”政策的原則下开始谈判，力图挽回局势。币原敦促南京外交部长以中日直接谈判来解决问题，不必求助于国联，他反对那种在中国国内流传的认为中日问题，得用世界大战来解决的看法。蒋作宾认为，这样的战争不论其结果如何，对中国总是不利的。

1931年12月初，币原离职，由犬养毅继任，蒋作宾回国请示。蒋作宾在回任之前，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1月，中日在上海开战，5月，犬养毅被刺，关东军的行动益发放纵。尽管蒋作宾多次正式抗议，日本还是在1932年9月承认了它扶植的满洲国。

1933年，蒋作宾被召回咨询，为期甚久，但他一直是驻日公使。王宠惠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1935年2月，他赴任途中在东京停留，与日本外交大臣广田弘毅会谈，国民政府采取步骤以消除与日本发生磨擦的可能因素。5月，

中日双方提升外交公使馆为大使馆级别。1935年6月，蒋作宾作为第一任中国驻日大使向日本天皇递呈国书。

是年秋，蒋作宾和广田交换各自政府关于解决中日分歧的建议。由于中国方面要求恢复1931年9月18日前的原状，双方未取得一致意见。10月，蒋作宾回南京出席国民党会议时，他无法就中国的政策，提出任何一点实际结果。

在中国、在日本，都预期蒋作宾将出任南京外交部长。然而在12月初，张群担任了外交部长，蒋作宾被提名为内政部长。1936年初，许世英继任驻日大使，蒋作宾回南京，接着到各地视察地方行政改革。1936年12月初他到西安，正遇蒋介石访问西安，当西安事变发生时，他和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要员一起被拘禁在西安，12月底，蒋作宾和其他人员与蒋介石一起获释。

西安事变后，中国方针改变，中日战争于1937年夏爆发。南京政府迁移后，11月间蒋作宾任安徽省主席。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安徽省政府由安庆迁往六安。大量中国军队集中于此，准备徐州会战，李宗仁为战区司令，11月间兼任安徽省主席，1938年1月25日蒋作宾去职，前往重庆。

1940年冬，蒋作宾任新成立的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的政务组主任，当时他血压很高，仍力任此职。他在参加1942年元旦聚会后病倒，便请求辞去各职，1942年12月24日歿于重庆。

蒋作宾著有一书，记述他第一次欧美之行。他还写了《蒋雨岩先生自传》，1945年在重庆出版。

蒋作宾1912年与张默君的妹妹张淑嘉结婚，张淑嘉死于1938年。他遗有七个儿子：蒋硕民（1913—），数学家，在哥廷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历任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蒋硕英（1914—），军官，在台湾。蒋硕豪（1917—）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民航组织任高级技术官员。蒋硕杰（1918—），经济学家，在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蒋硕治（1920—）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波音飞机公司任数学分析员。蒋硕平（1923—）在台北任行政院首席公共关系官。幼子蒋硕健（1923—），在北京任清华大学化工系讲师。

他还有五个女儿：长女蒋硕德与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厉德寅结婚，以后住在

上海。次女蒋硕真与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数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程毓淮结婚。三女蒋硕美死于1950年。四女是医生，她丈夫也是医生，在沈阳工作。五女蒋硕能幼时即过继给邵元冲和张默君，后与台北合作银行总经理王敬柱结婚。

蒋 纬 国

蒋纬国（1916.10.6—），蒋介石的次子，在台湾任重要军职。

蒋纬国生在上海。他的幼年情况不详。1934—1936年在苏州东吴大学学物理学，并为江苏省训班后备军官。

1937年9月，他去欧洲，进慕尼黑的军事学校学习德文和德国军事科学。他在获得少尉荣誉军衔后，进德军九十八团见习，1938年3月，随军入侵奥地利。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蒋纬国离德去美国，历时一年，先后在美国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基地空军学校，及肯塔基州诺克斯堡陆军装甲部队中心当学员。1940年3月31日在纽约唐人街的一次集会上，他发表演说，谴责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日伪政府。

1940年11月，蒋纬国回国，经政治训练后，于1941年在第一军第一步兵师任少尉。第一军由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统率，军部设在西安。第一军的任务是阻拦分布在潼关附近黄河河套一带的日军和抵御北边的共产党军队（名义上与国民党联合）。由于蒋纬国通英语，1942年时由他陪同威尔基等一行视察陕西战线。1943年6月蒋纬国由华西卫理公会主教主持其洗礼仪式而成为基督教徒。8月，他去印度进美国陆军主办的坦克中心受高级训练。几个月后回国，重回驻守在潼关的部队。直到1945年他才离开第一师，当时已晋升为少校。

1945年，蒋纬国晋升为中校，任第616步兵团的营长。在与共产党作战期间，他主要是在装甲部队中服役，在第一坦克团中先任主任参谋后任副团长。国民党装甲部队全部参加了1948年11月初在陇海路东段开始的淮海大战。当时已获上校军衔的蒋纬国担任装甲部队副司令官。在此次关键性的战役中，国民党几乎损失了全部装备。蒋纬国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逃出徐州，免于被共产

党俘虏。

国民党迁到台湾后，蒋纬国于1950—1953年任装甲部队总司令。1953年，他去美国，进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的指挥参谋学院，1955年7月回到台湾，任国防部G—3作战处副主任，其兄蒋经国则在国防部任要职。1958年3月，任G—5计划处主任、兼国防部联合作战计划小组副主席，同年年底，任装甲部队少将司令。1959年，进布利斯堡的美国陆军防空学校，回台湾后，晋升为中将，任中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院长。蒋纬国在台湾只是在军界有其地位，并不是在政治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从美国回来后，成了台北扶轮社的活跃分子，参加该社主要的是美国人和会说英语的中国人。

中日战争期间，蒋纬国和东北的一位富商的女儿石静岩结婚，她在台湾分娩时去世，蒋纬国后又和一位美貌的中德混血女子艾伦·德丘（译音）结婚。

简 照 南

简照南（1875—1923），实业家，创办并经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简照南生于广东南海县，世代都居住在那里。十九世纪末，简家的一些贫苦家属迁往暹罗（泰国）及东南亚其它地区侨居。简照南有幼弟两人和姐妹两人。

简照南年青时去日本经商，主要经营海货。1894年，其弟简玉阶，年方十八岁，去日本协助他经商，幼弟简玉甫留居广东家中。二十世纪初，简家兄弟在日本经营的行业失利，乃去香港，希望有所挽救。简家兄弟在香港经营百货，除与日本商行有营业来往外，也与华人社会有营业来往，尤其在暹罗，因为他的叔父简铭石在那里是一个生意兴隆的饭店老板。

简照南逐渐注意到中国人吸的卷烟是由英美烟草公司推广到中国的，一些中国商人虽然在华北开设了北洋烟草公司，但是中国市场仍被英美烟草公司霸占。简照南十分关注这一新兴工业。1905年，为抗议美国歧视华侨的措施，中国国内抵制美货，简照南此时决定实行他开设卷烟厂的计划，1906年他在香港设立南洋烟草公司。公司名称的初意，在表示补北洋烟草公司之不足，但

以后南洋的另一含义是指东南亚洲了，这是因为南洋烟草公司这一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主要出于爱国之心的东南亚华侨的支持。

南洋烟草公司是一家制造完全仿照西方的商品的中国公司，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当抵制美货运动结束，公司产品的销路就马上下降。可是，简家兄弟仍坚持不懈，简玉阶亲自到东南亚去打开销路。此时，幼弟简玉甫亦加入了这一公司，后来，他常驻在新加坡，经管那里的公司事务。

销路日有起色，又得到在曼谷的叔父从经济上给以资助，1909年简家兄弟在香港重组他们的企业，更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以后几年中，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有利于该公司的发展，有助于在华侨中推销它的产品。在新加坡的幼弟简玉甫，曾给孙逸仙领导的共和革命运动以物质支助，虽然是他个人馈赠，但很可能是由该公司出钱。1915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改为股份公司，它是最先采取这种办法的中国企业之一。当时，他拥有资金一百万港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大陆开办卷烟工厂，但其营业处仍设在香港。

该公司的业务迅速发展，1918年简家兄弟决定再次改组，将他们的公司总部迁往上海，资金增为五百万港元，并大量招股。在上海的粤籍商人劳念祖系新入股者之一，成为该公司的董事。设在香港的工厂继续运转，设在上海的工厂则扩展极快，并在汉口、满洲设立新厂。简家兄弟是属于最早重视现代广告术的中国商人行列中的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发动了一次中国商界空前规模的新的商品推销宣传活动。他们随货奉送一些小赠品，但是更主要的内容是该公司侧重在爱国主义的宣传。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推销商品最有效的宣传口号是“中国人吸中国烟”，他们的宣传运动对一些规模小的中国卷烟厂亦间接受益，因此受到欢迎。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老板简照南成了上海商界一个闻人，因而被推举为上海华商会的监理。他在上海盖了一所属于当地第一流的住宅，并以好客见称。他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在家中设有佛堂。1923年，还不到五十岁，殁于上海。

简玉阶在其长兄简照南去世后，总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该公司在各地的制烟工厂日有扩展，还在河南等地开始种植烟草。虽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不能与英美烟草公司匹敌，但是它也占全国卷烟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在二十世纪二

十年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曾采取以生产不同的新的卷烟品种同英美烟草公司的各类卷烟竞争，因此这一家控制卷烟市场的外国厂商受到了威胁。

然而，1931年前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又遇到了困难，它的竞争者不仅有强有力的西方厂商，而且增加了新兴的咄咄逼人的中国人拥有的卷烟工厂。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该厂财政情况处于危机。日本占领中国沿海地区和香港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厂处于日本的军事管制之下。1945年战争结束，这些工厂重归该公司所有，但是该公司缺乏修配机器和其它设施的资金。虽然简玉阶名义上仍然是该公司的老板，可是据传该公司的财权已为他人所控制。

1949年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共产党保护了简玉阶，定他为允许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员。1949年秋，他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十五名工商界代表之一。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任命简玉阶为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他又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后又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省代表。1957年去世，年八十岁。

简 又 文 字：馭 繁

简又文（1896.2.8—），基督教牧师、学者，以研究太平天国而知名。

简又文幼年情况不详，他在广东出生。他在完成早期学业后，去美国深造，在美国奥伯林学院读书，1917年获文学士学位。回国后在广州岭南大学任英语和圣经讲师，同时担任教会学校岭南大学的基督教学生会的总干事。1918年又去美国进芝加哥大学学习，1920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20—1921年进纽约美国协和神学院。

1922年到1924年他在上海担任专供广东人使用的教堂“救主堂”的副牧师，并担任基督教男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编辑干事。1924年他放弃了神职去华北，在燕京大学任宗教哲学副教授，他在那里一直到1927年北伐军控制长江一带时。

简又文投身于称为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当政治部主任。1928年国民政府

成立后，简又文担任了各种官职：山东盐务使、铁道部参事、广东、广西省政府顾问、广州市政府社会局委员。1933—1946年在立法院工作。在这一期间，简又文始终关心教育事业，先后在各地协助创办了五所学校，其中有一所在新会，专为纪念他的父亲而创建。三十年代中期，简又文还发行和主编了好几种杂志，其中包括上海出版的《逸经》和香港出版的《大风》。

抗日战争结束后，简又文在1946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历史教授，他又是广东省史馆的创始人和馆长。1949年他移居香港，在那里继续研究近代中国史。1953年到1959年，他是香港大学东方研究院研究员和名誉研究员，他是香港大学出版的《东方研究杂志》编辑部成员，195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通讯院士。1964年到1965年去美国耶鲁大学当研究员。

作为历史学家，简又文的主要工作是研究1851—1864年的太平军起义，那次起义始于华南而后建立了太平天国。起义是由一个受基督教传教士影响的广东人洪秀全发动的，他认为他系奉神旨。简又文在青年时期就对这一历史课题感兴趣。尽管他有其他的事务缠身，但多年来一直对此进行研究，偶而发表他的研究心得。

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在1935年出版，书名为《太平天国杂记》，其中有韩文山著的《洪秀全的远见和1854年广西起义的原由》一书的译文，译文改名为《太平天国起义记》，译文还包括华尔斯莱著的《对华战记》十四章中夏芝叙述的《太平起义》。还有其他西方作者有关太平军起义的第一手资料。1944年，简又文出版了第二本著作《金田之游及杂谈》，记述了他所考察的与太平天国领袖们有关地点的调查材料。这本书中有一个值得注意之点，那就是对于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是基于西方列强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起义的谅解之上的说法，简又文并未提出确凿的证明。1944年，他又出版了《太平军广西首义记》，这是根据前两本书重新审订起义初期的历史。1958年到1962年间简又文出版了篇幅较大的三种研究太平起义的著作。1958年出版的三卷本《太平天国体制通考》，他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民族运动，也是一次宗教运动。这一点与当前共产党的解释颇有歧异。1961年简又文概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出版了《太平天国全史》，该书叙述到1866年的历史事迹。在这一著

作中包括许多简又文对太平天国历史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作的深思熟虑的结论和引用了许多有价值的第一、第二手材料。简又文研究太平天国的第六本重要著作，是他的有关洪秀全生平的《洪秀全传记》，已编入1962年台湾出版的《清史》中。1964年简又文写了一篇长文讨论有关太平天国的编史工作，题名为《五十年来太平天国之研究》，编入《香港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

简又文的妻子杨玉仙歿于1958年，遗有二子二女。

钱玄同 原名：钱夏 字：仲季

钱玄同（1887，9，12—1939，1，17），他运用了胡适辨疑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他在北京大学执教多年，经常给《新青年》写文章，曾担任该刊编辑。他还是中国文字拼音化和简化的一位创导者。

钱玄同生于浙江吴兴，他父亲钱振常（1825—1898）是一位学者，当过清朝的礼部侍郎，晚年在扬州书院讲学。钱玄同的长兄钱恂（死于1922年）是一位外交官，先后在中国驻俄、荷、意使馆工作，后来任命为中国留日学生的学监。

钱玄同早年聪颖，对文字训诂很有兴趣。他读了梁启超、邹容的文章有所感，在1904年剪去了辫子，这在当时是一种反满的表示。他和他的朋友在吴兴编印小刊物《湖州白话报》，他反对用光绪年号标明该刊物的出版日期。

1906年他长兄赴日本担任中国留学生的学监，钱玄同随同前往日本，进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语和教育学。他在东京结识了章炳麟、刘师培，而后又加入了同盟会。钱玄同十分佩服章炳麟，成了他的得意门生之一。1907年，他和鲁迅（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等人在东京组成“国学进习社”，并邀请《民报》主编章炳麟担任社长职务，给他们讲授文字训诂和文学。同时，他受到在日本的刘师培、张继的影响，又受到在法国的“新世纪”派的影响，钱玄同对无政府主义也发生兴趣，他还开始学世界语。

1910年回国后，他最初在家乡浙江一所中学教书，后来在浙江省教育厅当了一名小差事。1913年经章炳麟的另一个门生黄侃介绍，他去北京，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文字学和古代典籍，1915年入北京大学任职。据说陈独秀担任北京大

学学院院长是由钱玄同、沈尹默向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推荐的。总之，1917—1919年之间，钱玄同是和陈独秀在一起的，陈独秀是当时中国知识界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全力支持钱玄同和胡适创导白话文替代古文。后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自1918年1月起，改为由六人组成的编委编辑。除陈独秀外，还有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复、沈尹默，每人按月轮值。

钱玄同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古籍研究和文字训诂。他在初期时和章炳麟一样，是古文学派，大约在1910年到1917年间，他渐渐成了今文学派。今文学派认为前汉时流行的今文经较古文经为可靠。钱玄同同意康有为及其门人崔适的论点。1919年后，钱玄同、顾颉刚对一些主要的中国典籍的原作者和真伪进行新的探索。他们两人都是受了胡适的辨疑方法的影响，虽然他们在北京大学时曾是崔适的学生。他们研究的结果却推翻了两个传统学派的结论。钱玄同怀疑古典籍的正确性最为激烈，以至在1925年8月把他的名字改为“疑古”，此后常常以“疑古玄同”署名。

1919年五四运动后，钱玄同也致力于文字改革，他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等人，用拼音字母编了一本字典，并力求中国文字的标准化和拉丁化。他又致力于简化汉字，他向教育部提出了二千个简化汉字，教育部采用了三百多个在全国推行。

钱玄同除为《新青年》、《古史辨》写文章外，还为《独立评论》、《语丝》、《努力周报》、《国语周报》写了不少文章。他在1931年写的再论《经今古文问题》，曾由田中信吉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他的《说文段注校笺》，对段玉裁有关《说文解字》的见解有所注释。他的《说文部首今谈》在1933年就已写成，但到1958年才出版。钱玄同晚年居住在北方，1939年1月17日在北平中风去世。他的儿子中最知名的一个是原子物理学家钱三强。

钱 穆 字：宾 四

钱穆（1895.7.30—），学者，他以写作中国思想史和哲学，以及他的

教科书《国史大纲》而知名。1951—1965年他在香港任新亚学院院长。

钱穆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家庭中，早年丧父，他母亲无力供他去村塾上学，直到十二岁时他才上学。钱穆机敏，他的老师鼓励他继续学业，家中千辛万苦才使他在无锡中学校毕业。但是再入高等学校已属无望，1912年他中学毕业后当了一名乡村教师。

在中国，一般小学老师的教课担子是很重的，但是钱穆还是利用闲暇时间继续研读中国文史典籍。1921年春，经他朋友介绍，钱穆在厦门私立集美师范学校得到了一个教席，这是华侨慈善家陈嘉庚所创办的学校。钱穆在那里教了一学期书，1921年秋天又回到江苏，进无锡省立师范学堂当教师。他在那里有充分的时间实行他的计划，开始为一些报章杂志写文章。直到1924年4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墨子的文章《墨辨探原》之后，他的严谨写作才受到很多读者注意。

1925年1月，奉军开入长江下游，无锡成了战区。学校全部停办，钱穆家被劫。在此困难时期，钱穆为了维持家庭开支，将他的一部《论语要略》书稿卖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内战绵延不断，学校继续停办，钱穆经三个月功夫，专心校译《公孙龙子》。1926年，他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重又执教。他将在校授课的讲稿写成《国学概论》一书，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本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入门书，很快为全国各中学当作课本。

1928年秋钱穆家中多遭不幸，三个月内他的妻子、儿子、长兄相继去世。钱穆既要付出一大笔丧葬费用，又得赡养母亲。接着1929年秋他应聘去苏州中学教书，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他有关公元前四世纪的惠施、和公元三世纪初的公孙龙两位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研究著作，钱穆的经济困境因此有所好转，他同时又准备为商务印书馆创议的《万有文库》写有关墨子、王阳明哲学思想的论著。

1930年钱穆的生活开始了新的景象。这一年春天他再娶，岁末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有关汉代儒家、文献学者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给1891年发表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以致命抨击。康有为的主要论点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典籍均出于刘歆伪造一点上，钱穆对此加以驳斥。因钱穆的学术成就，燕京大学聘他为讲

师。1931年他离开燕京去北京大学任副教授。

在以后的岁月里钱穆回忆起抗日战争前在北京的这一段生活是宁静的。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他经济上有保障。1933年春，他完成了有关古代中国哲学的研究，1935年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许多学者都认为是清代版本考据的确切总结。接着在1937年又出版了《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史》，这同样是一部有关学术思想史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里，钱穆论述了清代儒学和宋代理学一脉相承，这种关系因清代学者对宋代理学的抨击和章炳麟、梁启超等人的蔑视而模糊不清。在序言里，钱穆又反对为变革而革命的当代的全盘西化论。他在以后的著作中，多次重述了这种观点。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钱穆由香港去湖南长沙，加入了京大、清华、南开合并组成的临时大学的行列。1938年春，随学校迁到云南。当时因为书籍缺少，他决定编印他的讲稿供学生参考利用，写成了中国由古至今的通史《国史大纲》，于1940年出版。此后几年中，成了国内通用的历史教科书。

《国史大纲》企图通过对中国过去历史透彻的认识，揭示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此书具有许多创见的内容，但也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判断。这本书是在外国侵入中国时写的，所以强调了异族统治的残暴，而忽略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这本书出版后，钱穆成了中国史学界稳健派的一名能言善辩博闻强记的代言人。

当《国史大纲》出版之际，他得到老母卧病的消息，他离云南，经香港，化名回到他母亲的居住地苏州，在他母亲弥留人间最后的几个月，他匿居在日本占领区侍候母亲。1941年他经香港飞往重庆，然后去成都，在那里度过了大约六个年头，他任华西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

1946年夏，钱穆回到江苏。他感到战后的气氛不利于学术研究，所以受聘到昆明云南大学教书。1947年，由于别人的劝说，他回到了无锡，在座落于太湖之滨的小山丘上的江南大学教书。钱穆很喜爱这个地方，并愿意致力于把江南大学办成一所出色的高等学府。但是1949年春共产党的军队席卷南下到了江苏，钱穆逃往香港。

1950年秋，钱穆等数人办了一所夜校，帮助解决逃到香港的中国青年学生

的教育问题，夜校约有学生五十人，授以大学文科和商科学程。起初，夜校教室系从一所中学租来，并兼作教职员的宿舍。1951年春，钱穆决定把夜校改为日校，这就成了“新亚书院”。钱穆的中国史课程，在学院中最受重视。这所学校揉合了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和西方的导师制。1954年后，新亚书院得到耶鲁大学，亚洲基金会、洛氏基金会、燕京哈佛社、英国文化协会、香港政府、香港孟子教育基金会的经济支助，因而使书院能在物质设备和学术计划方面都得到了发展。

钱穆在教育事业上作出了贡献，得到了台湾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嘉奖，1955年3月授以奖金和奖章。7月，香港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应耶鲁大学聘请在春季始学期间讲学，6月，荣膺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期间，他又访问了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同年秋，他在回香港前，去英、法、德、希腊游历。1965年6月钱穆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但仍为该校校董。1965年—1966年他在吉隆坡任马来亚大学汉学教授。

钱穆写了很多有关中国历史、哲学、古典籍方面的著作。他的《国史新论》一书，于1955年在香港出版。

钱 三 强

钱三强（1913—），核子物理学家，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钱三强出生于北京，是语言学家钱玄同的儿子。他幼年时的历史不详。1936年主修物理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中法教育基金奖学金去法国留学。他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在巴黎居里放射研究院工作了几年。1940年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的题目是《氢原子聚变裂变研究》，以后在巴黎继续研究核裂变。因他的核子物理研究成就，1946年获得法国科学院的物理学金，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全会在巴黎召开，钱三强系出席全会的中国代表团的技术专家。

他旅欧十余年后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和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49年他是出席在巴黎和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团

员，他代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那时，他又访问了苏联。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后，他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他还是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重要成员，他是全国青联的副主席。五十年代间，他多次作为中国代表团团员去欧洲出席由共产党主办的会议。

钱三强的主要工作是筹划和指导全国科学发展规划中的重要部门，致力于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成为核强国。在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只有为数有限的受西方教育的核物理学家，他就是其中之一，五十年代初，他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负责筹划一项先进研究方案，并筹集人力。1953年初，他率领中国科学院的重要代表团访问苏联，他们考察了苏联的原子能研究事业，要求苏联的技术援助，要求参加共产党集团共同组织的原子能研究活动。钱三强是参加1953年3月斯大林葬礼的中国代表团团员。1954年2月，他率领科学代表团去苏联访问。

1955—1959年间，在苏联对共产党中国核物理领域方面提供基础设备和协助训练科学人员期间，钱三强起了显著作用。1956年在莫斯科附近的杜布纳建立的联合核研究所，为中国物理学家的深造起了重要作用。苏联为中国的原子能研究工作提供了一所实验反应堆、一个回旋加速器以及其他设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从苏联取得装备、派遣科学家去杜布纳受训之外，还改组了本国的核研究机构，1958年中国科学院的现代物理研究所改为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继续任所长。这个研究所的工作范围包括原子物理、放射化学、放射生物学、宇宙射线的试验、反应堆、回旋加速器等等的各项研究。195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钱三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重大成就》的文章。

1954年，钱三强任科学院秘书长，1955年任科学院学部委员和物理数学化学部常务委员。1959年秘书处改组，加强党对科学院的领导，杜润生任秘书长，钱三强任副秘书长。他还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物理学会副主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他公开批评了中国一些科学家的“反社会主义”态度，之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1960年后，为中苏关系紧张和苏联科学技术人员从中国撤走，中国的原子能研究工作遇到了困难。尽管有这些困难，钱三强和其他一些高级科学家继续推进他们的发展核能力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在1964年10月、1965年5月、1966年5月几次核爆炸成功，显示了他们努力的成果。

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也是在欧洲学原子物理的。1949年后，她是原子能研究所的低能量加速器实验室计数机组组长。1957年1月由于她在核乳化过程的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获得国家的奖励。她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钱 大 钧 字：慕 尹

钱大钧（1893.7.26—），军官，多次负责编训国民革命军的许多队伍。他是黄埔军校的教官、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务长。他是蒋介石的助手，后来成了他的侍从室主任。1942—1943年任陆军部政务次长，1945—1946年任上海市长。他在台湾从事促进体育运动的工作。

钱大钧生在江苏昆山，兄弟五人，居幼。他原籍江苏无锡，四岁时，父亲钱自梅将家迁居苏州。六岁时，从长兄钱松尧读书，十岁，已熟习应科举试所需各典籍，后又进几所学校读书。

钱大钧十五岁时，父亲去世，家境困难，钱大钧去上海与兄钱季文（译音）同住，其兄促其从商，钱大钧无意于经商，乃回苏州。他在去上海前，曾在常州初等学校读书，获准投考苏州初级军事学校，经考试合格，1909年进入该校第四班。

初级军校在1911年革命爆发时停办，钱大钧去上海参加学生军。当时，钮永建在松江办了一所陆军干部学校，钱大钧进入该校。六个月后毕业，当了一名警卫队小队长。江苏初级军事学校复学，他回校补训，1912年毕业，回松江当一名排长。

1913年二次革命时，他参加了袭击龙华及上海兵工厂之役。失败后，松江军退到嘉定后解散。钱大钧由钮永建的建议去日本，认识了孙逸仙，并去听

孙逸仙集团在大森组织的讲演会。1914年日本侵占青岛，留日中国学生愤而归国从军，钱大钧亦回国，进了武昌第二军事预备学校。

1915年，袁世凯准备称帝，各军事学校内搜寻革命分子。钱大钧因被湖北都督王占元怀疑而秘密去沪，那时，钮永建在上海附近的松江，打算重整他的旧部。钱大钧在上海《时事新报》担任日文翻译一个月后，就投向钮永建，来往于上海及临近地区，帮助钮永建组训新军。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任总统，钱大钧回武昌军校，1916年12月毕业后进保定军校预备队，1917年4月，又被派去日本深造，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第十二班炮兵科。

1919年6月，钱大钧毕业，1920年初回国，派往保定军校，先任支队长，后升任分队长。7月，直皖战争爆发，保定军校停办，10月，北京拟恢复军校，钱大钧任筹委会委员。他认为北洋军阀不重视保定军校的工作。他的政治倾向又一次引起了别人对他的怀疑。1921年夏，他辞去九班炮队负责人之职，前往广州。

钱大钧投入粤军，在李烈钧的第一师当少校参谋。钱大钧在华南和江西多次参加战斗，1923年提升为中校。

1924年，钱大钧系筹建黄埔军校的委员会成员。5月12日，他到黄埔军校当兵器学教官，11月初，升为代理主任教官，11月9日担任新设立的参谋处的主任。

1925年1月，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率领两个教导团发动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钱大钧在此次战役中任参谋长。2月15日，任第二教导团代团长，3月、4月参加棉湖、兴宁战役。4月末，奉召回黄埔组建第三教导团，任指挥官，6月，在广州一带消灭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蒋介石在前线时，钱大钧代行黄埔军校校长职务。

1925年10月二次东征，钱大钧在何应钦手下率第三教导团防卫博罗。攻占陈炯明的基点惠州后，10月22日，钱大钧率部攻打海丰和陆丰，以巩固广州政府在广东东江地区的控制。12月20日，他担任何应钦的第一师副师长。

1926年1月1日，钱大钧继何应钦任第一师师长。一个月后，又与王柏龄

调换，任第二十师师长。1926年7月，北伐开始，钱大钧任广州地区卫戍司令。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高潮，钱大钧在广州效法，4月16日颁布军法，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他又受命巩固粤北，去曲江和赣县遣散改编不可信的部队。1927年8月，南昌起义后，共产党领袖贺龙、叶挺撤向赣东南，钱大钧经苦战未能堵阻，将部队调往梅县企图击溃朱德的共产党部队。10月中旬，东江地区已趋稳定，钱大钧部队改编为第三十二军，1927年12月，他协助平定了张发奎和黄琪翔在广州的兵变。

钱大钧经福建、浙江北上。1928年4月1日，任松沪警备司令，警卫这一要害地区，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1928年7月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个训练治安人员和秘密警察的军校。北伐结束后，第三十二军以及第二十一师改编为第三师，驻守苏州，钱大钧任司令。他又担任了赣南剿匪司令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9年初，钱大钧任南京陆军总部总参事。是年春，他随同蒋介石征讨在长江中游地区的赣军，攻占武汉后，他把李宗仁第四集团军主办的军官学校改组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担任该校教育长。

1930年，钱大钧受命筹训第三师，该师第一旅参加了当年的中原大战，在阻击北方联军战役后，第三师改称第十四师，钱大钧继续任师长。11月，钱大钧和陈诚等人去日本参观日军秋操。

1931年1月，十八军军长陈诚兼任十四师师长。钱大钧继续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八十九师师长，1931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32年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停办，学员转入南京中央军校。钱大钧解除八十九师师长职务，另任第十三军军长。6月，任南昌行营主任。1933年春，中日军队在长城发生战事，钱随同蒋介石到华北，任保定行营主任。他在保定设立一个训练处，准备筹建新军。他还在何应钦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任事。

1933年5月31日，中日塘沽协定签订，当年年底，保定训练处撤消。国民党军队又开始了另一次对共产党的征战，钱大钧任鄂豫皖区国民党部队参谋长。凡是蒋介石去另一处地方为反对共产党在军事和政治上进行协调活动，钱大钧

总是协助蒋介石的活动。1934年2月，张学良任剿匪军副总司令，他的东北军从华北调往西北，张学良控制了武汉，钱大钧请辞未准。1935年1月，张学良任武汉行营主任，钱任参谋长。

1935年冬，共产党军向西北转移，国民党解散武汉行营。钱大钧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厅主任，兼任蒋介石的卫队长。因为需要执行新的保卫任务，他和国民党秘密工作头目戴笠密切联系。1935年春，钱大钧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6年6月，广东省实力派陈济棠反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陈济棠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驻兵赣南，态度暧昧。钱大钧和余汉谋是保定军校同学，又是粤军第一师的同事，所以蒋介石指令钱大钧与余汉谋接触，据说他用大量金钱收买，使余汉谋于7月初效忠南京，同时广州空军又倒向国民党，南方反叛的支柱趋于瓦解，钱大钧乃由余汉谋随同去广州以巩固在广东的权力。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钱大钧和蒋介石一起在西安。钱大钧一闻警讯，下令其警卫部队抵抗事变发动者。钱大钧负伤被俘。第二天，他见到了他的同学、张学良的骑兵部队司令何柱国，他被拘留在何柱国的司令部里。在蒋介石回到南京后，12月27日，钱大钧等其他被俘人员才获得释放。1937年2月，钱大钧复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钱大钧随同蒋介石视察全国各地。12月，国民政府撤出南京，钱大钧随同蒋介石去武汉。1938年2月，航空委员会改组后，钱大钧任主任一直到1940年。1940年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航空委员会由周至柔主持。

1941年春，蒋介石下令在军事委员会下组成运务处，由总参谋长何应钦任主任，钱大钧为参谋长。1941年12月，他飞往仰光视察，并监督从缅甸紧急输入物资到云南。1942年3月，钱大钧任陆军部政务次长兼参谋长。何应钦虽系陆军部长，但日常工作却由钱大钧和总务次长张定璠处理。

1944年，陈诚继何应钦任陆军部长，由于钱大钧在保定军校当支队长时，陈诚还是一名学员，所以钱大钧是陈的前辈。据此，钱大钧又调任总司令侍从室第一厅厅长，他与在蒋介石身边担任要职的陈果夫和陈布雷以及立法院副院

长叶楚伦来往密切。钱大钧还主持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是一个负责反对共产党的秘密特工机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钱大钧任战后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1945年9月9日，他与美国空军远东司令斯特拉特迈耶一起飞到上海上任。在这个中国最大城市建立有效的军政控制，是一件很艰难的事。1946年5月，吴国桢继钱大钧任上海市市长。

钱大钧回到老家苏州，热心乡梓工作，1946年4月，他当选为吴县参议会委员，以后担任议长。1947年他当选为出席国民大会的上海代表。1948年时，因共产党的进展，国民党的军事地位趋于恶化，钱大钧被提名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他担任西南战区副司令，1949年12月，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1950年钱大钧也到达台湾与他那一批国民党元老在一起了。

钱大钧热心于推进体育工作，他是台湾省体育联合会足球协会主席。1953年，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二届亚洲运动会时，中国足球队获冠军。1957年任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监委。1958年，他随中国足球队从台湾前往东京参加第三届亚洲运动会，中国足球队再度获冠军。1959年台湾派出中国球队参加在智利举行的国际篮球赛，获第五名，这个球队也是由他经营的。1960年他又率领中国篮球队从台湾前往罗马参加第七届奥运会。

钱 端 升

钱端升（1900.2.25—），政治学家，主要的著作是有关中国宪法的理论和政府问题，最有名的是《中国的政府与政治》一书。他是哈佛大学培养出来的超然派的知识分子，也是有影响的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他反对国民党的政纲，而欢迎1949年成立的共产党政府，但后来共产党指责他是右派分子。

钱端升出生在上海，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1912—1917年在南洋中学读书。1917—1919年，他在北京清华大学进了两年预备班，1919年夏去美国。最先在北达科他大学学习一年，1920年取得该校学士学位，又在密执安大学过了

一个夏天，以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此后四年中，他在哈佛获得了政治学硕士（1922年2月）、博士（1924年2月）学位。他适应当时中国留学生风尚，也取了一个西洋名字叫汤姆逊，但他回国后，从未用过这个洋名。

他的博士论文《议会：比较政府的研究》，说明了他的研究倾向。这个课题有力地反映了他主张代议政府和议会民主。此后二十五年中，他在国内一些著名大学教政治学，不断改进对政府机构研究课题的研究方法，他改进的并非新的分析命题或阐述体系，而是扬弃了某些政治学原理，最重要的是，他放弃了二十年代流行的那种认为国内法或国际法是远离政治的见解；还放弃了那种认为中国的问题可以靠立法获得缓解的见解。因此，长期以来，钱端升的著作着重于纯描述性的分析和对政府机构的研究。

1924年他回国时，国际法和宪法的研究对他和对中国来说，都是重要的。当时国民革命运动正在进展过程中，治外法权和列强在华租界都是属于争论激烈的课题，这些问题历来都是从法律的观点来处理的。钱端升在北京大学、北京教育学院当讲师时，就在北京大学主办的、颇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评论文章，显示出他的兴趣倾向于制度和行政方面。1925年，他在《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长文《近世宪法的立法和行政的关系》，他还发表了一些书评，如评格莱罕的《中欧新政府》、海钦却克的《德国、普鲁士的国家法》、杜格的《宪法条例》。钱端升不仅是一个学术评论家，还竭力支持国民党为结束列强支持的军阀混乱局面。钱端升根据国际法力争中国的国家利益。1927年，他给一个自由发表意见的刊物《现代评论》写了两篇有关上海租界地位和美国对华政策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力主所有外国租界归还中国，并认为外国列强应支持国民革命运动。

钱端升在北京大学时，常和一些围绕在王世杰周围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来往，王世杰当时是海牙法庭法官。钱端升和王世杰的友情，对钱端升今后的经历，无论在学术上或政治上，都是十分重要的。1936年、以后又在1942年，钱端升增订了王世杰的主要著作《比较宪法》一书。

三十年代初，钱端升转到南京中央大学，在该校法学院任政治学副教授。这一期间，钱端升发表了一篇研究著作，题为《法国的政府》，他对国民党的

事务也很热心。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完成了他的最重要的中文著作，一部两卷本的历史著作《民国政制史》，这是在钱端升主持下，由中央大学法学院公共事务研究所的学者们组成一个委员会编写成的。这本书详细具体地考察了1911年革命以来政府的更迭，这是一部现今有关民国时期政治历史的主要中文书籍。第一卷，研究中央政府；第二卷，研究省、县以及市政。这本书的作者得到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的协助。有关南京政府的长篇章节，是根据官方文献对国民党党史所作的第一次客观研究之一。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付印三次（1939年在长沙、1945年在重庆、1945年在上海）。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出版了该书日本译本，说明这本书很有用处。

由于日本占领区的扩展，钱端升随大学往西迁移，他由迁往四川的中央大学，转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这是在战时由北大、清华、南开合并组成的大学。抗日战争期间，他为《新经济》等杂志写了不少文章，同时更多地参加实际政治，他是1938年在汉口成立的国民参政会的成员。

1937—1949年间，钱端升四次访问美国，用英文写了一些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文章。1937年第一次访美是陪同胡适一起去的，其目的是争取美国官方和私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第二次是参加1939年11月18日、12月2日在弗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滨海区举行的太平洋学会的研究会议。他在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国家统一：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考察》。六年后，他作为太平洋学会中国委员会的成员参加该会第九届全会会议，1945年1月6日至17日在弗吉尼亚的霍特斯普林斯召开，他和蒋梦麟、张君勱、李卓敏等知名人士一起去参加会议。他因哈佛大学之请作为客笈专家第四次访美国，1947年12月到美国，1948年底回国。

钱端升在四十年代的英文著作和他的中文著作同样重要。他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从此在国外的学者中树立了声誉。1943年他写了一篇《战时中国的地方政府》文章，对恢复治理地方的保甲制作了有价值的分析。然而，在1948年，他发表了一篇引起争论的文章《中国政府军事的作用》，实际是对蒋介石的一种抨击。这是钱端升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前对国民党的最后评价。他说：“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能有力的遏制军事权力的是早期改

组后的国民党。但是当蒋介石取得国民党领导地位时，并未放弃他的军事欲望，而国民党不能起制约作用了”。

1950年，在钱端升从美国回国后，哈佛大学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61年重印）。这本书以他编纂的《民国政制史》为基础，对于直至四十年代末的中国政治机构和党派的演变和地位作了详细的考察。1948年的这本书与其以前的著作不同之处，在于对国民党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孙逸仙的三民主义、革命三阶段、宪政学说、一党专政等问题他能作出深刻的评述，他认为这一些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他认为“国民党政府”确实是失败了，这应归咎于蒋介石。1948年9月，他在哈佛大学写的该书前言，指出该书的明显缺点说：“此后数年中，将会看到一个多世纪以来长时期的变化中的最根本最重大的变革，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统治着中国大部分地区，我无法对中国其它地区的统治情况以及未来的前景加以描述，这只能在更为适宜的时机予以完成”。

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一书的价值，在于他所作的结论，并不因他个人的志趣而有所影响、有所偏重。在中日战争后期，他对政治生涯很感兴趣，王世杰推荐他当教育部次长和驻澳大利亚大使，但蒋介石本人加以拒绝。1945和1949年间，他又重新进行学术研究工作，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但并未放弃实际从事政治的欲望。由于他在国民党的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因此于1948年末他决定返回大陆，他希望能在国家未来政治生活中起更大的作用。

钱端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历，是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变革时期，自由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遭遇的典型。不管他如何公开支持新政府及其政策，但他和与他同样观点的许多非党知识分子一样，不得不经受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他以表面上的坦率和现实主义的态度，履行了那种严格的训练，否定了他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和经历，表示忠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经过这些考验后，钱端升的地位得到改善：1952年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参加多种机构，除担任英文刊物《中国建设》编辑部编辑外，他还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他还是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中允许存在的政党。钱端升还用很多时间参加对外文化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世界和平大会等共产党的活动，或当理事，或当副主席。

但是，钱端升未能在人民共和国取得与他的才能、兴趣和专长相当的地位。他对此颇为不满，自1952年后，他与一些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他们也自认为不受重视或在政治上未被重用，由此，在1956年和1957年初，当共产党放宽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政策时，钱端升等为在政策制定方面争取更多的发言权而公开进行鼓动。钱端升以及如章伯钧、费孝通、罗隆基、潘光旦等人，他们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百花齐放政策期间的活动不能不是反革命的了。确切地说，他们敢于如此活动是利用了共产党扩大非党人士参加政治生活的时机。但是，在百花齐放期间，许多方面出现了未曾意料的反共情绪浪潮后，共产党为了保持它的政治和理论的权威把非党知识分子当作替罪羊。钱端升等人被认为属于章罗集团，进行反党阴谋，被定为右派。钱端升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职务均被解除，但未被监禁。在五十年代后期，大跃进遇到了挫折，共产党又起用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知识分子。1961年12月，共产党当局对包括钱端升在内的370名百花齐放时的右派分子解除了右派的帽子。但是他未能重获显要地位。

钱 永 铭 字：新 之

钱永铭（1885—1958.6.19），财政专家，他一生中很长时期是从事交通银行的工作，他担任了该行的董事长职务。1928年后历任国民政府的各种经济要职。他还整顿了中兴煤矿公司，成为国内第二个大煤矿。他又创办了中兴轮船公司和复兴航业公司。

钱永铭原籍浙江吴兴，出生于上海。早年在南洋中学的前身育才学堂读书。十六岁毕业后，在上海的一个外国商行任职约一年，积资继续升学。他到天津在北洋大学读书一年，回上海结婚。关于他夫人的情况不详。

翌年，钱永铭获得官费去日本留学。1903—1908年，在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学习，专攻财政。当时大多数留日中国学生参加同盟会等团体组织的反满活

动，而钱永铭并未卷入。他在神户毕业后回国，1909—1911年在南京高等商业学校任教。

1912年，民国新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总长陈其美，派钱永铭到北京接管清政府的已停止工作的农工商部。他完成任务后，在新政府的工商部任会计课长。几个月后，他从北京回上海，与王正廷合办了一家运输企业中华航运公司。两年后，他去满洲为中国实业银行作经济情况的考察。

1917年，钱永铭开始了他的银行生涯，进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任职。这是一个有发行货币权的半官方银行，前一年曾因袁世凯下令停兑而丧失了信誉，正在改组中，钱永铭被任命为上海分行副经理。两年后，即1919年，升为分行经理。在钱永铭指导下，上海分行采用了近代银行业务的方法，整顿内部机构，扩大业务范围，钱永铭在中国处于严重的政治动荡时期，恢复了交通银行的信誉，稳定了该行业务。1920—1922年，他还担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

二十年代初，因华北政治纷争直接涉及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的地位，从而使交通银行的业务复杂化。1921年12月，张作霖支持梁士诒在北京组阁，但吴佩孚和直系军阀竭力反对，梁士诒被迫辞职，梁的去职是1922年春的直奉战争的直接导因。张作霖失败后，交通银行势必为北方的政治头目所接管。钱永铭建议，由老实业家、前工业总长张謇接替梁士诒任交通银行总理，这一建议即被采纳，钱永铭本人成为协理。1922—1925年他主持了交通银行的工作，在此期间他成功地使该银行保持独立地位。但是在1925年，张作霖支持梁士诒再度担任了交通银行总理，钱永铭去职。

当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钱永铭这一知名的银行家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用，他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后为代部长，当时挂名的财政部长是古应芬。1928年时他被调往浙江，在张人杰手下担任财政厅厅长。1930年，国民政府任命钱永铭为中法银行中方董事长，又授命他为中国驻法公使，但他并未接受这一外交职务。

1925年，钱永铭离开交通银行后，任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四行储蓄会及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主任是著名财政家吴鼎昌。1935年，吴鼎昌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钱永铭任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

钱永铭除了担负银行职务外，还参与了北方的重要工业企业，山东省的中兴煤矿公司就是一个显著例子。该煤矿在山东峰县枣庄，创办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二十年代中期，产量曾居全国第三位。但在1926年时因华北连绵内战而造成运输及其他困难，使中兴煤矿公司陷于严重财政窘境，1928年时生产停顿。1929年，钱永铭担任总经理，很快获得了一笔五百万元的银行贷款，添置新设备，用电气化操作，恢复了生产。四年后，又与陇海路达成协议，建造从煤矿的所在地枣庄通往沿海的连云港的铁路辅助线，以便把煤炭从煤矿直接运到停靠在海岸的轮船上。三十年代中期，中兴年产二百万吨煤，那时只有年产五百万吨煤的开滦超过中兴。

1938年，钱永铭被任命为交通银行董事长，该行在1935年成为政府的三大银行之一，在抗战时期，该行负有新的任务，负责资助工业发展。交通银行资助的重要企业中，有昆明的裕滇纱厂、长沙裕新纺织公司和贵阳的贵州实业公司。交通银行还创立了经纬纺织机器公司，生产中型纱厂的机械设备。在钱永铭主持下，交通银行不仅开展了国内业务，而且在加尔各答、仰光、马尼拉、西贡等地设立国外支行。他除了担任银行职务外，在1938年，任国民参政员，1947年当选为国大代表。中日战争后，他又担任了上海主要报纸之一《新闻报》的董事长。

钱永铭在发展中国的航运事业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他认识到为了把华北的煤炭运到重要集散地，发展航运事业是极为重要的。因此，1930年他在中兴公司下设立了一个航运部，1937年将航运部改组成为中兴轮船公司，拥有船只九艘。这些船只在战争时期，不是沉没了就是被国民政府征用了。战后，他从美国购买了一些剩余船只恢复了中兴轮船公司，拥有十艘船只，总吨位达五万吨。他还成立了复兴航业公司，并任董事长。国民政府给了他十一艘远洋船，总吨位达八万吨，作为补偿中兴轮船公司的战时损失。1949年共产党掌握了大陆政权后，接收了中兴的大部分船只。复兴公司的船只继续在香港和台湾担任运输任务，该公司的总部迁往台湾。

共产党政府成立后，钱永铭退休在香港，以后又迁往台湾。1958年6月19日在台北去世。

金 树 仁 字：德 安

金树仁（1883—），新疆省主席。他的统治手法引起了延续三年之久的回族反抗。1935年，国民政府因他和苏联秘密谈判商约，将他监禁起来。

金树仁生在甘肃洮河，他的幼年历史不详。他在甘肃省立学堂毕业后，获举人头衔。他一度担任师范学校校长。后进入甘肃政界，为杨增新所赏识。

清末，金树仁随杨增新到新疆当军事秘书，后来又当县官。1911年辛亥革命后，杨增新长期任新疆省长，金树仁得以步步提升，终于成为设在乌鲁木齐的省长公署的政务厅长，1927年当民政厅长。1928年7月7日杨增新被刺，金树仁被怀疑预先已知谋刺杨的计划。不论怎么说，金树仁利用了杨增新被刺身死的机会掌了权。他立即处决了刺客并采取措施防止骚乱。当时新疆地方电国民政府推荐金树仁为省主席，国民政府几经踌躇，最后同意任命。

当时，苏联对新疆的经济影响逐步增强，1930年，毗邻新疆边境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完成，进一步增加了苏联控制新疆的力量。1931年10月1日，金树仁和苏联签订了秘密商约，该条约增强苏联对新疆的经济控制并予以法律上的承认。该约并未公布，国民政府有好几个月以后才知道这件事。

金树仁的内政措施脱离广大的新疆非汉族居民，他安插他的幼弟金树信为军务厅长，他的侍从崔兆智（译音）为驻乌鲁木齐的旅长。这一批人的所做所为，使新疆的省政毫无正义，腐败无能。金树仁的经济政策，如苛重的直接税和省营公司垄断新疆的主要输出产品，也使广大群众日益不满。

1931年，金树仁的统治受到了威胁，那时新疆东部的重要守卫中心哈密发生变乱。哈密是当时新疆省内唯一留下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地区。哈密是一个半独立的维吾尔族的区域，有其自己的统治机构管理当地事务。1930年11月，哈密地区的首领去世，金树仁准备趁机直接控制，声称民国时代世袭领主不容存在，又鼓动甘肃省的饥民进入维吾尔族的地区。1931年3月，发生了暴动，哈密的维吾尔族土著将该地区的所有汉族税官杀死。当时波及范围很大，哈密维吾尔族首领寻求他们的教友汉族穆斯林甘肃省的东干族的援助，导致马

仲英的部队开进哈密进行了一场血战。1931年秋，金树仁主要依靠征集俄国革命后逃来新疆居住的白俄，将叛乱暂时镇压下去，但马仲英并未失败，1932年他花了很多时间巩固和训练他在甘肃的部队。

金树仁对新疆本地民族处理不当，1932年再次发生骚乱，他教唆杀死蒙古族首领多尔济活佛。蒙族人早已对汉族人迁入他们的放牧草地有反感，因此在哈密事变时拒绝援助汉族人。多尔济活佛是新疆蒙族的精神首领，是该省重要的非汉族人物。金树仁旨在威胁蒙族人的行动，使蒙族人更为不服。

1933年初，马仲英所率的东干族部队再度向西北移动，抵达乌鲁木齐城郊，经苦战后，马仲英部被击退。1933年3月，数千名在1931—1932年被日军击败的中国军队，从满洲退到西伯利亚，及时到了乌鲁木齐，使金树仁的地位暂时得到加强。与此同时，在乌鲁木齐发生了一起新的政治危机。1931年以来白俄雇佣军是新疆省政府的部队在战斗中的主力，可是金树仁对他们的成就很妒忌，对他们很少或是没有奖励。白俄雇佣军的不满，和许多汉族人对他的日益不满同时发生。金树仁和崔兆智（译音）虽采取了行动，但对局势无法加以改善。崔兆智（译音）还在乌鲁木齐被围时囤积粮食高价出售。政治动荡和群众骚乱日益增长，金树仁报告南京政府该省已处于叛变之中。1933年4月12日，他从乌鲁木齐逃走。

一支由盛世才率领的大部来自东北汉族人的军队，在乌鲁木齐近郊经短暂的战斗，击败了金树仁的军队。盛担任了省长职务进而巩固军事和政治地位。金树仁企图挽救局势，但在5月初，他发电给南京，声称他被俄军逐出新疆，该省已沦亡。他长途跋涉经过西伯利亚，于1933年10月抵达南京。南京当局即将他逮捕监禁，指责他在1931年10月与一外国进行秘密谈判。1935年3月受审，4月被判徒刑三年半，从8月起服刑。1935年10月10日政府发布赦免释放金树仁的命令，他于次日获释。此后情况不详。

靳云鹏 字：翼青

靳云鹏（1877—），直系北洋军军官，1919—1921年为段祺瑞效劳，曾任

陆军总长，国务总理。张作霖在北京得势后，靳退出政界，他在1931年出家当了和尚。

靳云鹏山东济宁人，他的家庭及幼年情况不详。他出身于北洋武备学堂，曾在浙江任标统，后升浙江提督。清末，任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军事参议。

1911年革命爆发，蔡锷等人在云南起义，靳云鹏逃离去北方。经段祺瑞之助，任清军参将。袁世凯上台后，任总统府中将衔参军。1913年8月，统率北洋第五师，继周自齐出任山东都督，一直到1916年。靳云鹏虽未公开反对在1915年末酝酿的袁世凯称帝计划，但曾与冯国璋等人于1916年3月劝袁放弃帝制。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靳云鹏将其都督职务让位与张怀芝，离山东到北京，他当时是北洋军阀的一个有势力人物，他到了北京立即卷入当时北方的复杂政局。1916年底到1917年初，他支持段祺瑞谋取权力，与包括张勋在内的北洋军主要人物在徐州开会，以对付段祺瑞的敌手黎元洪及其国会。1917年春，段祺瑞与黎元洪总统及国会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当时北京政府注意的中心问题是中国与德国的关系。段祺瑞认为参加同盟国对中国有利，因此很快与德国绝交，迫使国会通过对德宣战。靳云鹏是段祺瑞使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活动的主要支持者。

1917年春，段祺瑞及其支持者对国会所施压力虽无成效，但段仍然是北洋军阀的重要人物，靳云鹏则继续积极卷入北方军阀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段祺瑞在他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国务总理任内（1916年3月至10月），主要利用掌握参战处的权力与冯国璋争斗中处于上风地位，参战办公处是靳云鹏主管的。1918年5月靳云鹏还直接参与与日本订立秘密军事援助协定，大量出让中国主权换取日本同意为建立一支新的军队给予经济资助、帮助训练和提供装备。

1919年1月，他在钱能训新内阁中任陆军总长，当年年底署国务总理。然而靳云鹏和段祺瑞部属徐树铮相互间的敌视加剧。徐树铮既有段祺瑞的支持，又因他在外蒙取得胜利，他的政治地位得以加强，因此徐树铮能任意摆布靳云鹏为首的内阁，无视靳的军权，甚至靳云鹏还在任陆军总长时，已无法指挥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靳徐两人间的关系变得愈益不和，靳云鹏不顾段祺瑞是北

洋皖系军阀头目，而与直系加强联系。

1919年9月后，靳云鹏三次请辞国务总理职务未准。徐树铮的得势引起张作霖和其他军阀的猜疑和反对。直隶督军曹锟很快组成八省联盟反对徐树铮，1920年5月靳云鹏第四次提出请辞国务总理职务，7月2日获准。次后，张作霖、李纯、曹锟对段祺瑞宣战，其主要目标是对徐树铮。接着发生的1920年7月直皖战争，标志着徐树铮的倒台，段祺瑞在华北霸主地位的终了。靳云鹏在直系曹锟和奉系张作霖的支持下重新上台，8月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10月封为上将。

国务总理靳云鹏当时面临两个迫切问题：一个是满足直奉两系军阀分占华北势力；另一个是政府的财政问题，因为要取得外国贷款，南北政府的统一是先决条件。广州方面对靳云鹏的统一倡议不予理采。他要求银行界向政府提供贷款，又遭到两个交通系的头目财政总长周自齐和交通总长叶恭绰的反对。这次纷争使北京政府陷于瘫痪，1921年4月，靳云鹏在天津会见张作霖、曹锟、王占元，力图解决这个僵局。5月，内阁改组，靳云鹏留任总理，周自齐、叶恭绰去职，他们与张作霖联合。张作霖于1921年12月14日到北京，想在北京政府中插一脚。两天后靳云鹏辞职。12月24日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组阁，叶恭绰任交通总长，表面上和曹锟合作。

这样结束了靳云鹏的政治生涯，于是他在山东创办了一个商业机构鲁大公司。1926年国民革命在南方兴起，靳云鹏曾在吴佩孚、张作霖之间充作调解人，但无成果。此后，他寓居天津英租界多年。1931年夏出家当了和尚。1936年他尚在世，年已六十。以后的情况不详。

靳云鹏有一幼弟叫靳云鹗，系直系将领，死于1935年。

秦 德 纯 字：绍 文

秦德纯（1893—1963.9.7），1930年前，是冯玉祥系的军事将领，属宋哲元部下，任察哈尔省主席、北京市长、二十九军副军长，他率部队参加了中日战争爆发时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和台湾担任高级军职。

秦德纯生在山东沂水。先在山东武备学堂学习，后进保定军官学校。1916年第二期步兵科毕业，派往山东第五师见习，以后在陕西军中担任指挥和参谋职务。1920年进北京参谋学校，1922年第六期毕业后去河南。河南督军冯玉祥任他为豫东防卫参谋长。

此后，秦德纯就参加了冯玉祥在华北的军事组织。冯玉祥和直系军事首领吴佩孚的关系恶化，引起1924年的冲突。同年秋天，第二次直奉战起，冯玉祥从热河前线突然率军回师北京并加以占领。经此事变，吴佩孚倒台，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秦德纯在冯手下任二十四师参谋长。1925年，升任该师四十七步兵旅旅长，1926年任二十七师师长，不久，又改任十四师师长。后来，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撤出华北，冯玉祥去苏联，1926年9月回国，宣布支持自南方北上的国民革命军。

于是，冯玉祥着手重组其残部成军，以便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进行有效的合作。1927年春，冯玉祥部由陕西进入河南，为了有效的控制该省。当时秦德纯任冯军第一师师长。参加河南之战，后又任冯玉祥西北军二十三师师长、第二集团军副军长，1927年，在宁汉斗争中，冯在政治上起了平衡作用，他的部队在名义上成为改组了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1928年，以在北京掌权的张作霖为目标的第二阶段北伐开始，秦德纯任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第十四军军长。10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冯玉祥及其部属鹿钟麟分别当上了陆军部正副部长。由于冯玉祥握有地方势力，控制了河南、陕西、甘肃及山东的一部份地区，因此国民军军官的前景看来颇有希望。

南京当局和冯玉祥的关系开始紧张，1930年，冯的国民军改编为国民政府的军队，冯失去了与南京竞夺的力量。秦德纯同冯玉祥的大部分亲信将领一样被解除了职位，暂时退休。1930年南京和北方军阀的争夺中，张学良态度消极，但最后还是投向了中央政府。秦德纯和北平的张学良有联系，当上了张学良司令部的参议，1931年9月，日军开始侵占满洲，使张学良顿然失势。1933年初秦德纯参加了在长城一线抗击日军的战斗。当年3月，张学良被迫把全部军权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的军事助手何应钦当时拥有华北的最高权位。秦德纯任第三军团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军委会北平分会是由何应钦领

导的。1933年底，他在宋哲元手下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当时该省在宋哲元的直接管辖范围之内。

1935年中，宋哲元率二十九军进北平，以对付日本对华北的政治攻势，秦德纯继宋哲元任察哈尔省主席并兼任该省民政厅长。同年底，秦德纯到北平任市长并任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在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36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所作承诺付之实现后，日本在华北的形势日趋紧张。1937年秦德纯担任宋哲元二十九军副军长。一方面有日本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有来自南京反对任何政治让步的指示，宋哲元夹在中间，终于退休回山东老家，由秦德纯处理华北事务。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追查一失踪士兵要求进入北平附近的一个小城镇宛平，秦德纯下令二十九军进行抵抗。这样，爆发了中日战争。

战争一开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及其各机构都被摧毁，秦德纯再没有军队了。他在整个战争时期，只担任了一些参谋的职务。1940年任军事法庭副庭长，1941年任军令部次长，直到1945年。

日本投降后，1946年开始了对共产党的内战，秦德纯就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中将衔次长。四十年代后期，他的老上司冯玉祥已公开反对蒋介石，但秦德纯仍留在南京国民政府。1948年5月，蒋介石当选为总统后，秦德纯再度被任命为国防部次长。1948年，秦德纯任山东省主席、青岛市市长，而在1949年，共产党占领了山东和青岛。于是秦德纯去台湾，他像其他退职的国民党军人一样领取乾薪而已。1963年9月，死于肺癌。

周 长 龄 字：寿 臣

周长龄（1861.3.13—1959.2.24），他是清政府中的官吏，后在香港成为重要实业界人物和社会名流。1928年，英皇乔治五世授予他爵士的勋位。

周长龄生在被英国割占了二十年后的香港。香港是在第一次中英战争结束时，以条约的方式割让给英国的。他的原籍是广东宝安，香港原属广东省宝安

县。周长龄的祖父住在一个村子里，这个村子后来取英文名称为阿布登。他的祖父是村子里的长老之一，曾帮助英国人在香港岛上张贴第一批官方的布告。周家境况甚佳，周长龄幼年受中国传统教育。

1873年周长龄十三岁时，清政府选派幼童去美国留学，应选学生，共有一百二十名，年龄都在十二岁至十四岁之间，准备在美国学习十至十五年，受初等、中等、高等各级教育。1872年夏，首批选送的学生离华赴美，周长龄是第三批。

周长龄到美国先学言语，之后进马萨诸塞州的安多弗的菲利普中等学校，毕业后，进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881年清政府突然下令召回留学幼童，因此，周长龄未能完成学业。清政府的这一决定是受保守派影响作出的，保守派上书称中国留美学生正急剧趋于美国化，清政府担心这些学生最后可能成为革命者。

他们回国后备受猜疑歧视，被安置在上海一个特定地区，周长龄亦不例外。但是这些受西方教育训练的青年学生所学的本领很快受到重视，按他们的专业特长分配不同官职。周长龄等数人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被派去朝鲜协助朝鲜政府改组海关。周长龄在袁世凯手下任事。袁当时是清政府派驻朝鲜的使节，一直到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那一年，他一度在仁川任中国领事之职。

中日战争后，周长龄回国，历任多种官职。1903年任招商局督办，在职四年，总部在天津。1907年任北宁路督办，1908年任牛庄海关道。当时，他还兼任许多其他职务，主要的有兼管辽河以西数百平方英里、数百万人口的地区的涉外事务。他曾以满洲总督代表的身份于1909年招待基钦纳将军，当时该将军视察满洲战场。

1911年，周长龄被召回北京，任外务部秘书。4月，革命者在广州黄花岗发动起义，如今每年3月29日纪念这一起义。此次起义虽遭失败，但激起了全国革命浪潮而直接导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周长龄深感时局紧张，辞去政府各职到香港去了。据说，他谢绝了主持外务的庆亲王授他为驻某欧洲国家公使的职务。

1911年，他去香港时年已五十岁。他在其祖先的土地上致力公务达三十年

之久，创立了显著的业绩，获得众多的嘉奖。他并未进入香港的政界，亦即他并未担任官职。他投身香港的多种工商实业，成为许多企业的老板和公司的董事。其中有香港电力公司，香港电话公司，香港电车公司，华生公司，东亚银行，地产公司，中华劝业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香港油麻地轮渡公司等。

周长龄在香港新的杰出的成就和他在大陆的辉煌的经历，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名人参预公共福利事业。1921年任香港政府立法局和市政局的非官方议员。同年，又任香港大学校务委员，1935年获得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他还被聘为香港政府各种委员。1924年在温布利举办的英国展览会中他担任香港馆馆长。他还参加了许多公共福利慈善组织，如东华医院集团，一个保护妇幼的组织保孺堂（音）和城市计划委员会。

1928年，他六十八岁时，由英王乔治五世授以爵士，授勋礼由乔治五世的儿子、香港皇家海军的乔治亲王在政府大厅主持。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由王室成员主持的盛典。除此之外，周长龄还多次获得英国政府的嘉奖。

他在晚年时，已退出实业界的活动，但仍热心于公益事业。1937年，他从立法局和市政局退休时，英王乔治五世特准保持其爵士称号。他虽年迈，但身体健康，每晨均去他在东亚银行的办公室。他在名为寿臣山的山坡上建造了一所松林别墅。1933年他的妻子死去，他并未再娶。

他在晚年常回忆幼年生活，特别缅怀1873—1881年他在美国上学的几年生活。他常向中国留美学生夸耀他们是他们的前辈。他九十岁时，据说当年留美的一百二十名幼童、只有三人尚在世。即使在晚年时，他仍然是一个精力旺盛、口才出众的演说家，他在发表演说时，不使用扩音器。他爱在美国年轻人前谈起七十五年前他在美国时的情形。

1959年，周长龄在其香港寓所去世，享年九十八岁。他仿效何东爵士的做法，在临死前受洗为英国圣公会教徒。

周 至 柔 原名：周百福

周至柔（1899—），在发展中国空军中起重要作用的军官，1934年任中央

航校教育长，1936年任航空委员会主席，1943—1952年任空军参谋长，1950—1957年任参谋总长后，任台湾省主席，1962年任蒋介石私人参谋长。

周至柔生于浙江临海，兄弟三人，姐妹一人，行二。他父亲周慈山曾在清政府当小军官，后来开中药铺。周至柔十二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侯氏。1919年，周至柔自临海浙江第六中学毕业后，去北方进保定军校，1922年八期步兵科毕业。八期同学有陈诚、罗卓英。

1922—1924年，他以少尉衔在浙军第二师见习，1924年去广州，因参予地方事件，将其名周百福改为周至柔。1925年投陈诚军，1925年初陈诚在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时曾率炮兵营参战，周至柔参予此役。1925年周任黄埔军校教官，在蒋介石手下任职。

1926年7月北伐，周至柔在二十一师六十三补充团当勤务官。1927—1928年任该团团长。1928年6月，北京政府倒台，国民革命军改编，周至柔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处长、长江上游办事处主任。1930年对北方联军作战，周至柔任十一师参谋长，不久，任该师三十三旅旅长。

1931年，国民党第三次围剿江西共产党，周至柔在陈诚部下任十四师副师长。1932年底升中将，任该师师长。陈诚的第十八军分为三个纵队，周至柔率领的师属吴奇伟统率的纵队，周至柔兼任该纵队副司令，另一纵队由他的老同学罗卓英指挥。

此后，周至柔任第十八军副军长。他与第十八军中的粤籍军官常有齟齬，尤其与罗卓英矛盾更多。周至柔的部队在1933年开始的第五次围剿共产党的战斗中遭到失败，他被解职去国外考察空军教育工作。他先后到英、法、意、德、美等国，考察空军学校、机场和飞机工厂。

1934年，他回国后任杭州附近的中央航空学校教育长。日本于1932年扶植满洲国，并向华北进迫，国民政府决定筹建空军。1936年7月，陈济棠的广州空军全部投向国民党，因此增加了国民党空军人员和飞机。同年底，周至柔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扩大发展空军的计划。意大利政府派遣一顾问团来中国，训练中国飞行员并出售飞机给国民政府。陈纳德从美国空军退职后，在中央航空学校当飞行教官，航空委员会便决定大量采用英美飞机。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周至柔任中国空军前敌司令部指挥官，宋美龄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直到1938年。1937年8月14日，日军首先轰炸杭州空军基地，很快摧毁了中国的空军。1938年周至柔任昆明中央航校校长。1938—1940年，苏联向中国供应飞机部件、航空燃料以及“志愿”飞行员，使中国能以空战抗击日本。1941年，周再度任设在重庆的航空委员会主任，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1940—1941年，周任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同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厅厅长。1940年11月，空军作战局长毛邦初和陈纳德同去美国，此行是为了获得五百架战斗飞机和全部机组人员，结果获得一亿美元贷款，用此款项购买一百架P—40型飞机。1941年3月，租借法案批准后，中国要求供应飞机一千架。1941年12月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当时在蒋介石和宋美龄周围的、包括陈纳德、周至柔、毛邦初在内的军事人员，和由史迪威支持的地面部队，为了获取从印度运到中国的美国军用物资展开了争夺。1943年，陈纳德任中国空军参谋长，周至柔、毛邦初任航空委员会正副主任。当年11月，周至柔作为顾问陪同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在周至柔、毛邦初、陈纳德主持下，在中央航空军校（1942年从昆明迁到印度拉哈尔）和在美国训练了各种空军人员，约有一万人。战后，为建立中国国家航空工业制定了庞大的计划。1945年5月，周至柔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46年6月，航空委员会改为中国空军总司令部，周至柔任司令，毛邦初为副司令。周至柔对中国空军的组织、训练、供应制订了一个长远的计划。内战期间，周至柔一直担任原职，在此期间，中国空军对虽无空军、但高度机动的共产党军，毫无办法。1949年，周至柔主持把空军及其人员和家属撤到台湾岛。1950年，国民党政府及大量地面部队撤到台湾后，周至柔兼任中国空军参谋总长。1950年任空军党务改组委员会主任。1952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变成的。

1952年，周至柔由于空军参谋总长的任务加重，他辞去了空军司令职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及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后，1951年5月，美国恢复了援助国民党的计划。身为参谋总长的周至柔协调美国给予台湾中国军队的

军援并为负有收复大陆使命的国民党新军建立坚实基础。1957年，他以中国军队参谋总长的身份，应美国国防部邀请，去美国考察军事设施。1957年8月，任台湾省主席，兼台湾绥靖公署主任。1961年5月到6月，他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访美。1962年11月，台湾省主席由另一黄埔出身的将领、原任台湾警备司令的黄杰继任，周至柔则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

周至柔与王清连结婚，有两个孩子。女儿夭亡，他的儿子周以西1949—1957年在美国留学，后在台湾某纺织公司任职。

周 佛 海

周佛海（1897—1948.2），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但在1924年时退出了共产党。他成为国民党的出色理论家，多年为蒋介石工作，曾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他主编《新生命月刊》，在上海办新生命书店。他协助汪精卫成立日伪政府并任重要职务，战后因卖国罪被捕入狱。

周佛海生在湖南沅陵，他父亲在太平天国时投入湘军，年轻时就死去，遗有寡妻、二子一女，凭一百多亩瘠田谋生。1912—1917年，周佛海进沅陵的高小和中学。1917年，他已是一子一女的父亲了。

周佛海幼年时是个好学生。1917年5月，在他毕业前夕，沅陵中学的校长和他的同学深知他的才能，又知道他的家境贫寒，筹集了一小笔资金帮助他到日本深造，他又从亲戚那里借得一些款项到日本去了，7月到达东京。他在日本一所私立学校学日文和其他一些入学准备课程，他又热心参加留日中国学生的活动。1918年，他因反对日本趁同盟国干涉西伯利亚时机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协定，离开了日本，由友人建议去中朝边境的安东厘金局谋求工作，可是厘金局地处荒滩，几乎不能再雇职工了。一贫如洗的周佛海感到前途渺茫，几乎想要自杀。最后，他借了一些钱又回到东京，为投考第一高等学校专心准备功课，他通过了口试的难关，据他自己回忆，一位谙通日语的人，为他准备了一篇关于正在进行的直奉战争的报告。主试人要求他发表对直奉战争的意见，由于他已预作准备，答复得很好，因此他被录取入学并得到了官费，解决了

求学费用问题。毕业后，进京都大学学经济，受到川上教授的影响。河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把资本论译成日文。

周佛海是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二名代表之一。他代表中国留日学生，会议时任秘书。他在上海短期逗留时，与上海的富商留美学生杨卓茂的女儿杨淑慧恋爱。她是启明女校学生，爱上了贫穷的已经结婚的周佛海，这个性格倔强的女孩子不顾父母的劝阻，与周佛海私奔到日本过着清苦的生活，一直到1924年周在日本完成了学业。

那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1924年5月，周佛海由日本乘船直接到达广州，当时国民党已在广州成立了革命政府，他在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教书。据周佛海自称，他在1924年冬脱离共产党。1925年他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山先生思想概观》，这本书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25年12月，他离广州去武汉，据说是由于他不满意鲍罗廷对广州政府的控制。他在武汉大学和武汉商学院教了几个月书，不久又回广州，正好赶上参加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占武汉后周佛海任以蒋介石为校长、邓演达为代校长的中央军校的武汉分校秘书长兼主任。由于蒋介石和邓演达当时都忙于其他事务，因此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实权由周佛海掌握。后来，邓演达任共产党人恽代英为主任政治教官，实际控制政治部。周佛海当时处境困难，共产党和国民党右翼对他都不信任。当蒋介石和武汉政府的分裂加剧，周佛海决定逃离汉口。1927年4月，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反对武汉政权。5月初，南京政府在其统治区内清洗共产党，周佛海携家眷及岳父，趁英轮秘密从汉口去上海，可是，他被同船的国民党旅客认了出来，通知了南京政府，因此，他在上海一登岸，就以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捕。经他妻子和张治中、郭泰祺、戴季陶等有影响友人的周旋，周佛海被监禁三个月后释放。

周获释后，蒋介石任命他担任新成立的南京中央军校的主任政治教官。那时，他着手写作《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一书，此书写成后在国民党中国流传甚广。1927年8月，南京的派系斗争促使蒋介石辞职。周佛海离职，应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之请去该校教书。国民党自清党以来，广州及中山大学的政治气氛十分不安，周佛海于1927年秋离广州去上海。国民党在上海创办政治评

论刊物《新生命》，由周佛海负责编辑，于1928年1月出版。陈布雷、陈果夫、邵力子、戴季陶也为此刊撰稿。不久，周佛海又创办了新生命书店，1928年4月，该书店出版了他的著作《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准备第二阶段的北伐，又召周佛海担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1928年夏，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北伐结束。7月，周佛海陪同蒋介石去北京，到西山孙中山陵堂奠祭。他从北京回来后，辞去南京军校职务，回到上海工作。

1929年2月，蒋介石召周佛海到南京，3月间，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周佛海作为来自菲律宾的代表身份出席大会。不久，他协助蒋介石进攻武汉的桂系军人。接着任国民革命军政训处处长，兼总司令部政治处长。

1931年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一个月以后，因日本侵略满洲，蒋介石被迫辞职。蒋在辞职前，安插军人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顾任周佛海为江苏省政府委员、教育厅长。1933年，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周佛海回南京任国民党民训部部长，并参加蓝衣社活动。蓝衣社的头领大都是前黄埔军校的学员。1935年，周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37年1月，国民政府派周佛海、邵力子去香港迎接从欧洲回国的汪精卫，以实现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后的团结。不久，政府改组，周佛海调任国民党宣传部次长，1938年任代部长，但仍继续当蒋介石的助手，负责起草重要文稿。

周佛海与蒋介石私人关系密切，他为什么转而支持蒋介石长时期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其动机迄今并未清楚。据周佛海自称，当时他属于所谓低调派的人物，其中有胡适、梅思平、陶希圣等人。这一派据说诋毁要求立即抗日的高调派的那些人物。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是国民党管宣传工作的重要官员，他在汉口办了一个“艺文研究社”，向世界上表达中国的态度。周佛海任社长，陶希圣任秘书。由于陶希圣是汪精卫的知友，因此，周佛海在这一段时期内结识了汪精卫周围的一些人物。汉口沦陷，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汪精卫对抗战的胜利前景十分悲观，主张与日本讲和。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重庆，周佛海得讯，借口视察党务追随前往。他在昆明和汪精卫的一批人同到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致重庆国民政府通电中，表

明了他的立场。1939年初，汪精卫在河内时，周佛海到了香港。他和陈公博、林柏生、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在《南华日报》上，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进行宣传。1939年4月25日，汪精卫趁法商轮船秘密离开河内前往上海，在汕头换趁日本船于5月6日到达上海。周佛海随即到达上海。早在4月初，周佛海曾与日本特工人员会见，建议由日本支持，在南京成立一个对峙的中国政府，由汪精卫领导，结束中日冲突。周佛海在支持汪精卫的五十多人出席的上海会议上，竭力阐明这个主张。这次会议并未作出任何决议，但周佛海的建议却被汪精卫本人所接受。1939年6月4日，汪精卫带领周佛海及其他亲密顾问去东京，与日本总理大臣平沼骐一郎的那一派商人商谈。谈判延搁了下来，6月24日汪精卫回上海，留下周佛海在日本商讨签订一项协定。

谈判结束后，周佛海回上海，筹备成立汪精卫新政府。1939年9月，汪精卫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周佛海为财政和秘密工作委员会主席。9月，他在南京出席汪精卫及在北京和南京的两个日伪政府的头目的会议，商量成立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央政府。11月，汪日谈判，讨论调整中日新关系的日方方案，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代表汪精卫一方，1939年12月30日谈判结束。

1940年1月，汪精卫的活动受挫，因为从头到尾参加密谋的高崇武、陶希圣携带日汪秘密协定的副本逃跑到香港，秘密协定的条款一经发表，舆论大哗，但并不能遏制汪精卫的行动。1940年1月23日，周佛海作为汪精卫的代表团的一员出席青岛会议，筹划北京和南京两地政权在汪提出的新组成的政府下合并，26日会议结束，周佛海于1月28日飞往日本，与日方讨论促使重庆结束战争的可行办法，及和平实现后的汪蒋关系。2月26日回上海后，周佛海即着手筹备成立新政府，1940年3月30日新政府终于成立。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很确凿地说，他是这次活动的中心人物。他在南京任如下职务：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储备银行董事长。因为他掌握秘密警察，又是对日谈判的主要人物，他无疑是汪精卫最为得力和多能的帮手。周佛海说他很钦佩汪精卫的热忱和对他的完全信赖，这与蒋介石的高傲态度迥然不同。

东京之所以支持汪精卫的原意是迫使重庆和谈，因此，日本政府在与重庆进行和谈试探未完全失败前，暂不正式承认汪政府。1940年11月30日，日本和南京终于签订了基本协定并互换大使，这个协定出乎汪精卫等人的意料之外，协定维护了日本人对占领区的牢固控制。周佛海在1940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承认，他对日本人的意图的估计是错误的，而主张抵抗是对的。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汪政府放弃了促使重庆按日本方案接受媾和的希望。那时，周佛海通过两座秘密电台与重庆建立接触：一座电台和在重庆的军统戴笠联系；另一座电台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系。顾祝同是周佛海在江苏省政府时的老同事。

1943年1月9日，汪精卫政府对同盟国宣战，日本在1943年10月30日签订了一个更优惠的条约，以替换1940年的中日协定。1944年3月3日，汪精卫去日本治病，将南京政府的事务交给陈公博、周佛海。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死在日本名古屋，所遗各职由陈公博接任，周佛海接替陈公博任上海市长。当太平洋战争进入决定性时刻，盟军在中国沿海登陆迫在眼前，据说重庆向周佛海交代任务，要他在盟军登陆之际，在日军后方协助抗击日军。原子弹和日本的投降，没有机会证实周佛海是否确实被授予上述的任务。

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刻，重庆国民政府当局向周佛海招呼。由陈毅率领的共产党军队抗战期间在华东已稳固地发展了他们的力量，而戴笠责成周佛海阻止共产党势力的渗入。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后不久，重庆即任周佛海为沪宁地区行动队指挥，要他在日占区内维持秩序，以待国民政府军的到达。国民政府在接管了中国第一大城市之后，戴笠逮捕周佛海并用飞机将其押到重庆，把周和他的妻子、孩子软禁起来。后来又转移到南京因叛国罪受审。周佛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操于戴笠之手，因为戴笠是周佛海在战争期间与重庆联系的最重要的联系人，只要戴笠愿意，那末周佛海案就可以得到较好的处理。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使周佛海的处境发生问题，这是由于国民党中没有其他高级官员了解或关心周佛海在重庆的战略中所起的作用，因而在处理周佛海案件的进程中没有施加影响。据说，周佛海的老婆为周佛海请命，通过陈布雷而准予与蒋介石见面。结果是，1946年3月26日，蒋介石下令将周佛海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周因长期患病，死在南京

狱中。

周佛海写日记很勤勉，战争结束时，他将1939—1945年间的七册日记存放在上海的一家银行里。这些日记由国民党军队谍报人员没收，而后转到中央信托局敌伪产业管理局局长邓宝光之手。周佛海的老婆要求发还日记，为邓宝光所拒，可能是因为有许多情节牵涉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重要人物的战时活动。邓宝光后来投奔共产党，他在1950年去香港随身携带周佛海1940年的那部分日记。在香港这部分日记落入新闻界人士金雄白之手，他原是汪政权中很活跃的人物。1955年在香港由中光出版社出版了《周佛海日记》。

周佛海青年时代学校生活和在国民党中活动的经历，记录在他的《往已集》中，1944年在上海出版，1955年在香港重印。在1921—1922年的《新青年》上有他的一些严谨的文章。他有三本关于阐述孙逸仙思想特别是三民主义的著作，即：《中山先生思想概观》（1925年上海出版），《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1928年上海出版），《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1929年上海出版）。他还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1922年上海出版），以及其他财政经济理论书籍。此外，他从日文翻译过来有关国际经济、经济史、国际商业政策等著作。

周佛海遗有妻杨淑慧及儿女两人。他的儿子周恩海留学日本，周佛海判处死刑后，他投向共产党。他的女儿周慧海曾两次结婚。

周 学 熙 字：缉之，止庵 号：松云，斫耕

周学熙（1866.1.12—1947.9.26），实业革新家，企业家。他为袁世凯在华北的经济现代化方面作出了成绩，为此担任了财政部长。他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北京自来水厂，在收回开滦煤矿主权的活动中，他是关键人物之一。他在退出公职后，积极发展华北的棉纺工业。。

周学熙生于安徽建德，周馥（1837—1921）的第四子。周馥于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及之后，系李鸿章的幕僚，他在经办太平天国后的复兴事业方面很得

力，治洪、兴修水利工程，协助直隶省建设现代化事业，建立了天津兵工厂，海军陆军学堂，电报局等。他的这些功绩使他未经科举应试而能不断升任官职：1888年直隶按察使，1899年四川布政使，1901年直隶布政使，1902年山东巡抚、1904年两江总督南洋大臣、1906年两广总督。1907年因年迈退休，定居天津，研究《易经》。1921年9月21日去世，年八十四岁。

周学熙青年时与父亲一起在天津，受传统教育，十六岁时为生员。曾从李慈铭受业，喜爱数学、地理等科目。他重视宋学的道德修养，用于他父亲从事的各项事业。他二十多岁时，在北京工部任职，1895年中举人。

周学熙这一辈青年人，因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国耻及日本近代化的成就，深感中国有改革的必要。他放弃科举考试，寻求强国之道。周家曾在安徽设有几所学校，周学熙首先从教育着手。他编了两本教科书：一本叫《中学正宗》，选有朱熹的及清代理学家倭仁、陈宏谋的文章；一本叫《西学要领》，选有康、梁的文章和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译文，这两本书于1898年在上海出版。1899—1900年山东巡抚袁世凯任周为候补道，他在山东筹设山东学堂，亲自为学校筹划课程。

周学熙像许多其他在民国初年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一样，深受袁世凯的影响。1900年袁世凯扑灭了义和团起义后升任直隶总督，周学熙从山东调到直隶，仍任候补道。由于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直隶省很多地区经济生活的破坏，袁世凯着手进行经济的恢复发展工作，周学熙是他的最得力助手之一。1902年夏，袁世凯派周学熙在天津筹设造币厂，周大显身手，不到几个月工厂开工，为中国币制实行新的钱币制（十枚铜钱为一铜元）铸出一百五十万枚铜币，袁世凯大为赞赏，1903年派周到日本去考察实业，然后他在直隶筹组几处近代工业。

此后四年中，周学熙递升很快，1905年署理天津道台，1907年初任盐运使，接着任直隶臬司。1907年末因母亲去世告退。

在此期间周学熙创办了一些企业，1903年自日本回国后，经袁世凯允诺，他在直隶建立北洋工业局经办工业建设，周学熙身为该局领导，设法促进当地人士建立近代工业企业并鼓励手工艺工业的发展。1903年下半年，他在天津设

立了一所工业展览馆，展出国内外产品。同年他在天津办了一所技术学校，1904年改组为天津高等技术学校，1928年改为河北工学院。1904年末，他又在天津创办了一所模范工厂，招收十二岁到二十二岁的学徒，有木工、织工、染工，训练他们使用机械，制造陶器、火柴、洋烛、肥皂等。1905年冬又设立了一所制造教学仪器的工厂。1906年在天津又设立了一家机器厂。在工业局的督导下，并经模范工厂培训人材，直隶的纺织工业发展极快，特别在高阳地区。

在此期间，周学熙又在唐山办了启新洋灰公司。1899年，李鸿章的亲信唐廷枢曾在那里办过洋灰厂，但因原料来自广东，不能获利，所以停办了。1900年，周学熙为了恢复这一工业请德国专家化验唐山地区的土壤。化验结果，本地土壤及灰石适于制造高质量洋灰。但周学熙的办厂计划因义和团运动而未能实现，直到1906年才在唐山旧厂原址附近设厂生产洋灰，这是周学熙最成功的企业。启新洋灰公司是国内洋灰业的魁首之一，二十年代军阀内战期间和以后中日战争期间，启新洋灰公司都维持下来了。

1908年，周学熙又担任政府官职，任北京农工商局候补道。当时，京城常有火灾发生，清廷对此颇为关切，袁世凯推荐周学熙筹建自来水厂，经测量计划后自来水厂的建厂工程顺利进行，终于建成，周学熙任经理。大约一年的时间，即有自来水供全城使用。

清末，周学熙是主张收回开平煤矿矿权的主要人物之一。该矿于1878年在天津东北的唐山建成，是李鸿章的一项近代工业。唐廷枢主持中华工程矿业公司。直到1892年唐去世时，开平的业务已十分发达，但继任人张燕谋主持时，财政困难，大量借债，因此到1900年时，国外投资已占资金大部。义和团运动时，该地区又为外国军队占据，该公司由于开工困难使经费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有人建议，将矿业公司作为英国企业名义注册，暂归外国势力保护该矿。经多次与外国企业（包括开滦工程师胡佛）谈判后，中华工程矿业公司落入外国人之手，这是张燕谋和他的同事未能预料到的。

周学熙等人经多次法律手续，想收回部分矿权，但终归失败。后由袁世凯支持，决定在开平盆地另设新厂与之竞争。1907年初，由天津银行给予财政支持，成立了滦州官办矿业公司。1908年5月，周任新公司经理，1909年周被选

入董事会，该矿于1908年底开始生产。1911年外商公司深感竞争之苦，设法在价格上竞争。1912年双方谈判，于1月27日签订协议，两公司合而为一，成立了合营的开滦矿业管理局，中国恢复了对开平矿区的部分控制权。周学熙是第一批董事之一，以后又任管理局局长多年。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任总统，1912年7月到1913年5月，1915年1月到1916年3月，周学熙先后任财政总长。在第一任财政总长时，周学熙在赵秉钧内阁的主要工作是使民国政府的混乱财务状况纳入正规，为此他提出了不少有关财政政策的建议，包括成立国家银行系统，全国统一发行货币，设立近代税收机构、取消厘金、实行所得税、遗产税、印花税等形式的直接税制；鼓励发展新的工商企业以增加税收的来源；矿产铁路等基础工业归政府经营。

这些政策虽然无法实行，但他成功地实行了他的另一项建议，即是主要以盐税为担保借得一笔短期外国贷款，以救行将崩溃的新的民国政府之急。与五国（英、德、法、俄、日）银行团的谈判，结果达成了一亿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复兴借款协定。但是，袁世凯却把这笔借款用于增加他的军事力量以压制反对势力，因而周学熙于1913年5月16日辞职。据说1915年时因袁世凯竭力坚持，周又复职。当时，袁世凯的亲信已分成两派，一是以杨士琦为首的皖系，一是以梁士诒、叶恭绰为首的处于优势的粤系（即交通系）。周学熙因系安徽人，杨士琦为加强自己的实力，让周担任财政总长，周被迫接任。

1915年，周学熙设法促使在他第一次任公职时提出的财政政策发挥作用，并重视采取改订土地税制、扩大盐业生产以及建立国家对烟酒的新的控制制度等办法，以增加税收来源。他还亲自过问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他建议创办农工银行，给农村以低息贷款，并为创办资助新兴工商企业的专业开发银行提出一系列有关政府条例的建议。他有一些建议后来实现了，但是改变了方式，例如，1918年在北京创办了大万（译音）农工银行，1919年在天津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

在他第二任财政总长期间，他作出的努力大部分被袁世凯和其他官员推行的政策所牵制或阻挠。在1915年夏开始帝制运动之后，他长期病假，呈请辞职，袁世凯未予接受。直到1916年春，才允准辞职。

由于他的发展经济的计划，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他便把注意力转向私人企业。在他第二任财政总长时，鼓励在华北发展本地植棉和私营纺织工业，他向美国订购纺织机，创办一家新的纺织厂。1915年退休后，与异母幼弟周学惠继续办这一事业。1916年他们在天津办私营华新纺纱厂，周学熙任经理。又在山东青岛、直隶唐山、河南卫辉等地办纱厂，这些工厂一直办到1937年日本侵略之时。他在华北推广植棉，以本地棉花供中国纺织工业的需要。他参加了新华棉业公司的筹组，准备在华北各省遍设纱厂，并在棉花产地设立轧花、包装、仓库等设施。但因袁世凯死后华北军事局势不稳，这些计划都放弃了。

1919年徐世昌鉴于周学熙有志棉业并对此颇有经验，任周学熙为整理棉业局督办。他创办了不少实验棉田，引进美国棉种，改良本地品种。他采用张謇在江苏发展棉业的经验，为培养中国的植棉和纺织人材，建立了一所技术学校，并推广开垦沿海土地种植棉花，1920年他建议将长芦盐地四百万亩改种棉花，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周学熙还办了许多慈善事业。1921—1922年华北遭严重旱灾，他捐献了一大笔灾款赈灾，1923年日本遭地震他也给予很多捐献。他对安徽建德老家的慈善事业尤为热心，他遵从母亲遗命，创办和资助了不少诊疗所、保健所、职业学校、农业试验站。1925年他从实业界退休，仍热心于慈善事业。

他在晚年时，致力儒家道德古训，办了一所家塾取名习古堂，家族中的子弟在此读书学诗。他编了几种书籍、解释儒家圣人和古代学者的学说，如，《习古堂丛稿》（1929年自刊），《古训选编》，（1932年出版）。他的孙女周叔娥编写的《止庵年谱》中说，周学熙著有自传和诗集。有关他在企业方面的公函、计划、报告、编印入不署名的著述中。周学熙除注重儒家学说外，又注重佛经。1939年5月20日他在一首诗的边注中说，他自1926年起，十三年来每日诵念南无阿弥陀已达一千万次之多。1947年9月29日去世。

周学熙兄弟五人：长兄周学海（1906年死），次兄周学民（1911年死），都是1892科进士；幼弟周学惠，1903年举人，民国初年众议院议员、实业家。周学熙的一个姐妹，是袁世凯第八子袁克诚的妻子。周学熙有五个儿子，一子夭亡。

周学熙虽系安徽人，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华北。由于他和张謇是近代中国的实业先驱者，被誉为“南北两四先生”。因为他们两人在兄弟行辈中都是一是行四。

周诒春、周贻春 字：寄梅

周诒春（1883—1948.8.30），教育家、行政管理家、政府官员。1913—1918年任清华学堂校长，1918—1920年任参议员，1923—1924年任财政整理委员会秘书长，1924—1928年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常务董事。以后在吴鼎昌手下任职于国民政府。

周诒春原籍安徽休宁，出生于杭州，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1909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以后进威斯康星大学进修，1910年获硕士学位。

回国后，他于1913年，任北京清华学堂校长。清华学堂成立于1911年，学生经考选并准备以公费派赴美国留学。公费来自1908年退还的庚子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周诒春为清华增添设备、拟订方案，为今后成为全国第一流大学之一奠定了基础。因该校经费来自庚款，该校与北京政府外交部有隶属关系，1918年周因与外交部发生意见冲突而辞去清华职务。

1918—1920年，周诒春在北京当议员，当时段祺瑞控制国会作为工具以谋私利，但周诒春未卷入政局，他的声誉得以无损。他与军阀们没有直接接触，而与在北京的留美的社会名流们如耶鲁的同学王正廷，以及颜惠庆等常相往来。

周诒春离开清华后，仍然关心教育事业，长时期与北京协和医学院保持关系。协和医学院通过中国医学委员会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的支助，成为远东最好的医学中心之一。1915年周诒春受聘参加医学院理事会的工作。

周诒春以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知名。他不辞辛苦地参加了1919—1921年华北农村遭受旱灾后的赈济工作，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作了很大努力以减轻农民的苦难。1923—1924年他在颜惠庆手下任财政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的工作，也

博得了赞扬。该委员会的工作是核查中央政府各部的国内外债务的本息确切数额，根据所获资料研究调整和偿还的办法；为政府制定债务调整后的财政政策。许多人认为该委员会的成就，主要出于颜惠庆的主要副手周治春的努力。

周治春的组织才能也使他成为华北的主要工业促进者之一。他与在津沪有不少企业的企业家孙多西是至交。孙家创立的中孚银行发展成为中国的主要私营商业银行之一，由于孙家持有该行股权，因而获得贷款的便利条件。它的北京支行，曾由周治春经营多年。周治春创办天津仁立地毯公司并任董事长，又任永利化学公司和其他一些工业企业的顾问。

1924年，管理由美国归还的庚款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成立，将分二十年归还的庚款，分配用于中国的科学研究和研究机构的发展。周治春担任该基金会的第一任常务董事，他自1924—1928年担任此职，以后又任该基金会常务理事多年。

1926年，燕京大学聘他为校董。因为他和北京的银行家和社会名流私交很好，这对燕京筹集基金带来很大好处。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规定了一项法律：凡高等院校校长必须由中国公民担任。当时中国的许多教会学校一般均由西方人担任校长，这一法律公布后使这些教会学校产生困难。燕京大学以设立一个有名无实的校长来对付，1933—1934年周治春担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

1935年，周治春的老朋友吴鼎昌，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周应邀去南京，1935—1937年任次长。1937年中日战争发生后，实业部改为经济部，由翁文灏主持。吴鼎昌调任贵州省主席，周治春随之前往，先任省政府委员，后任财政厅厅长。贵州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该省的财政制度十分混乱，由于周治春在困难的战时环境中作出努力，使该省财政渐上轨道。1944年12月，日军迫近贵州，重庆当局任军人杨森为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去重庆任中央计划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自任主席，周治春随吴鼎昌前往重庆。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治春任农林部长，1947年到南京后任卫生部长。1948年12月辞职后去香港，他的老朋友吴鼎昌于1950年8月死后，他回北京。

周治春虽在战时任国民政府诸职，但和国民党无正式关系。他之所以在国

民政府任职，是因为他和吴鼎昌的关系。他在1956年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1958年他在上海逝世。他儿子周华康从燕京毕业后，又在协和医学院取得硕士，系该学院药学系的高级医生。

周 树 人 笔名：鲁 迅

周树人（1881—1936.10.19），以笔名鲁迅闻名。作家，社会评论家，其地位之重要，几乎成了一位传奇式人物。

鲁迅的故乡是浙江绍兴，他出身在一个商人兼小官吏家庭。他和两个弟弟周作人、周建人，幼年时都在周氏家族的学塾里接受经学教育。他浏览家中藏书，对其中的通俗文学、民间传说、自然科学、艺术、尤其是木刻绣像颇感兴趣，这些在他成年后成为其最喜爱的领域。

祖父周介孚中进士，为族中有名望的学者。1893年家道中落，因祖父被控企图行贿省监考官而下狱，父亲周凤仪又长期卧病，家境顿时窘困，鲁迅不得不离开学塾。1897年，父亲病故，他被送往乡间，暂时寄居于舅父家中。他母亲是一位能干的农村妇女，自学识字，在家境困难时期尽力设法维持家计，她的坚忍性格对鲁迅的一生都有影响。他母亲姓鲁，因此他以鲁迅为笔名。

鲁迅在成长时期，除偶尔在乡间闲居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绍兴，直到他十七岁时。他在绍兴期间掌握了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坚实知识，对本地的乡土志和著名学者人物有丰富知识。1898年，维新运动前不久，鲁迅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但他对此学堂毫无兴趣，第二年就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他读了不少外国的译书，发现了西方科学、文学、哲学、历史这个新天地。他从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著作中学到了进化论，这是他以后的政治、社会思想中的重要课题。这些著作激发了他，使他相信只要经过合理的行动，人类是可以改变自己 and 改变环境的，因此，中国也可以解脱外国的羁绊而致强自由。1901年，他在南京待了四年后，于1901年从矿路学堂毕业。

他起先认为当一名医生会对中国有大作用，所以他想进现代医科学校。1902年2月，他获得官费去日本学医，搭乘轮船去东京。他在东京学了两年日

文，不参加政治活动，继续潜心于西方知识的学习。与此同时，他在东京出版的中国学生刊物上，发表通俗科学的文章，以求扩大同胞们的眼界，呼吁他们仿效“斯巴达精神”。

1904年秋，他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但只学了两年就离开了。1906年初，他在观看日俄战争的新闻幻灯片时，看到映出一个被日军视为俄国间谍的中国人，被绑着临刑，旁边围着一群身体虽健壮但是无动于衷的中国人。他看了这幻灯片后，认为要使中国人不再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那末中国人民的精神需要来一个根本的改变，能够熏陶人民群众的文学就是促使这种改变的最好办法，而医学，只能治疗个别人的疾病而已。因此，他离开了仙台，在国内短暂逗留期间，听命于家中的安排，结了婚，1906年6月，又与他弟弟周作人回到东京，专心致力于文学。

鲁迅是在东京的少数热心学文学的中国人之一，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尼采、达尔文、果戈里、契诃夫等人的作品。他和他的弟弟办了一个为期很短的刊物《新生》，热心于用西方的思想评述中国古文。他在1907—1908年发表的文章，概述了他对西方文化发展及西方思想与中国关系的看法。他放弃了从前在仙台时的意见，认为不能不顾道德、伦理和精神的价值而强调科学，他认为工业化、拜物主义、民主——他称之为“千千万万不可信赖的匪徒的专政”——不应盲目地在中国采用，他认为中国需要在文学领域内有象拜伦那样关心政治的作家，引导中国走出荒原而进入美满强盛之境。这些文章很明显地呈现出青年鲁迅的思想斗争。他对科学带来的物质成就和精神价值所促成的活力，都倾心向往；他同情大众的痛苦，而不忍见到他们的屈从；他渴望一个近代化中国，而又希望保持传统文化的精髓。1906—1909年在东京期间，他读了像俄国、东欧、巴尔干等“被压迫人民”著作的日文译本，他和其弟周作人出版了两卷欧洲、俄国短篇小说集。其目的是向中国人民描绘出在其他不幸的地域里的人民反抗暴政的精神。这些译文用的都是文言文。在这期间，俄国作家果戈里和安特烈夫及波兰小说家显克微支对他的影响最大。

自1909年回国后的九年中，他实际上放弃了从精神上、实体上拯救中国的想法。他在杭州教了一年自然科学，1910—1911年到绍兴当校长。他觉得群众

仍漠视社会变革，他对翻译短篇小说的工作也因缺乏兴趣而漫不经心。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尤其是辛亥革命的结局加深了他的这种感觉。1912年1月，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绍兴同乡蔡元培请他到南京教育部工作，蔡系教育部的负责人。孙逸仙辞职，袁世凯继任，蔡元培到北京任教育总长，鲁迅也到北京，除短期离职外，他一直在教育部任事到1926年夏天。

北京的政局使他怀疑一切改革的实效，他退出公务生活专心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碑刻，他写道：“这里没有政治问题”。他以清代考据方法，编纂传记、传说和绍兴地方史，以及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他又广泛研究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对他自童年起就喜爱的传奇小说的研究。出版了一本晋以前的古小说集《小说粹钞》，一本汉魏晋六朝的《古小说钩沉》，一本唐宋小说集《唐宋传奇集》，校勘三世纪时的诗人嵇康（223—262）的集子，嵇康的简洁文笔对鲁迅有很大影响。以后他编了一本汉代的文学史《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他编录了有关旧小说和作家的传闻并加以注释，编了《小说旧闻钞》。他又收集了大量早期的刻石拓本，以及编写了尚未发表的有关汉刻石、六朝佛雕和墓志铭的目录。

鲁迅经1919年文学革命运动，又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他在日本时的朋友钱玄同推动他在1918年5月号的《新青年》上发表几首诗和一篇小说，这篇小说题为《狂人日记》，摹仿果戈理小说的体裁，以中国旧家庭为背景，通过狂人而揭露了“人肉宴”。《狂人日记》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情节是与鲁迅所接触的生活不可分的、它和“道德败坏言语僵死”的旧中国一样可憎。《狂人日记》是第一篇在体裁和观念上完全是西方型式的中国小说。在《新青年》以后几期中，他又发表了几篇论当代社会状况的短文，“杂感”就成了他此后闻名的评论文体。

1921年，《阿Q正传》的发表，使鲁迅闻名全国，这篇著作在国外成为最著名的现代中国小说。阿Q“式”已成了用“精神胜利”法在失败和挫折中作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的、中国痼疾的讽刺字眼了。阿Q是辛亥革命期间的一名不识字的乡村贫民，他经常生活在屈辱之中，他在失败中自我安慰地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他认为极大的自轻自贱实际上有一种好处，因为

“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阿Q自认为他比其他的人都好，甚至他的儿子，实际上他并无儿子，也是比本乡文人都高明的学问家。由此推理，中国虽在西方军事和技术优势前屈从，而还自认为“国粹”比“洋鬼子的文明”更高明。

1918—1926年间，鲁迅写了二十多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分别刊载在两本集子中：1923年的《呐喊》，1926年《彷徨》。据鲁迅说，这些小说几乎全都是“在病态社会中不幸人民的生活”为依据，并希望从中激起社会的改革。他的简洁、谨严而现实的文风，给年轻的中国学生和作家以巨大影响。有趣的是那些自由派学者如胡适、陈源，是属于最早承认鲁迅的天才的行列。然而共产党和其他左翼人士则一致反对。直到1929年，鲁迅公开同情他们的事业时才告停止。

鲁迅关于乡间生活的小说，辛辣地描绘了中国农村的悲剧，这些背景大都是根据鲁迅儿时在绍兴的经历和1919—1920年冬他回绍兴时的情景。在《祝福》里，寡妇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噬食，真如她自己被中国的害人的迷信和旧的社会道德所毁灭。《茶杯里的风波》中的船工，《离婚》中的弃妇，都是在万恶的地主压迫下无依无靠的农民典型。《故乡》中的主角，受到“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重压直到生命枯竭而成为“木偶人”。鲁迅同情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孔乙己这样的人物、《伤逝》里的生活为经济所迫的年轻反叛者、《在酒楼上》里的回避未能实现望愿的现实、放弃了理想的主人公。鲁迅谴责自私自利的旧士绅和伪善的冒牌新派人物，如《高老夫子》中的主角，他以新学和拯救中国为幌子，反对妇女教育，说它会败坏公共道德。这些小说，以绍兴和绍兴人为题材，谴责了旧中国。1926年出版了《彷徨》后，鲁迅只写作一些短篇讽刺小说，1935年收集在一起出版了《故事新编》。《彷徨》中的作品是鲁迅最好的创作，是文学革命运动早期的最深刻的作品。为什么后来鲁迅放弃写小说了呢，这是难以回答的。1926年鲁迅离开华北，在厦门、广州遇到了一段不愉快的插曲，这肯定是原因之一。伴随着他与共产党的激烈争论，直到1929年晚些时候。夏志清认为，此后鲁迅逐渐拥护共产主义，他可能是为了保持思想一致而平静下来。

1919年五四运动后，鲁迅所写的文章呼吁中国从沉睡中觉醒，丢掉历史上造成的束缚中国人民的顺从状态，敢于学习外国经验，建立一个合理社会。他反对守节纳妾等陋习的旧家庭制度，以求妇女儿童的解放。他严厉批评崇拜过去而忽视现在，拘守文言而反对白话，轻信土医而排斥近代科学，承袭传统束缚而轻视个人权利等等的“国粹”观念。他写道：“仰慕往古的，回往过去罢！”“现在的土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土地的人们居住的。”这一期间，他独特的散文体趋于完美的境地：简练热情，诙谐的笔调，嘲笑和热讽的词藻润色得很好。

1920—1926年间，鲁迅除在教育部任事外，还在北京大学和在北京其他一些院校教中国文学。1925年，他站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一边，反对政府派一守旧的妇女当新校长，因此解除了在教育部的职务。女子师范大学事件还导致他在《语丝》周刊（1924年11月鲁迅曾主办这一刊物）上发表文章，和支持教育总长章士钊的陈源等人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进行了一场论战。在1925年时，他还热心帮助年轻作家成立“未名社”，发表了不少俄国近代作品的译文。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屠杀游行学生，鲁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他被认为是危险过激分子，隐匿了两个月。1926年8月，他离北京去厦门大学执教，该校教务长林语堂使他很不愉快，他在厦门耽了几个月，于1927年1月去广州中山大学教书。鲁迅当时在全国被誉为作家、无畏的社会评论家，他在厦门和其他地方的学生，有不少随同他去广州中山大学，他在中山大学受到热烈欢迎。他在那里教中国文学，并担任了三个月教务长之职。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破裂，接着发生清党，鲁迅对此憎恨而辞职。

直到那个时候鲁迅虽经过不少的失望，但总抱着中国能在向前发展中好起来的信念。但是1927年大屠杀中的流血暴行，当时他的一些学生被害被捕，以及中国青年自行分裂的局面，这些使他深为虑忧。他在广州逗留了几个月，和他从前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夫人的许广平去上海。除1929年、1932年两次短期去北平外，他从1927年10月到1936年一直住在上海。1936年10月19日去

世。

鲁迅在上海的头两年，是他政治上与左派来往的关键时刻。他虽早在日本时就开始对俄国感兴趣，但并不注意俄国革命，他虽通过投稿《新青年》和陈独秀、李大钊有过接触，但并没有参加过1927年前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只是在广州时，他才和中国共产党有间接的接触，他断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动力。1927年发生的事件，使他大为失望，他要寻求新的见解。他一到上海，就阅读有关近代俄国文学、有关马克思主义、有关俄国的翻译书籍。他从不妄求系统学习，没有读过《资本论》，他这一期间的著作也很少反映有关他读过的上述著作。他和柔石、冯雪峰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的青年作家来往密切，但与共产党地下组织似乎没有联系。那时，共产党也并没有完全肯定鲁迅，间或还认为他对无产阶级来说不过是个门外汉，而且还批评他的政治和学术上的看法。1928年，党领导的《创造社》和《太阳社》一致攻击他，回击他对革命文学苛刻的评论。一场论战接着发生，而以他屈服于共产党的批评者告终。

1928—1929年间，鲁迅虽然公开回答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对他的批评，但他私下重新评价自己过去的个人主义立场。他阅读马克思著作和苏联文学的日文译本。鲁迅对辩证法的掌握始终是不稳固，但在1929年底，鲁迅和共产党已准备密切合作了。1930年2月，他加入了自由运动大同盟，这是反对限制言论、新闻、集会、出版自由的一个团体。1930年3月，他全力投身于筹建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他与设在莫斯科的革命作家国际联盟取得联系。1933年初，他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这是一个并非由共产党组成的反对国民党的团体。是年秋，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属共产党阵营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反战会议，他被推为会议的主席团成员，但因危险太大并未参加。他与当时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瞿秋白来往密切。瞿秋白为躲避逮捕，鲁迅曾三次将瞿隐藏起来。鲁迅还和李立三、陈毅联系。1935年，方志敏在南昌狱中写的遗书，经鲁迅之手转达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还有，1936年初从北平派来的交通员带来共产党的有关华北工作的秘密报告，也是经鲁迅之手转达中共中央的。

鲁迅并未热衷于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对抱住马列主义的教条不放也持有怀

疑，因此他始终没有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之所以同情共产党，主要是因为他长时期地痛恨中国旧的社会制度中的不公平，他的热情奔放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对列强在中国的特权的憎恨，以及对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施行的专横、迫害和审查制度的激烈反感。他是一个独立的、不受约束的、不尚空论的共产党的支持者，他认为共产党是唯一能起作用的反对国民党的政党，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在中国生存下来的可使民族新生的仅有的力量。他不尚空论的情况，在许多方面和他的朋友宋庆龄、茅盾很有相似之处，而与左翼作家联盟的年青的总干事周扬的严厉的发声令引起冲突，在1936年的有关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他和周扬发生冲突。

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看，鲁迅所进行的社会批评的主要目标是非正统主义的，因为他的最终分析将造成中国的耻辱的原因归罪于中国的自身，而不是“帝国主义敌人”。鲁迅到上海之后，作为一名作家的创作生活已经过去了。因为他认为文学的根本使命是批评社会、促使其改进。因此他集中精力评论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学现象。他用他称之为“金钱无法买得的”笔杆，写出一篇又一篇的评论，痛斥国民党的愈来愈严酷的审查制度、对共产党和其他反对者滥用恐怖手段、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他怒斥国民政府叛卖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剥削中国人民。他说，中国处于十分不幸和虚伪的境地，人民是屈从于命运的无权申诉的奴隶。他说：“我们在中国生活像浑水里的鱼，活得糊里糊涂，莫名其妙，不死不活”他对那些麻痹人民的伦理道德，并不减弱他的笔锋，他认为除了阿Q的自以为一切都好的弱点之外，还有那些自欺欺人、残暴虚伪、听天由命、只求外表不求实际的弱点。他说：“在中国往往招牌一挂，就算万事大吉……中国确是太不认真了”。鲁迅对于未来，并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中国是一只“黑染缸”，一碰到它就被污染，民族复兴的道路是既长而又艰苦的。但是鲁迅深信：“要说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地位，那是胡说”。

鲁迅反对国民党，使他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特别自1930年之后，他常常有被捕的危险。他的声誉是对他最有力的保护；只有少数亲信朋友知道他在上海的住处，他在外边看望朋友，他常在他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书店里。

1933年5月后，他不能继续用鲁迅的名字发表文章，他的文笔也不得不更加隐晦。他的文集被禁，但在1934—1935年间，他的文集通过非法渠道出版，秘密发行。

虽然鲁迅在上海并没有写出象以前那样的创作，但仍被尊为中国文学界领袖人物。1928年，他创办一重要月刊《奔流》，当年，又和一些年轻友人组成了《朝华社》。1930年后和左翼作家联盟有联系，但并非领导人。1934年时，他是《译文》的创办人之一。

这一时期鲁迅对中国文学的最重要贡献是他的杂文，体裁简洁而多样。鲁迅善于表达他的寓意，他能运用惊人的语句、深刻的隐语、巧妙的比喻以及简洁的文字，这一切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他的许多仿效者是无法比拟的。

鲁迅又是多产的翻译家和不少翻译团体和刊物的主持者，他介绍了他认为对于中国和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用处的小说作品和文学理论。他的很多译作转译自日文和德文，因为他仅懂日、德两种外文。直至1926年他在北京期间所翻译的俄国和日本的作品，注重于探讨文学的社会道德和社会作用的问题。1928—1930年，他在上海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时，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哈诺夫的有关文艺理论的著作，以及翻译了日本片上伸所著的简要而系统的著作《无产阶级文学诸问题》。为了使中国读者了解俄国文学界最新的发展情况，他翻译了1924—1925年苏联有关文艺政策争论的基本材料，以及翻译了俄国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如法捷耶夫的《毁灭》）和同路人的作品（如耶可维利夫的《十月》）。他在世最后两年里还翻译了契诃夫的小说选集、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及果戈理的《死魂灵》。鲁迅还写过一些诗，有文言文的、也有白话的。他的白话诗很平常，但他的古体诗，恰如评论家夏志清所说：“至少可以和他最好的白话散文媲美，简洁、辛辣、幽默、‘有凝住了的火焰’的美，纵横交错的红丝组成的诗体像澄清洁白的冰层下的珊瑚”。鲁迅的诗收集在《死火》（原文如此）集中。

鲁迅对版画艺术有长期的兴趣，虽然他自己并不是一个制图者，他熟知中国传统的木刻技巧，并广为收集汉魏六朝唐人拓本。由于他对中国的木版印刷

很感兴趣，因此重视西方艺术家的现代木刻。他认为这在中国这样一个机器印刷还不普遍的条件下，是一种普及社会教育的经济实惠的好办法。1929年，他首先编印了一本英国艺术家的木刻集后，又编了第二本包括法、美、俄、日艺术家的木刻集。当时，几个中国年轻艺术家开始学习西方木刻，杭州的“木铃社”出版了这一木刻流派的早期作品。

杭州的社团于1929年被封，于是就在上海出现了“上海一八艺社”，他们的口号是“走出沙龙，奔向街头”。以鲁迅关于真正的大众艺术的思想为其宗旨，1931年初夏，在上海青年会举办了第一次展览会，该展览会的小引是鲁迅写的。鲁迅为了鼓励更多的人从事木刻，在1931年秋季举办一个木刻讲习班，请日本美术教员讲授木刻技法，鲁迅自任翻译。1932年，这个木刻讲习班发展成为一个新的艺术社，在鲁迅赞助下又在上海青年会举办了该艺术社的第一次展览会。鲁迅收集了这些青年木刻家的代表作妥善保存，并选编成一本《木刻纪程》，于1934年出版。

鲁迅除出版不少西方现代美术家的作品为中国青年木刻家作参考外，又努力让他们了解中国原有的传统，为此，他和郑振铎合编出版了两册印有淡墨木刻的传统信笺的集子，一册是十七世纪胡曰从的《十竹斋笺谱》，按原作重刻后印刷，于1936年鲁迅逝世前出版；一册是《北平笺谱》，系现代作品的选编，依原样印刷，于1938年出版。

起初，鲁迅欣赏欧洲木刻家的技巧，特别对盛极一时的英国流派，后来他深为爱慕俄罗斯木刻家和欧洲的社会主义美术家，特别是德国的凯绥·珂勒惠支。1931年，他对登载在《版画》杂志上的俄国小说《铁流》的木刻插图十分赞赏，这些对工业文明的强有力的描绘，促使鲁迅设想用木刻来反映当代现实。他认为这种描绘手法应是现代中国艺术家的方向。他设想向中国青年提出要求创立一种新的民族艺术，那就是采用西方艺术家的高超技巧，又保持中国的精神气概。

鲁迅的文学声誉，是树立在已出版的少量著作上：两册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数量不多但评价很高的散文诗集《野草》。他的更大的声誉，则是由于他作为社会评论家，尤其是他在上海时生命的最后几年。

鲁迅对中国传统性格的控诉，给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极大影响。他们公认鲁迅所讲的是真理，他们共享鲁迅怀有的为建立美好中国的强烈愿望，他们尊崇鲁迅一贯地毫无保留地为五四运动争取基本自由的目标而献身的精神。自1927年以后，由于鲁迅毫不屈服于官方对他的压力，又由于鲁迅明确表达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抗议国民党的政治迫害、检查制度以及对日本侵略的屈让妥协，因而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他更为敬仰了。由于鲁迅在政治上同情左派，因而使他成为左翼反对派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全国旗帜。但是鲁迅的根本主张要广泛得多，他最为关切的是在中国发展自尊自信的新精神，这种精神将作为国家复兴的基础。他的杂文大都是针对当时的局势而作，因此以后的读者不易读懂，而成为后来的专门家的研究课题，但是鲁迅的名字作为追求一个真正现代化的中国的象征，那将是永存的。

在有关文学的问题上，鲁迅虽然和共产党有过争论，但是他逝世后，共产党立即推崇他是文学界的爱国者。毛泽东在1940年1月写的文章中称崇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在毛泽东所著的有影响的文章《新民主主义论》的文化部分中，将鲁迅当作一位几乎是传奇式人物，描绘成是1919年五四运动涌现出的最有力、最有影响的社会评论家，“而鲁迅，就是这个新文化新军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有没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1936年鲁迅逝世后，立刻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筹备出版他的著作的全集，委员有郑振铎、胡愈之、许广平等。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终于在1938年在上海出版了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蔡元培为全集作序言。1949年以后，发表了无数的有关鲁迅的回忆、传记、研究和称颂的文章。1946年和1953年由唐弢主编先后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两卷。由许广平主编的《鲁迅书信集》分两卷发行（第二版1952年在北京出版）。1959年又出版了《鲁迅日记》。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几卷鲁迅著作的英文译本，除《阿Q正传》外，1954年出版了十八篇早期写的小说《鲁迅小说选》，1961年出版了有八篇小说的《故事新编》。北京出版的英译本的《鲁迅选集》共有四卷。第一卷是

短篇小说、散文诗和回忆录，附有冯雪峰写的介绍鲁迅生平和评述的序言，出版于1956年。此后三卷，按年编选了他的杂文：第二卷（1957年出版），选有1918—1927年期间的杂文；第三卷（1959年出版），选有1928—1933年期间的杂文；第四卷（1960年出版），选有1934—1936年最后时期的杂文，并附有鲁迅生平和著作年谱。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译本，附有影印的古代木刻的复制件和一些珍本摹本，1959年在北京在版。

周 作 人 原名：周櫛寿

字：启明 号：知堂

周作人（1885——），散文家、学者，西方文学作品的白话文译者，他和他哥哥鲁迅，使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散文达到一个新的显著地位。

周作人生在浙江绍兴，他与两个兄弟鲁迅（周树人）和周建人都在幼年时受旧式教育。1893年他祖父因被控试图行贿省监考官而下狱，1897年他父亲又去世，家道中落。周作人不得不辍学离开家乡，去杭州依附他的富裕的亲属。

1898—1899年考上秀才，但并不因此登上仕途，而到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在那里学了英文和船舶工程及军事技术。那时，严复、林纾等人将西方作品翻译成中文，周作人对西方的社会和文化历史较之学习水师更有兴趣。1905年在《小说林》上发表了她的译作《金甲虫》，他还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孤儿记》，这是他在读了苏曼殊翻译的《悲惨世界》后写的。

1905年，周作人到北京，参加公费留学考试，考试合格。六个月后，他毕业于南京水师学堂，就和他哥哥鲁迅一起去日本，先在法政大学学日文，后进入立教大学学英国文学。同时还学日本的古典和现代文学和希腊古典文学。

留日的中国政治避难者，常在学生中激起他们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兴趣。钱玄同设法使周作人、鲁迅等人和章炳麟经常见面，章给他们讲授有关政治和语言学的问题。周作人、鲁迅和少数几个朋友试图办一份有助于民族复兴的文学杂志，但未成功。周作人翻译了哈格特的小说和裘开的小说，1909年出版他的《域外小说集》二卷，鲁迅写了序言，内有鲁迅的几篇译作。这本集子主要选

自东欧作家的作品，希望中国人民了解在旧社会制度下其他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精神，以唤醒中国人民。该书在出版的当时并未引起注意，以后才赢得文学评论家们的赞赏。

1912年，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中国，在浙江省教育厅当督学，六个月后，到绍兴省立第五中学教书。他在教书之余，于1914年翻译了显克微支的《木炭素描》，他写作的一些短篇故事收集在1932年出版《儿童文学小论》一书中。他和鲁迅一起编辑和出版古文献和绍兴地方志。

1917年1月，周作人全家迁居北京，在国史馆工作。8月，进北京大学文科教书。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持下，正成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激进分子、《新青年》主办人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主任，文学改良运动的倡导者胡适是哲学系教员。周作人开始写作有关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文章，在《新青年》和其他杂志上发表。他是文学改革的拥护者，所以他用白话文写文章、诗歌、译作以及学术论文。早在1919年1月，他就尝试新诗体裁。他的早期白话文章大都是有关儿童的作品，有一些原文是用日文写的。他的一些白话诗，和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郑振铎等人的诗编在一起，于1922年出版了一本诗集。周作人的诗虽然受到读者的欢迎，但他并不想用诗来表达思想，因而主要是从事写作散文。中国文学需要从旧束缚中解脱出来，而用现实主义的思想加以充实，这是他在许多评论性文章中的论点。他认为文学应该反映人们的全部生活，也包括人们处境的消极方面，这种有关人文主义的观点，在他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文章中表述出来。他从更广泛的社会方面来考虑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在1918年的论文中说得很清楚，他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随五四运动的反孔高潮之后，他斥责固有道德训条中的迷信和不合理的部分，但又认为人类需要有道德和精神的熏陶。

周作人在国外文学和历史中，追求新价值来代替他对古典作品的兴趣。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于1918年出版，该书主要是论述希腊和罗马时期，以及涉及十八世纪前欧洲文学的发展。此后十五年中，他出版了十一卷译作，这些译作在运用白话文，以及发掘民族文学方面的意义是很大的，因为这些作品是过去的翻译者所忽略的。周作人和鲁迅合编的《现代小说集》（1922年出版），

所选的主要是东欧和俄国作家的短篇作品。1926年出版的柯罗连可的《马加的梦》的译本。这些译作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中,在中国大批涌现俄国和东欧小说、诗歌、剧本的译本的前期作品。1923年出版的《近代日本小说集》,也是和鲁迅共同编选的,其中有武者小路、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国木田独步等人的作品三十篇。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学也很有兴趣,这从他翻译希罗多德和希荷克里斯的抒情诗中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这些出版物,使他拥有了外国文学的权威地位,许多学者请他去讲课。1937年战争爆发前他曾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中法大学任教。

周作人在近代中国文学界的名望,不仅因为他有许多著作,而且在一些对当时的文学倾向有影响的社团中起重要作用。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成立了,会章由郑振铎拟订,发起缘由系周作人撰写,说明了该会的宗旨,该会的其他知名人士有茅盾、郭绍虞、叶圣陶、孙伏园。二十年代初,孙伏园编辑北京《晨报》文学副刊,周作人和鲁迅经常为该刊投稿。1923年出版了周作人的文集《自己的园地》,收集了他的五十多篇纵论社会文化等问题的文章,是一本广为流传的著作。1924年11月,“文学研究会”趋于分裂,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刘复、林语堂、孙伏园组成了“语丝社”。在成立宣言中,声明该社同人并无共同推动政治思想的打算,而主张支持自由思考和独立行事。周作人为该社周刊撰稿,该刊的撰稿者经常对当前政治和文化问题自由发表各自的意见。周作人竭力主张文学必须重整民族道德和良知,以恢复中国的国际声誉。在另一些文章中,他哀叹中国人的腐败、自欺、乱谣、自卑等现象,他认为这是造成社会政治动乱的根源。

1926年3月,在北京发生骚乱五十名学生死亡。周作人等教师和知识界人士,因被段祺瑞政府认为是过激分子,列入黑名单中。1927年4月,张作霖进占北京,出版不少周作人书籍的北新书局关闭,《语丝》杂志被封,李大钊被捕处死。10月,周作人、刘复避居在日本武官家里。周作人遭此经历,又由于他批评文学为阶级斗争进行宣传的主张遭到左派作家的严厉批评,周作人逐渐退出文学界。他隐居在北京,研究中外文学,和友人俞平伯、徐祖正办了一份杂志叫《骆驼草》,继续写文章,但是格调渐趋狭窄仅及于身边琐事。1927年写的

《闭户读书录》这篇文章，反映了他从写评论文章、转到黯淡的反省和往事的回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是1932年3月他在辅仁大学作讲演时的五篇讲稿的集子。他认为中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出现，表示对过去权威思想的一次审订。

1937年夏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仍留在北京，1939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文学学院院长，一年后，又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为什么在日本占领期间留在华北，是广为争论的问题。当然有种种个人和家庭的原因，他也许还认为他留在那里可以使北京大学免于遭日本人的劫掠。当然，他对日本文化的某些方面是深为尊崇的。他继续写文章，战争期间，在上海、天津、北京还出版了几册他的作品集。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仍很注意，1942年10月《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上有一篇周作人对博德翻译的《北京的风俗节期》一书的详细评论。

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国民政府当局逮捕周作人，在南京以投敌罪被判处死刑，但未执行，改为十五年徒刑，据说这是因李石曾、胡适的疏通。1949年由代总统孙连仲（原文如此，应为李宗仁——译注）给以赦免。周作人被释后，在上海住了一些时候，又迁回他北京的故居，他的妻子在1962年去世。在以后岁月中他对文学的兴趣并未减退，1952—1954年他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有关鲁迅早年在浙江的生活；一本是有关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原型。他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八世纪日本神话传奇的著作《古事记》的中译本。

周作人在文学界的多种多样经历，完成了三十多部散文集，就此而论，他作为一个作家是当之无愧的。周作人在1930年前发表的文章从道德和心理范畴来阐明新文学，而胡适则从历史学的范畴来论述。周作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受弗洛伊德、法朗士和霍理斯的影响。他在三十年代是属于林语堂一派的人物，他成为这批人的代言人，怀疑儒家学说，主张宽容而反对愚暴。他和鲁迅一起，使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间的散文达到了一个新高峰，对他那个时代作出了卓越贡献，波拉在1965年《亚洲大众》杂志上发表文章，评论周作人的文学生涯时说：“周作人垦殖了他的园地”。

周建人（1889—），周作人弟弟，是生物学家，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47年出版了他的达尔文《物种起源》的中译本。1948年，他在共产党华

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任职。1949年后，他在中央人民政府任编辑、科学、文化方面的职务。1954—1958年在北京任高教部副部长，1958年1月继沙文汉任浙江省主席，兼任中国科学院浙江省分院院长。1949年后，他在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促进会两个非共产主义政党中任重要职务，1955年升任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1956年任中尼友好协会会长。

周 作 民

周作民（1884—1956.3.8），金城银行的创始人，在华北推行近代银行管理制度而著名。

周作民在江苏淮安出生，他父亲是一名举人。周作民幼年在家中从师受业。在本世纪初，他去上海进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未毕业即去日本，1905—1911年进京都帝国大学，学法律。

他回国后到北京，任新成立的民国政府的财政部库藏司长，1916年任交通银行芜湖支行经理，不久回北京任总行稽查长。

周作民认识到华北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日益增长的要求，需要在那里发展现代商业银行业。于是，他于1917年在天津创办金城银行，任总经理，1920年任董事长。该行开办资本为五十万元，不久即拥有四百六十万元存款。

1917年金城银行成立时，该地区只有三家私人商业银行。由于周作民的积极指导，金城银行成为近代银行业的范例。1917年后的五年间，在华北先后有十一家新的商业银行仿效金城银行而成立。

1923年，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汇集它们的资金成立了联合储蓄会和联合金库，周作民任常务董事。这四所银行就是知名的北四行。周作民后来又任中国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董事，兼任北平银行公会和北平商会主席。

1937年，金城银行增加资本至七百万元，吸收存款达一亿七千万元。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私人银行。它的存款额比陈光甫经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多。1937年前，在全国已有支行六十五处，其中百分之六十设在华北。

金城银行向工业、矿产和交通事业投资，以助中国的经济发展。1937年战

争爆发前，给予上述三项事业的贷款占该行总贷款额的百分之四十。在工业方面，与天津永利化工厂（中国最大的化工企业）及其所属的久大精盐公司、金海实业研究所密切合作。在纺织业方面，金城银行给予财政资助的有天津裕源、北洋棉纺厂，这两家工厂占全国纱锭的百分之八十，又对占全国纱锭百分之五的上海新裕纱厂给予财政资助。在造船业方面，给予上海中国造船工程公司以财政资助，河南安阳的老河口煤矿公司也从金城银行得到贷款。老河口是中国第五位的煤矿，战前年产百万吨煤。山东中兴煤矿公司在1929年改组后，金城银行成为向中兴公司提供贷款的银行团的一个成员，该银行团为中兴矿的现代化和恢复生产提供了大笔贷款。金城银行在铁路方面的投资也是很可观的。

金城银行虽系商业银行，但在华北的农业贷款方面也是个首创者。1934年该行为建立华北农业改进研究所提供贷款，该所为改进棉花生产而设立。该所的建立得到天津南开大学、以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合作，其他的大学，如清华、齐鲁也来支援该组织，1935年，河北省棉业改进会也加入了这个研究所。由金城银行发起，建立了一个农村贷款联合团对冀、晋、陕、豫、皖的农业生产运销合作组织给以信贷，在发放信贷工作中金城银行承办了河北全省的棉业贷款，款项贷给了三百多个合作组织。

周作民又是中国保险业的先驱者，1929年，在金城银行下附设太平保险公司，创办资本为国币五十万元，经营水、火、汽车保险。四年后，公司扩大，交通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国华银行和东莱银行都参加进来，资本增加到国币三百万元，并增设了人寿、战争和灾难保险，周作民任总经理的太平保险公司，1937年前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

他在1920年成为通成产业公司的领导人物，后来担任该公司的总经理职务。该公司设三个部门——贸易，储存和船运——经营棉花、煤炭、粮食业务，拥有小型轮船十艘及在国内各主要商埠设立货栈。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金城银行在华西各省先后设立了三十个新支行，对内地工矿运输业给予财经资助，其中主要的有：卢作孚的四川民生实业公司，以及与民生实业公司有关的民生机器厂、大明纺织厂、天府煤矿公司等。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作民、卢作孚合作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有三只运洋轮

船，经营中国沿海运输。

1949年共产党解放大陆，那时周作民在香港。在新的情况下银行业务衰落，而职员则要求加薪。为解决这个问题，1950年周作民回到大陆，希望恢复他经营了三十多年的金城银行继续营业。1951年9月，华北各私人银行合并。195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私人银行改为公私合营企业，金城银行当然不复存在。于是周作民退休。1956年3月8日，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

周自齐 字：子广

周自齐（1871—1932.10.20），政府官吏，在袁世凯政府中任财政总长。因参与袁世凯帝制阴谋，1916—1917年被迫避居日本。后来，1920年又任财政总长，1922年署国务总理。

周自齐原籍山东单县，生在广州，当时他父亲在广州作官。由于他在南方长大，他能说广东方言，这使他能与广东的财政界重要人物如梁士诒建立关系，密切来往。

他幼年在广州受旧式教育，后回山东应科举试。1894年成秀才，后去北京进同文馆学英语，又到美国进哥伦比亚大学。

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1896年在伍廷芳手下任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馆秘书。1899年调驻纽约领事。两年后，去古巴。1901—1902年在哈瓦那任中国公使馆代办。1903年任旧金山中国总领事，他谙熟粤语，与华侨交往方便。1904年任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馆一等秘书，四年后，被召回国。

1908年，周自齐到北京，在外务部任右参，在以后二年中，提升很快，提为左参，不久又升任右丞、左丞。1910年奉命赴美任中国学务部代表，监督中国留美学生。同年，为载洵亲王随员去日、英考察海军。1911年为载振亲王随员、庆贺英王乔治五世加冕。

周自齐回国后，武昌起义不久爆发了，革命军势力已在国内许多地域掌权，袁世凯正在北京组阁，周自齐任财政次长。

1912年，民国正式成立，孙逸仙辞去临时大总统职，由袁世凯继任。3月

间袁任周自齐为山东都督，周在山东任职一年有余。1913年8月他被召回北京，任中国银行代理总裁。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采取措施巩固其势力并消灭异己。袁为实现称帝图谋而采取了一项过渡手段，于1913年8月，任命熊希龄为总理，熊组成所谓“第一流内阁”，包括那些当时的知名人物，如张謇、梁启超、孙宝琦、段祺瑞。但是重要阁员，早已由袁世凯认定，袁授周自齐为财政总长，但因熊希龄坚持兼任财政总长，所以后又改任周为交通总长。

利用熊希龄内阁的意图是要通过1913年选举法（作为宪法的一部分），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公然采取了压迫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等办法。1914年袁公布新临时宪法，取消内阁总理，另立“国务卿”。2月，熊希龄辞去内阁总理及财政总长，周自齐任财政总长，这一职位袁世凯早先曾授与周。新临时宪法施行后，徐世昌任国务卿，再任周自齐为财政总长。

1914年底，修订选举法，使袁世凯能成为终身总统。但他的野心永不能满足，这时他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了。据说，周自齐请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为北京政府起草一份备忘录。古德诺，这位哥伦比亚的教授，后来当上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他向袁世凯呈递报告称，帝制比共和对中国更为适宜。古德诺的备忘录为中国的推行帝制运动的说客们提供了理论，他们在1915年后半年，继续议论此事并为全面开展帝制运动准备基础。

袁世凯已完成了登上皇位的准备，周自齐接受了另一重要任务。袁世凯为了防止日本反对帝制的可能性，决定向日本天皇授以中华民国最高勋章，以赢得日本的好感。1915年10月，周自齐受袁世凯之命为使日特使，并已准备起程。不料1916年1月，周自齐正准备去东京，日本政府宣布拒受袁世凯的馈赠，拒绝周自齐作为特使去日本。据说此行取消，对周自齐是个极大的宽慰，由此卸下了这一沉重使命。

1916年5月，袁世凯又恢复内阁制，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周自齐再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周自齐当即辞职，他是袁世凯治丧委员会委员。

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组新政府。1916年7月14日，新政府宣布，参加帝制活动的人员将予以宽大处理，而事实上大多数人也并未受到惩罚，只有直

接参加这次活动的八人，明令逮捕。周自齐即是其中一人，他逃离中国去日本躲避，一直到1918年2月。当冯国璋代署总统时，取消对周自齐、梁士诒、朱启钤的通缉令，梁、朱分别当选为新国会参议院议长和副议长。

1919年，周自齐又恢复了他的政治生涯，任币制局督办。1920年8月靳云鹏任内阁总理，周自齐任财政总长。当时北京政府的财政动荡混乱，周自齐和交通总长叶恭绰认为唯一措施是再次发行国内公债，但事前必须使旧公债的信用稳定。他们准备整理旧公债，但遭政府中其他官员反对。1921年5月，靳云鹏重新组阁，免除周自齐、叶恭绰两人的职务。于是周自齐以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赴美。

1921年12月，梁士诒接替靳云鹏为国务总理，因遭直系的反对，任职一个月就去职，由颜惠庆代署总理。1922年3月，直奉战争发生，5月，张作霖的奉军失败。在此之前，颜惠庆已辞职，由周自齐署理国务总理。直系军阀要求当时的总统徐世昌下令逮捕梁士诒、叶恭绰、张弧（梁士诒内阁的财政总长），因为他们支持张作霖。徐世昌得下达命令，而内阁总理周自齐也得副签逮捕令，可是这三人都是周的政友，所以周的处境十分困难。他私下通知梁士诒，向他致歉，并劝他立即离去。据说，梁士诒当时以为是开玩笑，不相信他的知友竟会下令逮捕他。后来，周自齐在临死前托一位朋友转告梁士诒，签署逮捕梁士诒的逮捕令，是他的毕生憾事。周自齐于1922年6月辞职，是由于徐世昌为直系所迫下台，黎元洪复任总统。周自齐离代总理之职后，当了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的挂名职务。他决定退出政界，去美国游历。

周自齐在美国对电影工业很感兴趣。回国后，筹办孔雀电影制片公司，拟经营发行外国影片，并拍摄中国电影。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他病倒了，1923年10月在上海逝世。

朱 家 骅 字：骝 先

朱家骅（1893.5.30—1963.1.3），1923—1932年，1944—1948年先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32—1935年任交通部长，1941—1944年任考试院副院长

长，1939—1944年5月任国民党组织部长，1936—1938年任中央研究院秘书，1940—1958年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

朱家骅浙江吴兴人，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十岁时，父亲去世，次年母亲又去世，由其长兄抚养。因近地没有学校，他被送到南浔读书。

1907年朱家骅十五岁时到上海，进了德国人开办的同济医校。1911年秋武昌起义，极大地激发了上海的青年。朱家骅参加了一个学生团体，该团体反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这个团体也从旁参加了共和革命军对上海江南军火厂的进击。1911年冬，朱家骅中途辍学，参加中国红十字会组成的团队去武汉。1912年他回上海时，同济医校内已新设了工程系，朱家骅转入工程系。在1913年二次革命时，朱家骅投身共和革命军推翻袁世凯的统治。

朱家骅为了出国深造，1914年3月离开上海由西伯利亚铁路经俄国到了柏林，他先在鲁尔矿区实习，然后在1914年11月进了柏林冶金学院。由于欧战爆发，他来自中国的经济来源断绝，不得不靠他以前工作过的矿区的经理给予一点补助来维持生活。冶金学院后来并入柏林大学，德国的大学生都被征入伍，他们班上只剩下朱家骅和两个荷属东印度的华侨学生。这两个华侨学生后也离校，朱家骅亦随之离校，他于1917年回到上海。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安插朱家骅在该校教德文，第二年他获得教育部留学欧洲的名额。他先到美国去游历，又在巴黎停了些时候，1918年底到达瑞士。1919年上半年，他在伯尔尼大学学习地质学，他有一次在瑞士登阿尔卑斯山摔伤，住医院医治了几个星期。健康恢复后，他在苏黎世大学上了一学期。1920年又转到柏林大学继续学地质，1922年取得博士学位。他学成后仍留在德国，在柏林进行研究工作直到1924年，放假期间曾到英国、法国旅行。

1924年秋朱家骅重新回到北京大学教书，任地质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他和北京大学的其他教职员一样，对当权的北京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感到不满，而对在广州得势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兴力量表示支持。1925年上海5月30日事件后，他是组织学生反帝示威游行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11月，北京支持广州国民政府要求段祺瑞辞职的群众示威游行，朱家骅是组织者之一。1926年3月，朱家骅被当局认出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而不得不在北京法国医院躲藏。1926年

夏，朱家骅悄悄离开北京到广州，在那里正由蒋介石负责训练进行北伐的军队。

1926年秋，朱家骅在戴季陶为校长的国立中山大学任地质学教授。在广州国共的纷争日益加深，很快影响到中山大学的办学，接着即由戴季陶、顾孟余、徐谦、丁惟汾、朱家骅五人组成机构主持校政。此五人中除朱家骅外，其他四人都在广州国民政府中有实际职务，因此在这个困难时期，朱家骅成了中山大学的实际负责人。

朱家骅投身政治始于1927年，那时在上海正开始了从国民党内排除共产党人的所谓清党运动。1927年春在广州成立了广东省政府，朱家骅被任命为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内政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委员。三个月后，广东省政府改组，任命朱家骅为教育委员、中山大学副校长，戴季陶再次任该校校长。国民党清党后，在广州和中山大学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1927年12月，共产党领导起义成立广州公社，中山大学的校舍遭到很大破坏，朱家骅不得不离去他在政府中和大学中的职位。

接着南京国民政府任朱家骅为浙江省行政委员，浙江省已由国民党控制。朱家骅是张人杰的下属，张人杰从1928年末到1930年1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本人既是浙江人，又得到上司的支持，所以他能够在浙江实行了一套行政改革，例如：减低地赋、实行户口制度、地方自治、县长考试、创办警官学校。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家骅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0年秋，朱家骅辞去浙江的职务回广州，短期内担任了中山大学校长。1930年11月，被召去南京当中央大学校长。1931年春，任中英教育文化捐赠基金会主席，该组织不仅有权选派学生去英国大学深造，而且有权支配为中国建造铁路和其它建设事项的英国退还的中英庚款。他在这个很有权势的位置上工作多年。1932年2月，他离开中央大学继李书华而任教育部长。李在1931年后几个月中，曾任教育部长。朱家骅为了使中国教育制度现代化，着手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和章程。1932年11月，他在南京还被任命为交通部长。他继续担任教育部长一职，一直到1933年4月才由王世杰继任。朱家骅任交通部长时，扩大了中国的交通和通讯设施，其中有：民用航空、航运、电讯等，他还协助

邮政和邮政储蓄制度的现代化。

1935年底，朱家骅离交通部长之职，1936年初，继丁文江而任中央研究院秘书，是年底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中日战争爆发，浙江成为重要战区。战争初起，朱家骅阻止了狂热的中国官员主张在日军进攻时破坏杭州城的计划，因而保存了杭州而获得称颂。由于新的战争形势的需要，浙江省政府很快加以改组，朱家骅被免去省长的职务。

在战时，从1937年至1945年朱家骅在国民党中的影响稳定上升。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家骅不仅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而且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38年3月，他出席了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中，确定蒋介石为总裁（党的领袖），又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征集和训练党务工作人员的新机构。1938年4月，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兼新的青年团的代书记长。1939年12月，继陈立夫而为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担任这个中央党部的要害机构的职位，一直到1944年5月，才由陈立夫的哥哥陈果夫继任。虽然朱家骅参加了二陈兄弟领导的国民党的一派，但后来他逐渐得势，也纠集起了自己个人的势力。1941年到1944年，他在重庆还担任了考试院副院长的职务。

1944年11月，朱家骅又任教育部长，国民党组织部长复由陈立夫担任。朱家骅这次担任教育部长，已到了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接着开始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1948年12月，他最终离去教育部长职务时，回想一下这十七年来，在这个国民政府的重要岗位上任职的，只有王世杰、陈立夫和他三人。1949年夏，他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1950年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后，他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职务，只是充当总统的高级顾问。

尽管朱家骅在政府中的官职很多，但在他整个经历中，还有许多外界的活动。1935年夏，他创建了中德文化协会，他在中英文化界也很有声望，1937年到1946年，他担任国际联盟的副主席一职。1946年后任联合国中国协会主席和联合国世界联盟的名誉副主席。朱家骅又是1928年创立的中央研究院的发起人，1936年到1940年，他担任该院秘书，1940年蔡元培去世后，他又担任了该院代院长，建立该院的一些研究所。1958年他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

院士们推选胡适继任。朱家骅一直在台湾，1963年1月3日因心脏病在台湾逝世，享年七十岁。何应钦是朱家骅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朱家骅风度翩翩，平易近人。他的同事们惯于穿长袍或中山装，他就偏爱着西服。

朱家骅虽然长期和学术机关和学术界接触，但因为他的公务太忙，并没有写出有创见的学术著作。《朱家骅先生逝世纪念集》1963年在台湾出版。

朱 执 信 原名：朱大符

笔名：蜚仲、县解

朱执信（1885.10.12—1920.9.21），反清革命家，孙逸仙的信徒。他是同盟会的积极宣传者，广东反清起义的组织者。后来，他曾支持组织反袁力量。在发展和普及孙逸仙的政治和社会思想方面，他是个主要人物，他创办了《建设杂志》。

朱执信祖籍浙江萧山，出生于广东番禺。他父亲朱棣垞是一名学者，曾是张之洞1884—1889年两广总督任内的幕府。朱棣垞迁居广东，当清代地方官的幕僚。朱棣垞从当时著名学者汪谷庵受业，汪谷庵的女儿就是朱执信的母亲。汪谷庵的侄儿是汪精卫，所以朱执信的母亲是汪精卫的堂姐。朱家的家境并不富裕，但还能有供子弟受普通旧式教育的机会。此外，还从他的舅父汪仲器学数学。朱执信进入半新式的教忠学堂读书，研究数学，并研究与此相关的中国古代历法。

1904年朱执信十九岁时，考取北京大学预备班，并在广东省试的四十一名留日学生中名列第一。朱执信在东京时，和其他几个广东同学来往密切，他们成为反清革命活动中的同志友伴，其中有胡汉民、古应芬、李文范、汪精卫等人。当时，在日本的同伴们对他拒不剪去发辫不能理解，但在他此后的积极革命活动中，他的发辫使他减少不少麻烦，便于活动，同伴们因此称赞他的远见。

1905年朱执信作为原有团体的成员，参加了孙逸仙、黄兴组成的同盟会。同年年底，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出版，朱是该刊的经常撰稿人。他以笔名“蜚仲”在创刊号上写了一篇有声势的文章，题名《论满洲欲立宪而不能》，

申论在满清统治下中国决不可能出现一个立宪政府。他断言只有推翻满清政权，汉族才有机会实行真正的宪政。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的言论，是对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调的回击。

在早期《民报》上朱执信关于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加速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进程中的相互影响的论点得到人们的重视。1906年6月，他以笔名“县解”发表文章，题名《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着重说明实行社会革命时进行政治革命的必要性。这篇文章赞成孙逸仙的经济纲领，特别是中国实行土地国有，这篇文章驳斥了梁启超等人对孙中山政纲中的经济政策的批评。朱执信又是在中国最早用文字介绍《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的一人。1906年第二、三期《民报》上题为《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的文章中，朱执信称马克思为“科学社会主义者”，并译载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那时朱执信深信，较之别国的改革措施，中国革命者能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学到更多的东西。

1907年底，因日本当局的压制，同盟会的一大部分活动都告中断，许多会员回到中国大陆，从事秘密活动，以推翻满清统治。朱执信回到华南后在广州教书，他逐渐投身到筹划革命起义的实际工作之中。由于他留着发辫，穿着他父亲留下来的满清服装，因此能少引人注意。最早他参加了1908年12月起义，当时革命党人利用慈禧和光绪于当年11月去世的机会，争取广州军方势力，共同进袭广州的满清当局。但由于计划泄露，起义失败。

1908年的计划为1909年新的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1910年2月10日准备一次起义，事先指派新军军官倪映典鼓动士兵哗变，起义前夕，倪在朱执信家中彻夜商谈，作最后布置。第二天，倪所率部队进袭军械库，卤获军火，然后指向广州省城。但于2月12日，倪毙命，部属逃散，朱执信虽已准备了一支后援部队，但由于时机不适未能投入战斗。朱执信因为还留着发辫，得以避开满清政府官吏的注意。他经邹鲁的介绍，在两广语文学学校谋得了一个教席。

1911年4月，朱执信显露了他作为革命活动家的胆识，那时同盟会正在筹划着一次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这次广州起义的领导人是黄兴，朱执信协助黄兴计划起义行动和挑选突击人员。1911年4月27日，黄花岗起义爆发，黄兴、朱执信准备攻占总督衙门，在肉搏中朱胸部受伤。起义失败，朱从广州逃往香

港。起义虽然失败，但鼓舞了反满运动，终于导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成功。

武昌起义爆发后，朱执信在广州附近的民军中活动，劝说他们起而支持共和革命。民国成立后，朱充当以胡汉民为首的广东都督府的审计院院长。那时他才剪去辫子。

不久，袁世凯图谋夺取统治中国的军政大权，开始镇压共和革命者的活动。1913年底，二次革命被袁世凯击败，朱执信和一些革命党人流亡到日本。他在那里和孙逸仙及陈炯明、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等人共事，着手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于1914年6月成立。朱和胡汉民、戴季陶共同主编该党的新宣传机关刊物《民国杂志》。1913—1914年朱执信在日本流亡期间，和戴季陶结成莫逆之交，又和蒋介石相识为友。

孙逸仙派遣一部分部属回国组织反袁武装，朱执信、邓铿被派回原籍广东，劝说名为民军实为土匪的队伍起而反袁，袁世凯当时通过声名狼籍的龙济光在广东行使他的权力。朱执信在广东西南地区积极活动，1914年10月和11月组织过两次小规模起义，虽然他的非正规部队不能与龙济光的部队匹敌，但他善于巧妙地劝说和鼓动那些土匪队伍投向革命事业。

1915年12月，蔡锷率部由云南入四川，李烈钧袭击广东龙济光。朱执信趁机在1916年初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朱执信进占广州的战役为龙济光部队优势炮火所阻，他又对通往广州的珠江口的虎门要塞发动进攻。1916年6月，袁世凯在北京死去，南方的战争因此停息。

自1917年中到1918年中，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诸人是广州护法政府中孙逸仙的主要部属。朱执信、陈炯明、许崇智诸人被委派去训练一支可靠的广东部队，以便支持孙逸仙的军事地位。1918年3月，孙逸仙派朱执信去日本，谋取日本当局对护法运动的支持。1918年夏初，孙逸仙辞去广州政府的大元帅的职衔去上海。

朱执信随同孙逸仙到上海，他成为发展和宣传孙逸仙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一位主要人物，他决定脱离军界，专注于社会改革事业。1918年夏，他给蒋介石写信说：“弟现在观察中国的情况，认为非从思想上谋改革不可。故决心今

后将竭尽全力从事思想上之革新，不再涉足军界”。1919年8月，朱执信和戴季陶创办《建设杂志》，该刊许多文章阐明和论述国民党的思想。

朱执信在去世前的几年中在上海为《建设杂志》和其它刊物所写的文章，获得了全国赞誉。虽然朱执信素有古文的修养和善写文章，但他是陈独秀、胡适创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热诚支持者，他本人也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朱执信精通日语也能阅读英语，在他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发生兴趣后，他又开始学习俄语。

朱执信和国民党内的一些学者，就古代中国公社性质的井田制度问题，曾与胡适进行过热烈的学术性辩论。胡适怀疑这一制度的存在，而朱执信及其他孙逸仙周围的同人认为中国古代有过井田制。朱执信认为为了使中国现代化必须强调动员广大群众支持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而制定的社会、经济纲领，这一点具有极大的政治重要性。1920年朱执信去世后几年中，包括孙逸仙在内的国民党领袖人物，愈来愈觉察到中国广大群众的政治潜力。这一关键性的态度上的转变，乃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的必要条件。

朱执信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准备到美国去。早在1920年，一些留美的中国学生，曾向北京政府和各省地方当局上书，朱执信认为此举对军阀有利。朱执信认为中国学生留在美国并无益处，而且他当时又想更多了解俄国情况，因此，他准备去欧洲。但是华南的战局阻滞了他的行期。1920年6月，孙逸仙派朱执信去福建劝陈炯明回师广东，重建广州地区的立足点。朱执信和陈炯明一起袭击广州成功。当他们迫近广州时，朱执信奉命安排虎门要塞投降事宜。此举谈判虽获成功，但由于误会而引起冲突，朱执信在交战中身受重伤。于1920年9月20日去世，年三十六岁。

朱执信的意外死去，使孙逸仙及国民党的其他同志深为震惊。孙逸仙在陈炯明逐走广西军阀，南归广州时说过：“广西军阀虽已逐走，而执信牺牲，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他在写信给蒋介石时悼念道：“朱执信的突然死难，正如失去了我的左右手。而今党内谙熟军事或忠诚如朱执信的人，为数不多”。在另一个场合，孙逸仙向其同志们说过：“英士具有革命热诚和魄力，但殊少学识才艺。执信有英士的革命精神，而学识胜于英士”。

经汪精卫的努力，在广州设立了一所以朱执信命名的学校，表示纪念。起先，该校男女同校，后来改为女子初级中学，取名执信纪念中学，设在黄花岗陵园的对面。校园景物幽美，朱执信的遗孀曾任校长，汪精卫曾一度在该校教书。

《朱执信集》收集了他在《民报》、《建设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由汪精卫、邵元冲、戴季陶注释，这是朱执信的文章最为完备的集子。邵元冲编的《朱执信文存》收集的内容较少。

朱 经 农

朱经农（1887.8.14—1951.3.9），教育家，中国公学、光华大学的创始人、校长。他是一个教育改革家，为商务印书馆编辑过一套重要的教科书。在国民政府中曾任教育部次长，1932—1942年任湖南督学时，在湖南创立了一套良好的教育制度。1948年后，留居在美国。

朱经农原籍江苏宝山，但出生在浙江浦江。他的祖父是一位学者，在湖南教书，他的父亲朱启叔（字仁甫）做过浦江县令。朱经农兄弟三人，姐妹一人，朱经农行二。他父亲调到石门后，于1894年去世。朱经农的母亲田氏返回宝山，辛苦经营抚养儿女。1897年他母亲带了全家去依从她的夫兄朱启毅，那时他在湖南做官。

朱启毅是知名学者，在湖南好多地方做过县令，在该省培养了不少有学问的人。朱经农到湖南时，湖南正好是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朱经农的姑丈熊希龄在湖南。朱启毅、熊希龄在维新运动中很活跃。熊希龄组织了南学会，朱经农常到那里去听青年名学者演讲，如黄公度、欧阳竞无、熊希龄等人。1898年由于清政府严厉镇压，处决了几个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百日维新就此告终。

朱启毅、熊希龄得以幸存，1902年朱启毅在常德创办了一所中等学堂，自任校长。朱经农进了那所学校一年级读书，在那里他结识了覃振，开始读到一些反满报刊，对革命运动产生了同情。

1904年夏，朱启毅决定送朱经农去日本深造，先在巢鸭的宏文学校学日文，1905年转入成城学校。当时孙逸仙到东京组织同盟会，朱经农经至友孔廉伯引荐加入了同盟会。

1905年冬，日本政府用法令排斥中国留学生。朱经农和不少学生离日本回到上海，办起了一所中国公学。因为缺乏数理教师，不得不聘用日本教师，朱经农充任翻译，以支付自己的教育费用。他在中国公学同班同学中，有不少人以后成为知名的教育家，例如胡适、任鸿隽等人。中国公学是反满活动的中心，清政府当局对该校严加注意。1908年地方总督企图把它改为政府的公立学校，为此学生退学，另行创办新中国公学，选朱经农等三人为董事，一年之内，新中国公学办得很成功。但由于经费困难，新中国公学解散，学生又回到中国公学。1910年，朱启毅去世，朱经农回到湖南，在高等实业学堂教英文，以维持家庭生计。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朱经农参与湖南脱离清廷统治的独立。1912年应宋教仁、覃振邀请，去北京主编共和革命派机关报《民主报》，以后又担任《亚东新闻》的主编。1913年夏，所谓二次革命爆发后，两报被警方勒令停办，并下令逮捕朱经农，朱逃往天津，幸由内阁总理熊希龄的保护，得以返回北京，在农商部做事，当时该部总长是张謇。1915年底，因袁世凯阴谋称帝，朱经农离开了北京，经朋友们的资助去美国。

1916年到1919年间，朱经农一边在华盛顿大学读书，一边在中国使馆兼职。他在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继续攻读，于1919年获得文学硕士的学位。1920年他得到江苏省政府的官费，乃辞去使馆兼职，到纽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他在美国时，与中国青年学者如胡适、杨铨、任鸿隽等人又恢复了来往，因此参加了导致中国文学革命的知识界的活动。朱经农在美国时成了基督教徒，虽然他皈依基督教的确切日期无从断定，但是他此后毕生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1920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他回国，在北京大学教教育学，他在北京大学任教两年。1923年，政府当局决定对中国教育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为了实施新课程，中、小学校需要有一套教科书以及手册工具书。商务印书

馆请朱经农去上海主编这一套教材。这套教材对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和训练有着重大的影响，而对商务印书馆来说，则由此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

正在这一期间，晏阳初着手开展所谓平民教育运动，希望在中国农村普及文化，朱经农予以热情支持，为之编写了第一套教材《平民千字课》，他又为上海的历史最久又最著名的日报《申报》编辑专栏，提倡乡村教育。1924年秋，他担任上海大学的文科主任。

1925年5月30日事件发生后，6月3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集体退学，他们决定创立一所新大学，这一主张在上海得到广泛支持，推定朱经农为光华大学的教务长，他在几周内就拟出了学校计划。1925年秋，这所新大学开学，师生热心支持的光华大学，在学术水平上很快就与圣约翰大学并驾齐驱。这一期间，朱经农与商务印书馆继续保持关系并在大夏大学夜校教书。

1926年，朱经农去广州和国民党中央当局接触。他回上海后，与吴稚晖、杨铨等人秘密为国民党工作。正当北伐军进军之际，上海地方当局对被怀疑是国民党的秘密工作人员的人未加审判即处以死刑。而朱经农未被发觉，继续留在上海工作。1927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任黄郛为市长，黄任朱经农为督学，朱提出了中小学教育的改革方案。

1928年蔡元培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任朱经农为普通教育司长，负责筹划和督导全国的中小学教育。1928年冬，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任部长，朱经农仍任原职，1930年朱升任教育部次长。将年年底，蒋梦麟辞去教育部的职务，朱经农亦离去。

朱经农去上海任中国公学代校长，那时因校长邵力子不在。1931年6月他被任命为山东济南齐鲁大学校长。

1932年9月，他暂离齐鲁大学去湖南当督学，那是他三十年前上学受教的故地。一年后他辞去齐鲁大学校长之职，他在湖南逗留了十多年，虽有战争引起的种种困难，但他使湖南省的教育工作达到了令人注目的很高水平。1943年在他离开湖南的时候，在湖南平均达到每一百户有一所四年制小学，每县有一所六年制完全小学。在湖南1932年有中等学校约一百所，而1943年增加为二百五十多所，并作了极大努力，以提高教学质量。朱经农使湖南大学的教学质量

提高，1937年7月湖南大学被列为国立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帮助由于日本侵略撤离华北的北大、清华、南开的师生在长沙成立一所临时大学，长沙湘雅医学院几乎全部被毁，朱经农帮助该校重建，并使之成为国立学院。1941年朱经农在衡山筹设了农、工、商三所省立专科学校。

1943年2月，朱经农在战时首都重庆任中央大学副校长，中央大学是中国政府的最高学府。正校长是一荣誉职位，由国民政府主席担任，校政实际由副校长主持。1944年3月，朱经农为教育部政务次长，1945年5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以后又选为常务委员。

1945年日本投降后，朱经农负责将教育部由重庆迁往南京的事宜。1946年10月，他辞去政府职位，继王云五而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又兼任光华大学校长。1946年11月，他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选入主席团。1948年3月，他出席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新宪法。

1948年11月，他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出席在黎巴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次会议。回中国途中，他访问了美国。上海由共产党控制时，朱经农还在美国。因为他不愿和共产党合作，所以辞去了商务印书馆和光华大学的职务，留在美国着手写中国教育思想史。1950年去哈德福神学院任职，1951年8月9日因心脏病死于神学院他的卧室。他遗有妻子杨清珊（音）、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长子朱文长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在耶鲁大学和匹茨堡大学教书。

朱经农写作和编撰了很多教科书、书籍，以及有关教育和教育理论的文章。他主编的《教育大全书》于1930年出版，他所著的《近代教育思潮》于1941年出版，1942年出版了一册他的有关教育哲学的著作。他翻译了杜威的《明日之学校》。所有这些重要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朱经农曾为陈衡哲主编的《中国文化论丛》写稿，他的最后一篇用英文写的论文是有关儒家传统的文章，收集在1951年伦敦出版的《教育年鉴》中。朱经农有关教学法和学校课程的论文，大都发表在1923—1925年间的《教育杂志》上，和1924—1926年间的《教育与人生》上。他的诗集《爰小庐诗抄》于1965年在台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集子还附有朱经农著作的全部目录，以及有关他的社会活动生涯的传

记性材料。

朱 希 祖 字：遜 先

朱希祖（1879—1944.7.5），历史学家，先后在北京大学（1913—1926年、1928—1930年）、中山大学（1931—1933年）、中央大学（1934—1944年）教书。1939年后，任国史馆行政秘书。

朱希祖的幼年生活不详。他是浙江海盐人，早年读了一些中国典籍后，1905年获得浙江省公费去日本留学。他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史地，并从同乡章炳麟学音韵学，章炳麟是《民报》主编，他们两人结成了莫逆之交。

1911年辛亥革命后，朱希祖为海盐县长，但就任不久即辞去到浙江省教育厅任事。1913年他去北京参加国语口语规范化会议，他在会议上提议使用拼音的方法作为达到语言统一的第一步骤，这是章炳麟早就提出过的设想。这次会议后，朱希祖受聘在北大教书，不久就当了中文系主任。自章炳麟被袁世凯就地软禁后，章炳麟的学生中个别几个人仍经常探望章，朱希祖就是其中的一位。朱希祖曾在赵尔巽领衔的清史馆工作，因赵尔巽亲袁世凯，他愤而辞职。

1926年张作霖进占北京自称总司令，干预学术界活动，因此，朱希祖离去了他在北京大学的教职。当时清华和辅仁受政局牵连较少，他便去清华和辅仁两校教书。但朱希祖仍为北大从故宫购得不少档案资料。他主张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必须具有近代社会科学理论的丰富知识。他和胡适合作，推广白话文运动。1928年张作霖被逐走后，他又回到北大，1930年成为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1931年他离开北方，去广州中山大学教书，在那里他为了研究1644年后的明史收集资料。1934年他到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同时，他兼任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遍访南京、安阳等地的古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发表了一篇《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在三十年代，他在南京教书时，每月都到苏州去听章炳麟讲学。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朱希祖随国立中央大学迁往重庆。他的活动不仅限于课堂教学。1938年他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递了一份长篇的意见书，是关于

统一高等学校课程标准的问题的。1939年他协助张继为成立总档案库和国史馆拟订方案。政府当局接受了这一建议后，张继任命为国史馆长，朱希祖为行政秘书。1944年夏，朱希祖在重庆去世。

朱希祖所写的中国历史著作中，常常充满着民族爱国的感情，他在抗战期间意在揭露傀儡政权的著作，就是属于这一类型。例如：《伪楚录辑补》、《伪齐录校补》、《伪齐国志长编》。他在抗战前的著作，有：《战国史年表》、《汲冢书考》。有关书志的著作中有：《杨么史辑考证》、《晚明史辑考》、《邨亭藏书题记》、《新梁书艺文志》。1944年出版了他的《中国史学通论》，这是他1919年在北大的讲稿的修订本。

朱希祖有四个儿子。长子朱珪（1907年生），1932年在柏林大学获得经济博士学位，他回国后曾担任政府的多种职务，后任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朱希祖的女儿朱琰（1910年生），是一位晚明史学家，和史学教授罗香林（1905年生）结婚。

朱 湘 字：子 沅

朱湘（1904—1933.12.5），诗人，以擅长用中国传统的和西方的多种形式创作新诗而著名。

朱湘生在安徽太湖，兄弟姐妹十二人，他是兄弟五人中最幼者，他幼年时父母双亡，由长兄抚养成人，其长兄把他视为累赘，因此他在童年时颇受虐待。他六岁从塾师读书，他虽非才华出众，但在十一岁时已通读中国古籍，并能提笔作文。当时科举已废，他的长兄让他停学古籍，进新办学校，此后，他的学习变动很多，一度进职业学校学工程技术，以及进夜校学英语。1922年他十八岁时进清华学堂。

朱湘年幼时即酷爱文学，喜读小说，尤其爱读历史小说以及斯考脱和斯蒂文逊的中译作品。他遍读中国小说，认为红楼梦是中国所有小说中的杰作。他十八岁时，不再阅读小说，而潜心阅读诗集。朱湘进清华时，正值新文学运动高潮，他被这一运动所吸引，加入了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的行列

他们认为为诗歌需要有新形式和新格律才能充分表达民国时代的新精神。朱湘的早期作品在《文艺杂志》、《小说月报》、《晨报》副刊上发表，1925年出版的二十五首诗集《夏天》是他的第一部诗集，有闻一多的编者的话。其中的诗歌短者仅两行，长者达五十二行。其诗精心雕琢，是他的特有风格。他在自序中说，诗集命名《夏天》是表示作为艺术生涯青春期已过，入了成人期的意思。1926年，朱湘和闻、徐等新月派诗人出版了《诗镌》周刊，在闻一多家中定期会面，编辑此刊。此刊仅出了两个月（4月、5月），但因诗篇作者的才华高超，所以影响很大。1927年，朱湘出版第二本诗集《草莽集》很受欢迎。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九百行的《王娇》，叙述一美女被逼嫁给一粗卤国王的古代传说。《草莽集》奠定了朱湘作为诗人的声誉。近代的评论，把他与徐志摩、闻一多、郭沫若等同样作为第一流的白话诗作家。

1928年，他在清华毕业后，同许多北京学生一样去外国留学。进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的劳伦斯学院学西方文学，后又转入芝加哥大学学习法文和德文，特别是德国小说。那时，他翻译了一些中国诗篇，刊登在学生办的文学杂志《凤凰》上。他还翻译了《今古奇观》，这是一部收集了十七世纪以来的四十篇白话故事的集子。他在美国时，常与美国教师发生冲突，他认为有些美国教师以种族歧视的态度对待他。他常常用“斗智”的方法对付这种教师，严厉地揭露他们的错误和无知。

1930年秋至1932年夏，朱湘任在安庆的安徽大学西语系主任。他生性孤僻，但他在学生中颇有声望，他常因一些琐事或全属猜疑之见和学校当局发生争吵，结果是被迫辞职。由于此次经历，他不愿再以执教为职业。此后，他经常依靠朋友的资助维持他和他一家的生计。他曾试图出版新的作品，但未能如愿以偿，他甚至谋求获得推荐书以解脱困境，但也落空。朱湘的教员、文人生涯落到如此地步，加以精神上经常处于受害之感，于1933年12月4日夜，从一艘长江航船上投水自杀。他的遗作晚期诗集《石门集》以及和文艺评论集《中书集》于1934年出版，他的妻子李霓君也在1934年出版了《海外寄霓君》一书，这是朱湘在美国时寄给他妻子的书信的集子。1936年又出版了他的第二卷散文《永言集》。

朱湘的诗以纤巧知名，他吸收了中西各种传统形式来写白话诗。他的早期杰作《王娇》是很成功的尝试，他使诗歌承袭了大众化的小调，特别是“弹词”，这种有韵的道白包括了说白和歌咏两部分。朱湘轻视传统的固定的韵律，探索不规则的民谣节奏，使诗歌的格调多样化而又流畅。但他同时重视诗的押韵和具有音乐的节奏，使其所作的诗篇精炼有力。他独树一帜地主张不拘形式的“自由诗”，他甚至对闻一多和徐志摩的诗作结构冗长和措词不切感到非常不满。朱湘曾花了大量时间，想把雪莱的诗歌按其原来的韵律译成中文诗。他后期的诗作、短小抒情诗，充分反映了受中国和西方诗歌的短小行节和简明措词的技巧和特色的影响。他和现实世界愈离愈远，这在他的诗歌中反映出来，他的诗歌越来越多的主题是冬季、雨天、离别、孤独和死亡。他二十九岁就结束了悲惨的生涯，但他的诗歌和评论却留下了影响。

朱学范 字：屏安

朱学范(1901.10.5—)，劳工领袖。1928年曾任国民党组织的总工会主席，以后又是中国劳工联合会负责人，他经常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劳工会议。1948年初，他开始和中国共产党合作，1949年在北京任邮电部长。

朱学范出生在上海，兄弟七人中年龄最小。他原籍浙江嘉善，三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他那在上海开一家小杂货店的父亲去世。朱学范虽然父母双亡，还能在他长兄朱学谟的扶持下继续上学。他进了上海圣方济学院学英语，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外商公司当职员。

1923年，朱学范参加了中国官办邮政的考试，因为考试成绩优秀，派在上海当初级邮局职员。他同时又在上海法学院夜校上学，是著名律师沈钧儒的学生。

1926年，朱学范升为二等邮政官员，他和同事又是法政学院夜校的同学陆京士(1908—)把邮政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上海邮务工会，朱学范任总干事。1927年，他们将此工会扩大为全国邮务总工会，陆京士任主任。

在组织邮务工会的时候，朱学范和陆京士最早得到国民党的鼓励，因为国

国民党在北伐进军中，希望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帮助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此时，朱学范加入了秘密会党青帮，青帮在1927年春夏之际协助蒋介石夺占上海，朱学范和上海邮政局的另七个密友称为“八拜兄弟”，他们都成为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门徒。由于杜月笙的活动，1928年朱学范成了国民党支持的上海总工会主席，以后他又组织全国总工会，当了第一任主席。朱学范又组织了“毅社”，这是一个中国秘密会党和西方式俱乐部的成员揉合一起的组织，其成员大都是邮务员、城镇工人和小商人。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个组织成为朱学范的得力集团，使他在劳工界的影响扩大加强。

由于朱学范的地位日益提高，以及全国总工会是一不受共产党控制的主要劳工组织，因此他在1936—1938年间，多次代表中国工人出国，去日内瓦参加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他还到过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考察劳工情况，并与那里的劳工组织和领导人建立了直接联系。在领导全国邮务总工会和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中，朱学范和陆京士一直密切合作。1937年日本进攻上海后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朱、陆两人领导特工队，阻止日军的入侵。日军全部占领上海后，朱学范乘法国轮船去香港。他又从香港到汉口，后又去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

1940年春，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派朱学范、杜康去浙江宁波组织特训班，专事训练拟向上海遣送的秘密特工人员。当年冬天，朱学范完成了这一任务后回重庆。不久又被派去香港领导那里的中国当局的秘密工作。由于朱学范在这些工作上的成绩，吴开先推荐他在重庆国民政府立法院中占得一席。

1939年朱学范去美国，与美国劳工领袖商谈，1941年11月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国际劳工协会特别会议，他被选入该组织的理事部。他第二次在美国逗留期间，1942年春在哈佛法律学院选习劳工法这一课程。接着他被派往伦敦联合海洋委员会的中国代表。1942年底，他回国组织中国劳工福利会。从1942年至1946年，他担任美国援华劳工基金托管理事会理事长，并任国民政府社会部顾问。

1944年，朱学范又去美国，出席在费城召开的国际劳工协会大会。翌年，去英国参加该会理事部会议。他留在欧洲参加组织世界工联的筹备会议。1945

年9、10月间，他和共产党区域的劳工代表邓发代表中国去巴黎参加世界工联大会，两人都被选为执行委员，同年晚些时候，朱学范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

中日战争后期，朱学范在重庆，他感到国民党统治是压迫性的，而日渐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他的政治观点受他在上海政法学院的老师沈钧儒，和一度是共产党员、并任中国劳工协会秘书的易礼容的影响。他对国民党的不满与日俱增，因为国民党在重庆的秘密警察残暴地殴打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其中很多是中国劳工协会的成员。结果，国民党不满意朱学范对协会的领导工作。日本投降后，当他回到上海时，要他公开声明反共，以示效忠于国民党。朱学范拒绝后逃到香港。此后，他曾数度秘密回上海。

1947年他在香港坐人力车被卡车撞伤，这也许是一件偶然事件，但使他更加怀疑国民党保安当局已对他监视，而他的生命已处于危险的境地，所以他伤愈从医院出来后就到瑞士去了。1948年初，他回远东，去到北满，那时这一地区已在共产党控制下。他在哈尔滨发表声明，决心和共产党合作，在中国建立一新政府。

1948年8月，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朱学范是被选入该组织领导岗位人员中的非共产党员。他列名于陈云、李立三之后，被选为副主席。1948年他秘密回香港，和李济深、李德全等人合作，组织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反对派组成的团体，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朱学范被选为该会中央委员和组织部长。之后，他去华北任共产党领导组织的全国邮电工会筹备会主席，该工会成立后，他任该工会全国委员。

1949年9月，朱学范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之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任朱学范为第一任邮电部长。此外，他仍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担任高级职务。1953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朱学范担任了副主席的职务。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期间，朱学范多次出席在布拉格、华沙、柏林、索非亚、来比锡以及其它城市召开的世界工联的会议。1958年，他率领邮电部代表团去苏联访问。他是出

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东省代表。

朱学范大约在1924年和浙江宁波的一个商人家庭的女儿华某结婚，生有四子、一女。

竺可桢 字：藕舫

竺可桢（1890—），气象学家，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国气象学会会长，1949年后在北京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他在绍兴家乡完成初等教育的学业后，在上海受中等教育。1910年他在直隶省上唐山工学院时，获得庚款奖学金去美国留学。

1913年，他在伊里诺斯州大学获得科学学士学位后，又进哈佛大学研究院，于1915年获硕士学位，1917年获伊墨生奖学金，撰写《远东台风的新划分》论文，于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的这篇论文，后来在1924年和1925年华盛顿出版的《气候评论月报》上分为两部分摘要发表。他在美国时还发表了他的另一些早期写的专业论文，例如：1916年的《气候评论月报》上发表《中国雨量之分布》、1918年的《地理评论》上发表了《中国在气象学上的一些贡献》。1917年他当选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竺可桢在美国时，是中国科学社的积极分子，这是一个由中国留美学生在1914年成立的旨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和促进科学研究的组织，这个组织中的积极分子还有赵元任、任鸿隽、杨铨等人，这一组织在以后的岁月中为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了不少工作。

1918年竺可桢回到中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气象学和自然地理。1921年他到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书，任地理系主任。他的一篇有关1905—1921年南京气候状况的论文在1922年发表。1924年他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部史地组主任。他着手主持的汤姆逊所著《科学大纲》的中文译本，1923年在上海出版。竺可桢一篇重要论文《历代中国气候的波动变化》在1926年纽约的《地理评论》上发表。同年，竺可桢代表中国出席在东京召开的太平洋科学大会第三届全会，他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华东气候型类的初步研究》。

1927年，竺可桢又重回学术生活，任国立中央大学地质系主任，该校前身

即东南大学。他还担任了南京国家气象台台长。中央研究院成立了气象研究所后，他又任该所所长，一直到1949年。1928年，竺可桢任中国气象学会会长，他还担任中国科学社理事、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成员。1928—1936年间，竺可桢发表了几篇有关中国气象的专业论文。他出席了1929年在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召开的太平洋科学大会第四届全会，以及1932年在英属哥伦比亚的温哥华召开的第五届全会，1933年去美国访问。

1936年竺可桢任杭州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37年杭州为日军占领，竺可桢随浙江大学迁往浙江的建德，而后江西、广西，最后到达贵州遵义，自1938年至1946年他一直耽在遵义。不管战时的艰难，浙江大学在竺可桢主持下，一直保持了西部中国高等教育中优秀学府之一的声誉。竺可桢早期的科学著作，在对日作战中间接地起了作用。他在1932年所写的有关中国大气环流的论文，1944年由设在华盛顿的美国空军气象局重印。

日本投降后，他和浙江大学一起回迁杭州。气象对人类活动是息息相关的，竺可桢有关这方面的长期研究成果，汇编在巨著《中国的气温》一书中，1947年在南京出版。1947年他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访问美国。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他被选为属于左派的全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主席，由此可见他的政治态度的倾向性。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竺可桢和许多知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参加了这一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竺可桢虽已年近六十，却在北京开始了担任高级科学负责人的第二度经历。当国民政府在1949年底逃往台湾时，中央研究院只有小部分设备和少数人员撤到台湾。中国共产党当局立即着手重组科学研究机构，在1949年秋成立中国科学院，成为北京新政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郭沫若任院长，陈伯达任第一副院长，竺可桢也被任命为副院长，名次排在陈伯达之后。竺可桢是在北京的高级职业科学家，他对1949年后的全国研究规划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这个部门统辖二十多个研究机构，包括在北京的地球物理研究所、气象研究所等。他主持规模宏大的科学考察规划委员会，特别是有关黄河中游的水力资料和水土保持的考察，以及南山和昆仑山之间的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考察。

竺可桢这位高级科学家，还参加了其他一些新成立的为促进科学和科学知识的全国性机构的活动。1951年到1958年，他是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1953年到1958年任中华全国科学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这两个团体，在1958年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竺可桢当选为该协会副主席。他担任中国气象学会会长至1960年，那时他年已七十岁。1956年时他曾任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全国委员会主席，后来中国虽然退出了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活动，但是中国科学家们仍然进行了中国全国委员会所规划的科研项目。

1954年和1959年，竺可桢两次当选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浙江省代表，他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科学工作的重要报告。竺可桢除了在北京工作外，于1953年和1956年访问苏联，1954年访问东德和波兰。1958年任中德友好协会主席。

竺可桢的第一位夫人张侠魂，他们于1919年结婚，有三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在1938年去世。1940年，他又和陈汲结婚，他们至少生有一个孩子。

朱 培 德 字：益 之

朱培德（1888.10.29—1937.2.17），国民革命军军官，1926—1927年北伐时任第三军军长，1927—1929年任江西省主席。后来，历任军事委员会的参谋总长、军训总监和办公厅主任。

朱培德出生于云南盐兴，五岁时，他祖母带他去安宁上学，七岁时他的父亲去世，就由他祖母抚养。

他十八岁时进昆明一所陆军营部武备学校，1910年云南武备学堂设立，将该军校合并。朱培德在武备学堂受到反满报刊和1911年春在那里当教官的蔡锷所进行的军事教育的影响。1911年10月，蔡锷率领他的三十七旅在云南举行反满起义成功，朱培德当即离开武备学堂，当了革命军军官，驻在腾冲地区，以后又统率驻在滇西大理的一支军队。几个月后，他又回到云南武备学堂，1914年毕业，学业成绩列为全班第一。

他在云南新编第三步兵团任职，他在平定该地区苗族动乱的战斗中担任过

连长和营长，指挥战斗获胜，他的部属很多死于疟疾，他自己得以幸免。1915年冬云南督军唐继尧和蔡锷组成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在北京称帝的阴谋。朱培德立即投身第二军，担任队长，该军由他从前在武备学堂的教官李烈钧任军长。在1916年最初几个月中，第二军向广西进军时，朱培德升任二十五团团长。1916年夏袁世凯死后，李烈钧被解除司令职务，他的部队改称为驻粤滇军。朱培德担任第七混成旅旅长。

孙逸仙当时力求在南方巩固势力，朱培德亦参预其事。1917年他在广东南部的军事行动获得好评，因此升任驻滇粤军第四师师长，并任广州警备司令。1918年春，驻粤滇军的控制权落在李根源手中。李根源是云南人，他在1911年革命时，在云南起过显著作用。1918年孙逸仙在广州失势去上海，但朱培德仍留守广州，而广东地方当局准备袭取驻粤滇军的控制权。1919年冬，朱培德和著名的军事战略学家杨杰的妻妹赵慧君结婚，许多知名人士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有人向朱培德建议，趁李根源及其随从参加婚礼时，将他们拘捕，夺取他们的权力。朱培德拒绝了 this 建议。

1920年2月，唐继尧在云南下令撤消李根源对驻粤滇军的指挥权，准备由他自己直接指挥，以在广州的参谋长李烈钧为他的代表。李根源本人拒绝此项命令，却将李烈钧的亲信朱培德等人免职。朱培德携眷去香港，1920年8月，参预李烈钧夺取李根源权力的活动，结果失败，朱培德和李烈钧失去了联系，率领第四师退到湘南。

1920年6月，朱培德和谭延闿合作，逐走直系北洋军人张敬尧。接着，唐继尧下令朱部，趁川滇两军在四川开战的时候进入四川。1920年10月，朱培德到达重庆。当时，滇军已在叙府、泸县战败，李烈钧与增援部队交战失利，退入贵州，重庆被围，朱培德辞去司令职务到了上海。

南方的战局仍需朱培德效力，孙逸仙邀他返回广州参加讨伐桂军之役，唐继尧则希望他回云南，而李烈钧也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朱培德决定去贵州李烈钧那里。

1921年5月，孙逸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为了着手北伐，准备先清除陆荣廷在广西的势力。朱培德、谷正伦、杨希闵分别率领滇军、黔军，并与

许崇智率领的粤军合力，在8月占领了桂林，此役一举而获胜。

1921年2月，唐继尧在云南失势，下令在广西的滇军（由杨希闵指挥）回云南。唐的命令遭到拒绝，孙逸仙任命朱培德为滇军司令。接着发生了利害冲突，朱决定让由川入桂的滇军自行选择：或回云南、或随他一起。他将遗留部队重编为三个混成旅，决心为国民革命效力。

孙逸仙提议由广西向云南进军，陈炯明反对此举，但孙逸仙已在桂林建立司令部，准备按计划行动。因陈炯明接二连三的反反对，1922年春准备进军湖南的计划未能实行。1922年4月，准备北伐的军队随孙逸仙返回广东，其中包括朱培德率领的部队，这些部队进驻韶关，准备向江西进军。5月中旬开始进军，朱培德部参加了1922年6月13日夺取江西南部的赣州的战斗。

当时，孙逸仙已回广州处理因陈炯明反对而引起的政局危机。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政变，孙逸仙召集部队拟夺回广州，但被陈炯明部在韶关击败，溃散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许崇智、李福林率领退到福建边境，一部分由朱培德率领强行退到湖南南部后，又回到广西，在桂林重新立足。

1923年1月，陈炯明被逐出广州，2月，孙逸仙又回到广州，下令朱培德率部回广州。朱部改组为孙逸仙大本营的警卫部队，朱任广州军政府陆军代部长、警备司令、大本营副官。1923年10月，朱部为守卫广州阻击陈炯明的新的进袭，起先，陈炯明取胜，广州军撤到石龙。朱培德本人拉着他的战马的尾巴泅过了河。他重集失散的部队，建立新的防御态势，然后向陈炯明部侧翼发起进攻，击溃陈部。朱培德的军事行动对保卫广州这个基地起了重要作用，他个人的声誉与之俱增。1924年广州的军事系统重组时，授予他建国军第一军军长之职。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朱培德任政府会议委员和军需部长，又在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任后卫指挥，这次终于逐走了陈炯明，而巩固了国民革命军在广东的控制。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培德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朱培德担任中央执委一直到他逝世。

1926年夏，北伐进军，朱培德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9月，他率领滇

军进入孙传芳控制下的江西省，经激烈战斗后，国民革命军夺取了江西省，朱培德指挥右翼军进攻江西省会南昌，1926年11月，攻占南昌，朱培德负责警备该地区，并当选为设在南昌的政治会议的委员，负责统管全省。

1927年国民党左派和右派间在长江流域一带日益尖锐的斗争中，朱培德处于关键的地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其司令部。当时和国民党联合的共产党，在1926年冬天，在江西农民中扩大其政治影响。1927年1月，朱培德任第三军军长时，他在云南武备学堂的前辈、早期在云南当过下级军官的朱德来访问他。朱培德接受朱德的效力并采纳他的建议，设立军官教导团，由朱德领导。1月底开始训练约一千名干部，1927年3月，训练团的毕业生被派到江西农民中开展工作。

武汉政府任命朱培德继李烈钧任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于1927年4月5日正式就任，同一天，他委朱德为南昌公安局长。不久，蒋介石和武汉政府分裂，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反对政府。刚从欧洲回国的汪精卫到了武汉，由于朱培德和汪精卫有私交，所以仍受武汉的领导。在安徽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准备率部进入江西，朱培德在1921—1922年间，曾一度指挥过李宗仁的第七军的人员，因此朱被视为李的上司，按照中国的礼俗，李请朱会面磋商。这两个将军于1927年5月14日到15日，在湖口会面，达成临时协议，宣布江西暂定为中立地区。

蒋介石和武汉当局破裂后，武汉政府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趋于紧张。5月，朱培德在江西也采取行动对付共产党，6月初，他颁布戒严令，解散工会和农会，迫使他们停止活动，逮捕和驱逐主要的政治工作人员。但他仍支持武汉的国民党当局，7月，他和张发奎、程潜在九江准备向京进军。

共产党人则准备了自己的独立行动计划，1927年8月1日抢先行动，举行南昌起义。贺龙、叶挺统率部队，得到朱德部队的帮助，包围了朱培德不及带走的两个团，解除了武装并占领了南昌。但是共产党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几天之后被迫撤出南昌。朱培德在赣南主要路上的要害地段设有重兵，共产党的军队只能从赣东的山区行进，而朱培德以其第三军的兵力在大庾岭地区拦截

朱德的部队，并加以重创。贺龙、叶挺转向夺取汕头以威胁广州，但是共产党部队的力量已大为削弱。

1927年末国民党内敌对派别终于达成和解，朱培德在这个复杂的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朱培德继续担任江西省主席。蒋介石拟定了继续北伐的计划，以推翻北京政府。国民革命军新增部队很多，例如有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军队，所以在3月间北伐军改编为集团军。朱培德任后备队总指挥。1928年5月和日军发生济南事件后，蒋介石随即回南京，任朱培德为第一集团军总指挥，该集团军绕过济南直取鲁北的德州，完成了北伐军最后向北京的进军。在此同时，共产党的余部由朱德、毛泽东领导，集结在赣西井冈山。1928年11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命朱培德在赣湘一带剿共。1929年1月1日，南京方面将其指挥权移交给何键了。

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培德再次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任常委。朱培德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主要是广东的国民党元老汪精卫、胡汉民和广西的军人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所以当蒋介石着手巩固他在南京的地位时，朱培德的权势也就很快衰落。从此黄埔系与来自浙江的军官相结合，成为统治的军事集团。

1929年8月，朱培德辞去江西省政府主席职务，9月，任命他为参谋总长。1929—1931年间，他是政府会议的委员。众所周知，朱培德和谭延闿一样，力图调解著名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冲突。但是由于汪精卫参加了1930年的北方反蒋联盟，促使朱培德在南京的地位进一步降低。1931年8月，国民政府改组最高军事机构，蒋介石亲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参谋总长，朱培德降为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1931年9月，日军占领满洲后，准备征服全部大陆。12月，南京方面进行政府改组，蒋介石让出一些出头露面的职务，朱培德重任参谋总长。为时不久，1932年3月蒋介石又上台，朱培德交卸了他的职务，由蒋介石重新就任参谋总长。1932年朱培德仍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1933年3月，何应钦就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去华北，蒋介石任朱培德为军政部长，朱培德未就职。1933年底，任军事训练总监。1934年12月军事

机构再次改组，朱任代参谋总长，但那也不过是代表蒋介石出席省里举行的军事检阅，或其它类似的礼仪性的活动。他主要的职务还是领导军委办公厅，他还担任军纪委员会和南京中山陵管理委员会的工作。1936年秋，他在国民政府当局和李宗仁、白崇禧之间，作政治调停人，使桂系军事势力和南京方面合作，在外敌日军的威胁之下，促成了中国国内团结。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五个月，朱培德在南京突然去世，因注射抗贫血药剂引起血液中毒致死。

他有遗妻和两个儿子，朱维梁和朱维新，他们后来都到美国去了。

朱 绍 良 字：一 民

朱绍良（1890—1963.12.25），军官，他协助国民党和盛世才谈判，促使俄国势力撤出新疆省，从而使国民党控制了该省。1938—1940年朱绍良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1933—1935年和1938—1940年任甘肃省主席，1948—1949年任福建省主席。

他原籍江苏武进（常州），出生在福建福州，他父亲在那里当官。早年时，他在福建初级武备学校、南京陆军中等学校上学。1910年在南京毕业后，被政府选送日本留学、学习军事。

1910年，他在东京进成城学校，不久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到中国，参加了武昌一带的起义，接着在上海共和革命督军陈其美司令部工作。1913年他参加了推翻袁世凯的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后避居日本，在日本陆军十四野炮营实习，准备进士官学校。1914年他进士官学校在十一班炮科学习，该班另有三名中国学生：贺耀祖、何应钦、谷正伦。

朱绍良于1916年毕业后回中国，投身贵州王文华的第一师，后升为团长、师参谋。1917年王文华为贵州靖国军总司令，朱绍良为参谋长。唐继尧指挥下的黔滇联军驻在四川时，朱绍良任重庆警备司令。1920年王文华被刺身死，黔滇联军被逐出四川。

他一度在上海无所作为，然后去广州在孙逸仙大本营任参谋。1926年北

伐进军时，朱绍良任陈铭枢的第四军十师参谋长。国民革命军到华中后，内部纷争，朱绍良站在蒋介石这一边。1928年，国民革命军征伐北京胜利完成后，朱绍良当了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务局局长。1928年晚些时候他接受了统帅第八师的任务。

1929年，在与广西军阀的战斗中，蒋介石派朱绍良、贺耀组巩固湖北西部的控制。桂军撤出华中地区，向南袭击广东。1929年9月，朱绍良去南方前线，指挥他的第八师和第三师。不久又回到华中，因为蒋介石的政权在河南受到新的威胁。1930年，为对付北方冯玉祥、阎锡山的联盟，发生内战，朱绍良在陇海路前线作战。1931年对北方军阀的内战结束后，朱绍良被任命为江西绥靖主任，那时，江西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根据地。对付共产党的战争进行很不得力，所以，朱绍良于1932年被解职，他去上海。同年后期，朱绍良被召回，受命指挥部队进攻湘、鄂、赣边区的共产党人。

1933年7月，朱绍良为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绥靖主任。同年，他还兼任甘肃省主席的职务。1935年于学忠继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但是西北的军事实权，仍由朱绍良掌握，他指挥国民军和向西北进迫的共产党军队作战。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绍良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拘留时，朱绍良是陪随蒋介石一起的国民党军官之一。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免去于学忠甘肃省主席职务，由朱绍良继任，但他未就任而去上海暂居。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朱绍良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以及驻上海中央军第九路军总指挥。国民党军在上海被日军击败后，朱绍良调往西北，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设司令部于兰州，1938—1940年他兼任甘肃省主席，接着他的省政府主席的职务由他在日本时的同学谷正伦接替，他自己专掌军权。

朱绍良是兰州的国民党最高军事要员，他在政治上为国民党作出的重要贡献是把国民党的势力扩大到新疆省。新疆名义上是隶属于第八战区的，1942年3月，他去乌鲁木齐和盛世才谈判。当时德军正向俄国南部猛进，盛世才重新考虑他的亲苏政策，认为朱绍良的建议是可以接受的。1942年7月，朱绍良由

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陪同，再次前往乌鲁木齐商谈在新疆确立国民党的权力，盛世才同意下令遣返在新疆的俄国军事、技术、经济顾问。

1943年俄国人撤走，为国民党在新疆扩展势力创造了条件。但是，当苏联屡次击败德军时，盛世才准备重新考虑他的亲俄政策了。据此，于1944年朱绍良以重庆特使的身份又去新疆。8月，朱绍良任新疆省代主席，受令消除盛世才在新疆的固有地位。朱绍良再一次去新疆，由于他握有绝对优势的兵力，他终于劝盛世才接受了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的空衔。盛世才趁坐专机，离开乌鲁木齐赴重庆。随后，朱绍良把新疆省政府主席的职务移交给吴忠信，1944年10月他离开新疆。

1945年，朱绍良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1947年任蒋介石重庆行营副主任，1948年任重庆绥靖主任，统管四川、云南、西康、贵州西南四省。1948年底调往福建，任省主席兼绥靖主任。

1949年国民政府在大陆全部崩溃后，朱绍良去台湾，几年来，一直担任总统军事顾问的空衔。1963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死于台北，时年七十三岁。

1917年，当朱绍良驻在贵州时，和华德芬结婚。有两个儿子、八个女儿。

朱自清 原名：朱自华

字：佩弦 号：实秋

朱自清（1898.11.22—1948.8.12），散文家、学者、诗人。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多年。他的白话散文特别有名。

朱自清原籍浙江绍兴，但出生在江苏，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在清朝当过小官，多年居住在江苏扬州。朱自清幼年在扬州度过，所以自称是扬州人。

朱自清幼时受传统式的教育，后又进中学，毕业后，于1917年进了北京大学，此时改名朱自华为朱自清。在大学时代，他攻读文学、哲学，常常在五四时期的著名白话文刊物《新潮》、《新中国》发表论文和诗歌。1920年毕业后回南方，当学校教师，致力于撰写诗歌。他和俞平伯的毕生友谊，始于在北京的时期，或在杭州第一师范教书时期。

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会员有郑振铎、周作人、茅盾（沈雁冰）、叶圣陶、王统照。这个社团的主张是文学必须普遍反映社会现象，揭示和探讨人生问题。朱自清很早就参加了文学研究会，成了五四运动后在中国的第一个有影响的文学团体的一名成员。朱自清曾短期内担任过扬州中学教务长，1921年稍晚时候去吴淞中国公学教书，后来在文学上成为他的同道的叶圣陶也在那里教书。朱自清和刘延陵、叶圣陶、俞平伯等人一起，主编月刊《诗》，这是中国的专门发表新诗的第一份刊物。1922年1月创刊号上，朱自清发表了四首新诗。第二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篇哲学长诗《毁灭》，得到文学界广泛赞扬。俞平伯称赞这是一篇杰作，对当时正在中国出现的新诗具有巨大的影响。1924年，他在浙江教书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文集《踪迹》，集中的作品显示了他那深邃的感情和闲静的特有风格。

一年后，朱自清经他的朋友俞平伯的介绍，到北京清华学堂任教，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作系统研究，并转向更多地写作散文。1928年出版了他的最早的一本散文集《背影》而被公认为散文家。随着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他的学校工作任务也日益加重，1930年当杨振声辞去清华学堂中文系主任职务，就任青岛大学校长时，朱自清被任命为清华中文系代理主任，同时，他又在燕京大学兼课。

1931—1932年，他休假去欧洲，这是他唯一一次去国外。他经苏联、德国、法国，于1931年9月抵达英国。他在伦敦花了七个月时间，研究英国文学和语言学，以后又去巴黎、柏林等城市作短期访问。

1932年秋，他又回到清华教书，他在北京一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这一期间，他在清华（任中文系主任）和北京师范大学同时教书，他还继续从事研究中国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工作。他写作和出版了许多有关作家和文艺评论的文章和两册文学随笔、散文集。这时，他认识了闻一多，闻也到清华来教书。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迁校先到湖南，后到昆明。在昆明，清华作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到1946年为止。在抗战初期，朱自清仍任中文系主任，但是战时四川的物质上的艰难和生活上的紧张，使他的身体健康逐渐恶化。他的朋友闻一多担起了中文系主任职务。1940年夏朱自

清去成都休养一年。

1941年10月朱自清回到昆明，尽管健康状况仍然很坏，他继续从事繁忙的教学、研究、著述工作。1943年他出版了《伦敦杂记》。抗战后期，他和叶圣陶合写了三本有关国文教学的著作。1945年6月，他因患胃病去成都度暑假。

新学年开始，他回到昆明时，日本已经投降，战争结束了。1946年春，他重返中文系主任的岗位。迁居西南的这所大学里的政治形势和思想状况日渐紧张，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活动，遭到官方的残酷镇压，激怒了学校中的师生。在公开的场合中，朱自清主张缓和和谨慎，而他个人，则因为他的至友闻一多于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被刺身死而深为愤慨。8月18日，朱自清不顾传说国民党特务要破坏会场，在成都召开的闻一多、李公朴追悼会上发表了演讲。李公朴是民盟盟员，他在闻一多被刺杀前四天在昆明被刺身死。在追悼会举行前两天，朱自清发表了二十年来唯一的一首诗，以悼念闻一多的去世。

1946年10月，朱自清回到北京清华园。他除了学校教学工作之外，还负责编订《闻一多全集》，他又出版了几篇有关中国文学的重要研究著作。朱自清对国民政府的统治手段日益愤怒，他在1945年后的著作中，表露了他的左倾思想。

1948年春，朱自清不顾身体健康再度恶化，仍然坚持工作和写作。8月间他作了胃切除手术后，又并发了肾炎。他在临危的时候，神志仍很清晰，临终前嘱咐他的家人应牢记：他曾签名反对美国援助日本和拒绝领取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面粉。1948年8月12日去世，终年五十岁。次日火化，他的骨灰于10月间埋葬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他在1932年续娶的妻子尚在，有子女七人。朱自清的前妻系扬州名医的女儿，因肺病于1929年去世。

三十多年来，朱自清作为作家和中文教师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他早期的诗作一方面显著地保存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同时尽量摒弃它的呆板陈规。他的一些散文，例如《背影》，《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被誉为这一时期中国优秀散文的代表作。《背影》虽短短的不到二千字，但以它的诚挚、纯洁而见称，在许多中学教科书中载有此文。中国的学生们常常以朱自清所写的游记为作文范本。朱自清的写作是生动而通俗的，他是

一位独特的、有影响的散文家。鲁迅说过，他的作品可以与中国古典文学媲美，叶圣陶认为他是第一批近代白话文创新作家之一。

朱自清坚信文学必须有严肃的目的，因此当林语堂出版两种幽默刊物《论语》、《人间世》时，朱自清就主编了得到鲁迅支持的《太白》杂志，致力于严肃的文学。

朱自清主张有区别地对待中国文学遗产，他编注了不少古代典籍，在他生命最后两年中（1946—1948年），出版了一些目的在于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著作，例如：《经典常谈》、《诗言志辩》、《新诗杂话》、《论雅俗共赏》、《标准与尺度》。四卷本的《朱自清文集》，1953年在北京出版，选编了他的散文和评论的主要代表作。

从朱自清的著作中，也显现出他的平易近人，好学钻研和待人大度。他生命最后的十年中，虽然经常处于体力、精神、经济上的重压之下，但仍然以顽强的意志，继续不断地奋力工作。他的日记（未发表）记载了从1931年9月到1948年8月初有关他的生活和活动的详情。

褚民谊 字：重行

褚民谊（1884—1946.8.23）汪精卫的心腹要员，1932—1935年汪精卫行政院长任内当行政院秘书长，日汪政府的外交部长，他在1946年以“叛国”罪处死。

褚民谊出生在浙江吴兴的一个官僚士大夫家庭，他在儒家和释家教育影响下长大。他父亲褚新田要他学英语，他从一个名叫博罗文的美国人处学习英语。他在民立乡校和尚智学校中习读中西文学书籍和自然科学。

1903年他去日本继续求学，先进高中，后入大学，学政治经济学。他在东京结识了反满爱国的中国青年，其中有他当时的，又是后来政治上的同伴汪精卫，当时汪由广州来到东京。褚民谊置身政治活动，将自己的名字褚名谊改为褚民谊，但是他并未加入1905年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他继续在日本读书，似乎并未取得什么学位。

褚民谊后来被年长的浙江同乡张人杰所器重，张人杰是在财政上资助孙逸仙政治活动的主要支助者之一，张人杰当时住在法国，1907年夏因身体健康原因回国。褚民谊似又伴随张人杰返回欧洲，此时，褚民谊才加入同盟会。褚民谊在巴黎成了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一批有影响的中国人中的一名年青成员，他们当时出版《世界画报》和《新世纪》两个刊物，鼓吹革命思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褚民谊回到中国，在上海同盟会总部工作。

1912年冬，民国成立后，袁世凯起而替代了孙逸仙，褚民谊再次去欧洲在布鲁塞尔读了一个时期的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褚民谊回到远东，去东南亚编辑报纸，后来，他和张人杰一起去了一次日本，可能是为了有关中华革命党的事务，该党是由孙逸仙于1914年在日本组织的。1915年秋，褚民谊返回法国，当时有很多中国学生去欧洲。褚民谊、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吴稚晖等人组成法中教育协会。褚民谊进斯特拉斯堡大学学医，专攻组织学，1921年毕业，取得医学和药学两个学位，但从未行医。1921年任附设于里昂大学的法中研究所副所长，为时约有一年。

1925年褚民谊从欧洲回到中国，投身广州的国民革命，担任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广东大学医学院院长，后又任该校副校长。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褚民谊辞去大学中职务，担任国民革命军医务团主任。1927年1月，国民政府移到武汉后不久，国民党内分裂为左右两派，8月，蒋介石辞职后，9月在南京召开会议，促使宁汉合流。汪精卫认为孙科、谭延闿叛卖而大怒离去。汪精卫的心腹褚民谊参加了9月15日的南京会议，会议提出在南京组织新的国民政府，为此而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褚民谊和汪精卫都被排斥于建立在南京的这个新的国民政府之外。褚民谊当了上海法中技艺学校校长，他名义上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39年，实际上他继续不断地参预国民党的事务。1928年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同年，南京政府组成一个委员会考察公共卫生，褚民谊为此又去欧洲，汪精卫早在1927年底就到了欧洲。褚民谊访问了瑞士、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国，在各大学作关于中国政局的演说。1929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

员。褚民谊从法国回来后，任全国卫生委员会主席、教育部大学会议委员，约在此时他组成了中国美术协会，并任比利时庚款基金委员会主任。1930年他代表中国参加比利时庆祝建国百周年的活动。

褚民谊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并不稳固，由于他是汪精卫的心腹，所以经常遭到蒋介石的支持者的打击。然而1932年1月，汪精卫和南京当局和解，出任行政院院长，褚民谊当即任行政院秘书长，他担任此职直到1935年底，直接隶属汪精卫。褚民谊除了他的行政工作外，还编了一本大众健康杂志，改动传统的太极拳作为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他还提倡放风筝作为一项体育运动。这一期间，他还创制了一种拳术对手的机械人。他是京剧的业余演员，他的演技为人们所称赞。1934年国民党正式定8月27日为孔子诞长的官方纪念日，在孔子的诞生地山东曲阜举行纪念活动，褚民谊代表行政院主席。同年，在杭州举办的佛教法事活动中他也是一位头面人物。

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南京遇刺重伤，不能继续原任，所以辞去行政院长之职。褚民谊同时辞职。他担任了法中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并继续推行各种文化活动。

中日战争的第一个年头，汪精卫提议国民政府和日本谈判解决问题。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汉口，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汪精卫越来越怀疑中国能否坚持一次持久的战争。1938年12月，汪精卫离重庆去河内，发表和平宣言。1939年1月初，汪精卫和他的政界心腹，包括褚民谊在内被国民党开除出党。1939年9月，褚民谊成为汪精卫的“改组了的国民党”的秘书长。几经商谈后，1940年3月30日，一个所谓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是该政府最高官员。

褚民谊在南京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并兼任这个日本卵翼下的新政府的外交部长。不久，他的行政院副院长的职位让给了周佛海。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在1940年11月30日和日本签订了日本正式承认南京政府的条约。1940年11月的条约，与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的愿望相反，结果是使日本加强了占领区的军事和经济控制，而给予南京中国当局唯一权力是管理内部行政。1941年，褚民谊又与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签订条约，三国在外交上承认了南京政府。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褚民谊在南京继续起重要作用。当时，太平洋战争的形势，

无疑是很严重的。汪精卫的寡妻陈璧君，坚持要汪精卫的心腹们维持政府。陈璧君劝说褚民谊出任广东省长。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广州的国民党人士将陈璧君和褚民谊拘禁，11月，褚民谊被押送到南京，于1946年4月判为叛国罪，1946年8月23日在南京处决。他遗有妻室和五个儿女。当他受审、处决时，还有不少的同情者，他们认为褚民谊在战时的所做所为是由于他对汪精卫的私人忠诚而已，难以称为卖国。

褚民谊的战时讲话集《褚民谊先生最近言论集》于1939年在上海出版。他在1940年写了一篇悼念曾仲鸣的文章，曾仲鸣因1939年3月有人在河内谋杀汪精卫时，被刺而死。

居 正 原名：居之骏

字：觉生 号：梅川

居正（1876.11.8—1951.1.23），同盟会的活动分子，孙逸仙的追随者，他后来参加了国民党内保守的西山会议派。1932—1948年任立法院长。

他出生在湖北广济的一个乡村，该地邻近安徽边界。家中兄弟五人，他行三。他的祖辈三代都有功名，太平天国时，家中产业遭到严重损失，居正的父亲乃不得不在一家私塾教书谋生。居正先就他伯父，后就他父亲处受学，但应考多次落第，1899年二十三岁时，才考取秀才。1902年到汉口应试举人未中。他在汉口时，交结了一些青年学生，其中几个如陈建、石瑛、田桐（1930年死）等，以后参加了反满革命活动。居正回到广济，协助父兄执教两年。

1905年夏，陈建由东京留学回来看他，劝居正去日本留学。9月居正乘船去日本，在东京受到陈建、田桐以及其他已参加了同盟会的朋友们的欢迎，居正由田桐介绍，认识了湖南的革命领袖物人宋教仁，12月由宋教仁作保证人，介绍居正加入同盟会，那时居正年二十九岁。1906年，居正又加入了共进会，并起草会章。共进会系华中各省革命人士组成，其目的是和长江一带的秘密会党建立联系。居正进入东京政法学校预备班，并于1907年毕业，又进了大学部法科。

1907年10月，他匆匆离开日本，去参加云南边境的河口起义。当他到达香港时，得知河口起义事已被清朝军队扑灭，于是去新加坡，和胡汉民、田桐、汪精卫一起，办当地同盟会的机关报《中兴报》，他参加了《中兴报》和康有为的保皇党刊物《总汇报》之间激烈的笔战，历时七、八周。居正在《中兴报》上发表的社论和专文，得到缅甸华侨中的革命同情者的赞誉，1908年，他们请居正去仰光负责主编他们办的《光华日报》。居正在仰光建立了同盟会支部，为了获得华侨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他去曼德勒、八莫及缅甸其它城市活动。但是他的活动受到保皇派有影响人士的敌视。1910年春，这些人促请英国殖民当局封闭了《光华日报》，将居正驱逐出缅甸。英国当局不准居正在槟城上岸，并在新加坡对他加以严密监视，后经确实保证，才允许他经香港去日本继续求学。

1910年夏，居正在东京会见宋教仁、谭人凤等同盟会领袖人物，重新商讨同盟会的策略，着重讨论了在中国西南和南方各地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由于这一带的革命计划屡遭失败，使在东京的领袖人物们认识到革命活动的中心，应该转移到华中，特别是武汉、南京一带。他们决定设立同盟会华中分会，与长江一带革命会党的活动相配合。居正负责湖北省的同盟会工作。

1910年夏，居正回上海后，又去湖北老家。1911年初，他去汉口和孙武等共进会首领重建联系，这些首领在过去两年中在武汉的军队中积极进行渗透活动。同盟会华中分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后，居正和共进会的革命派在当地军队中加紧宣传活动，并与湖北的另一有影响的革命组织文学社联合，筹划在武汉地区举行起义。10月初，武汉革命党人派居正去上海购办军火，并促宋教仁、谭人凤等同盟会领袖来汉口参加起义。

10月10日武昌起义，当时居正还在上海，翌日起义军推举黎元洪为湖北省共和临时都督。居正、谭人凤立即赶回汉口，在武昌黎元洪司令部与黎开会商谈。几天之内，居正在筹组湖北军政府起了重要作用。居正和宋教仁、湖北临时参议会议长汤化龙一起，起草了革命政府的临时宪法。10月底，居正在守卫汉口的革命军参谋部工作。汉口又为清军占领后，黎元洪建议各省革命党代表在武昌开会，商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黎元洪派居正去争取陈其美等革命领袖人物

的合作，他们正准备在上海召开同样性质的会议。居正多方劝说上海的某些革命党代表出席武昌会议，但他自己在上海一直逗留到12月间。当时，南京亦已攻占，就此南京被选作新的临时政府所在地。于是居正以湖北代表的身份去南京参加各省代表会议，1911年12月29日，会议选举孙逸仙为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

居正任内政部次长，并负责召开同盟会的大会。1912年3月3日，大会决定将同盟会总部由东京正式迁到南京，再次确定孙逸仙为党的领袖，居正负责总部的财务部门的工作。1912年4月，孙逸仙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时，居正也辞去政府的职务。

1912年8月，孙逸仙正式访问北京，居正是随员之一。在宋教仁领导之下，同盟会和其他革命组织改组为国民党，以孙逸仙为理事长。国民党总部设在北京，孙逸仙在上海设国民党联络处，以居正为主任。1912年冬居正在全国选举中当选为国民党湖北代表，于是去北京当上了参议员。当反袁的形势日益高涨时，5月中孙逸仙令居正回上海筹划讨袁事宜。1913年夏所谓二次革命爆发后，孙逸仙派居正去上海的入海口要道吴淞，监督设在吴淞的炮台的国民党军事防御工作。他和警卫部队在吴淞炮台守卫了二十多天，以防袁世凯的海军。但是，在国民党其他地方的军事防守失败后，居正撤离吴淞退到上海，9月中旬携眷属逃到日本。

居正闲居在京都，直到1914年夏天。当时，他的老朋友田桐请他到东京调解国民党内部纠纷，因孙逸仙计划把它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而引起不和。居正成为中华革命党员，但有一些老国民党党员却一直没有参加。孙逸仙指定居正负责党内事务，并负责党的宣传刊物《民国杂志》。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活动达到高潮，居正受任为中华革命军东北方面军总司令，去大连组织北方各省的反袁兵力。1916年1月，居正去青岛得到山东地方抗袁势力的帮助，秘密募集了二个师和一个旅的兵力。5月，这支部队攻占了潍县及胶济路沿线的几个据点，但是未能攻占山东省会济南。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国民会议在袁的后继者黎元洪主持下恢复，山东地区的对垒也随之结束。7月，居正去北京继续当参议员。

在重新召开的国民会议中,居正、谢持是中华革命党的仅有的代表。当时在国会中,对于是否站在同盟国方面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内阁总理段祺瑞及随从他的北洋军阀极力主张参战,居正支持孙逸仙的立场,主张中立。国民会议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屈服段祺瑞的压力而被解散,北京的实权落在段祺瑞和他的支持者手中。8月,孙逸仙与西南桂系军人陆荣廷和滇系军人唐继尧联合掀起护法运动,并号召国民会议代表去广州另行召开国会成立新政府,以反抗北京段祺瑞的政权。居正等人响应,去广州参加“非常国会”,成立了军政府,以孙逸仙为大元帅。1918年春,居正和邹鲁及国民议会中孙逸仙的追随者一起,反对桂系军阀的支持者的一项动议,这项动议准备把军政府的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以排挤孙逸仙。结果这项动议通过,军政府在5月间改组,实行了七总裁合议制,孙逸仙去上海,居正留在广州,以便在“非常国会”中维护孙逸仙的政治地位。

1919年10月,居正去上海,参加孙逸仙召开的党员会议,实行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居正任新党总务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翌年,居正在上海正忙于党务工作,而广州的国民党政权则在居于优势的桂系军阀的压力下逐渐分化。桂系势力后来被陈炯明的粤军击败,1920年10月、11月间,孙逸仙得以回到广州,准备另行组织新政府。1921年初,居正回到广州,进行活动,废除原有的军政府,另组新政府,1921年5月,选孙逸仙为非常大总统,居正为总统办公室咨询,并负责处理当地党务。居正得到主要来自日本的外国资金的帮助,设立了广东股票交易所和国民储蓄银行。这两个企业经营妥善,获利一百多万元,为孙逸仙1921年下半年进军广西,提供了财政支助。1922年春,孙逸仙和陈炯明之间裂痕加大,孙免除陈炯明各职,陈就退回到惠州(惠阳)去了。居正和另外一些国民党领导人多次到惠州探望陈炯明,希望这两个领袖能够和解,但未获成功。6月,陈炯明发动政变,把孙逸仙和国民党赶出广州。

1922年下半年,孙逸仙在上海宣布要改组国民党,指定居正为二十名改组筹备委员之一。第二年,孙逸仙胜利回广州,居正仍留在上海国民党总部。居正虽然对孙逸仙允许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并不同意,但出于对党的首领的忠诚,他也不竭力反对。1924年1月,他出席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委员。由于居正反对孙逸仙的国共合作政策，终于促使他脱离党务工作，突然离开广州。

1924年居正回上海后，闲居在他宝山县的寓所。1925年3月，他在华中旅行途中，得知孙逸仙去世的消息，立即赶到北京吊唁孙逸仙的逝世。他在北京出席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但因不同意会议决议，会议尚未闭幕他就回上海去了。1925年夏秋之间，他漫游河南、陕西等省，和北方军人如孙岳、杨虎城等人接触。11月他在返回上海途中，接到谢持、邹鲁等国民党右派首领的邀请，请他去北京出席所谓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会，后来被称为西山会议。他到北京后，协助起草有关驱逐共产党党员出国民党，免除俄国顾问鲍罗廷的职务，弹劾汪精卫等决议。

1926年，左派占优势的广州国民党组织，和右翼西山会议派之间的对立日益激烈。1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居正及其他西山会议的参预者受到了谴责，并以开除出党的处分加以威胁。3月，西山会议派却在上海召开与广州会议相对抗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居正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闭会之后，居正留在上海负责右派总部的工作，又办了西山会议派的宣传刊物《中南晚报》。

居正等国民党内的右派人物力求取得党的领导权，但在1926—1927年北伐时期，在国民党中央组织和国民政府作出决策时，他们并无发言权。直到1927年夏，共产党人被清除出国民党后，以及国民党在武汉、南京出现两个对抗政权时，西山会议派才能在党内发生影响。当时，为了响应党内团结的呼吁，武汉、南京、西山会议派三方面代表在上海开会，1927年9月16日，选出三十二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代替1926年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的大会选出的和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两个对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居正是西山会议派在中央特别委员会中的代表之一，他常去南京参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筹建国民政府的工作。但是这个委员会不久就遭到党内其他派系的攻击，1927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蒋介石、汪精卫等重要人物在上海召开会议，在会上宣布取消中央特别委员会。当年年底，蒋介石在南京重新执政，西山会议派退出国民政府，居正闲居在上海郊区寓所。

蒋介石在南京掌权以后，面对着来自心怀不满的军人的一系列骚乱，和来自国民党内部如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反对派的破坏活动。1929年后半年，这些分裂的势力商议联合，在北方另行组织对抗政府和党组织，结果出现了1930年夏天的扩大会议。国民政府力图阻止他们的活动，1929年12月20日，下令逮捕包括居正在内的西山会议派的几名为首人物。居正在上海公共租界躲避，1929年12月23日因遇大雪，他所乘汽车迷路进入华界，被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捕获。他在第五师师部拘留了五个月后，于1930年5月转到龙华监狱。居正在监禁期间，研究佛学、实行素食和抄写佛经。12月移送南京，软禁在家，一直到1931年秋日本进占满洲。

在日本侵占满洲期间，国民党内要求党内团结的呼声又高涨起来，为此1931年11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居正被排斥于国民党中央之外七年多后，在他五十五岁时，在党内官复原职，12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委员，还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1932年3月，伍朝枢辞去本职。居正继任立法院院长。

居正，原是一个政治人物而并非法学专家，但是在他为期十六年（1932—1948年）的立法院长任内，全力支持中国的立法改革。他在三十年代期间的最重要贡献，是简化法律程序和法院制度。1935年1月编成的刑事新法典和1935年2月编成的民事新法典，是改进法律程序的重要步骤。法院组织法于1932年10月公布实行，采用三级制：县有地方法院、省有高等法院、全国有最高法院。但是要实行这个规定，有不可克服的艰难，最严重的是缺乏有法学训练的人员，而且待遇菲薄，国民党又干预人事任用。因此，居正终于在1948年辞职。当时全国只有不到半数的县设有地方法院，而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的法官大都不称职。居正为了要听取关于司法行政等具体问题的意见，于1935年9月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有领导司法行政的官员以及法政学院和私人法律组织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一部分成果是，成立了“中华民国法制会”，居正担任会长，出版了《法制杂志》，作为讨论当前司法法律问题的园地。

1931年居正和南京政权和解后，被尊为党内元老，这只是徒有虚名而无实权的头衔。但是他过去曾和许多政治集团有过接触，因此有时请他为相互不和

的军、政派系间的冲突进行调解工作。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期间，他以个人身份邀请西南政治会议派出代表，1936年初，派他和叶楚沧去广州迎接胡汉民回到国民党中央党部。1936年夏，他代表国民政府去华南同分裂的军人陈济棠和李宗仁商议和平统一。

1937年11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三个月，国民政府决定从南京迁往重庆。居正在武汉有八个月之久，负责国民党临时中央党部的工作。1938年7月底，居正经长沙、桂林去重庆。1939年4月间患肺炎，直到9月才病愈。此后三年中，居正身为立法院长，他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促使取消治外法权的问题。1942年10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述了中国促进法典、法院、监狱的现代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在中国保存外国领事裁判权，已是没有必要的了，他的文章显然是政府舆论的组成部分（1943年1月11日，英、美分别订约废除它们的在华治外法权）。1943年9月，居正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十一次全会，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对国民政府组织法作了修改，同意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中日战争后期，居正多次参加国民慰问团，去各战区前线慰问军队。

战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居正提出辞呈，但未被接受。1947年4月，国民政府改组，居正再次被举为立法院院长。1948年3月，在竞选正副总统时，居正的朋友们劝他参加副总统竞选，他宣称，他是为蒋介石当选总统而参加竞选的。4月19日的选举表明，蒋介石得到压倒的多数票，但居正在国民大会上所得的选票也不少（269票对蒋介石的2430票）。1948年7月1日，根据居正长期以来的愿望，辞去立法院院长，不久，他当选为监察院的委员。

翌年，居正忙于筹划把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1949年11月，在重庆建立政府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后，居正飞到台湾。在台湾，他又当了两年监察院的委员。1951年11月23日，他在台北家中中风死去，时年七十五岁。

居正身后留有继室和十个儿女中的九个。他与元配在1898年结婚，生有两女一子。子波清（音）（1912—1942）哥丁堡大学毕业生，主修物理学，曾任中央军校教官，战时，任第二装甲团修理部主任。居正在1912年和继室宗敏祺（音）（1892—）结婚，她的父亲是举人和县官，她毕业于上海女子法政学校，生有两

个儿子、五个女儿。长子海杰（音）（1917—）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系和中央军校，又在哈佛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在行政院、考试院任职。长女英菊（音）（1913—）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系国家经济研究所成员和北平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她和马书增（音）结婚。四女翠君（音）（1920—）在康乃尔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台湾全国编译馆当编辑，著有生物化学方面的著作，她和张乃伟（音）结婚。

居正死后，他的诗文于1954年在台北编辑出版，计有二卷，题名为《居觉生先生全集》。在全集中有两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章：一篇是《辛亥札记》，曾在1928年上海的《中南晚报》上连载，系关于辛亥革命史实的记载；另一篇是《梅川日记》，记录了1912年的事件，曾在1950年香港《民主评论》上连载；还有一篇是《梅川谱记》，是用韵文撰写的，是他本人从1877年到1948年的年谱。自1930年居正被监禁的时期起，他形似居士，写了一部信佛的诗集，题名《参禅集》。他的全集中并未收录但具有关于国民党的史料价值的，是他在1928年编写的《清党实录》，这一册子是他根据有关西山会议派及其政治组织的活动的党内档案和其它材料编写而成。

责任编辑 王时风